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1年 第6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目 录

### “七一”讲话与中共百年

- 3 齐卫平, 柴奕 / 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
- 17 弗拉季连·布罗夫 / 习近平“七一”讲话: 用科学眼光审视中国历史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纲领性文件

### 苏联问题研究

- 26 冯绍雷 / 苏联解体的长时段考量——文明史视角的探讨
- 52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 柳德米拉·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 / 共产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未来
- 74 张莉萍 / 转向“灾难外交”: 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外交行为探究

### 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 97 张蕴岭 / 对国际区域学理论的探讨
- 115 曲文轶, 杨雯晶 / 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逻辑
- 140 孙 超 /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中亚治理的比较——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规范性改变
- 165 纳扎尔拜·叶尔肯 / 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刘 军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1 年 12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1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Ци Вэйпин, Чай И***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 изменение мир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3)

### ***Владилен Буров***

Речь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1 июля»: Программ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й научное видение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 его буду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 (17)

### ***Фэн Шаолэй***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факторы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6)

### ***Александр Бузгалин, Людмила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

Теория коммунизма и практики созида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уроки СССР и будущее Китая..... (52)

### ***Чжан Цзюйпин***

Обращаясь к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атастроф»: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Горбачёва в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 (74)

### ***Чжан Юньл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 (97)

### ***Цюй Вэньи, Ян Вэньцзин***

Логика выбора партнёров России п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 (115)

### ***Сунь Чао***

Сравнение управления ШОС и ЕС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озда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или норматив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140)

### ***Назарбай Еркин***

Нов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 (165)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1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Qi Weiping, Chai Yi***

Profound Influ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Changes of World Relations..... (3)

### ***Vladilen Burov***

Xi Jinping's "July 1<sup>st</sup>" Address: Examining the Programmatic Document of China'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from a Scientific Viewpoint ... (17)

### ***Feng Shaolei***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Longue Durée: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26)

### ***Alexander Buzgalin, Lyudmila Bulavka-Buzgalina***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alism Practice: Lesso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s Future ..... (52)

### ***Zhang Juping***

Turning to "Disaster Diplomacy": the Diplomatic Conduct of Gorbachev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ernobyl Accident ..... (74)

### ***Zhang Yunling***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tudies..... (97)

### ***Qu Wenyi, Yang Wenjing***

Russia's Logic in Choosing Free Trade Partners..... (115)

### ***Sun Chao***

Comparison of the SCO and EU Governance in Central Asia: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r Normative Changes..... (140)

### ***Nazarbay Yerkin***

New Eurasianism: The Kazakhstan's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 (165)

**“七一”讲话与中共百年****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

齐卫平 柴奕\*\*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与世界发展进程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历史性变化，整体表现为由被动转向主动交往、由边缘化走向世界中心、由局部联系发展到全面建立关系、由相对落后到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转变。当前世界形势发展呈现出变速快、程度深、范围广、影响大的特征，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将洞察时代演进走向，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在影响世界关系变化中做出积极的作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外交 中国智慧 世界关系 百年大变局

**【中图分类号】**D82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003(14)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的发展历程与世界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它不仅以创造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奇迹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021 年 7 月 6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sup>①</sup>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高度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014）的阶段性成果。

\*\*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柴奕，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 页。

的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在积极作为中为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进步做出了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发展机遇更要求中国共产党时刻与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与阶段性发展，能够更好地洞察时代演进走向，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为中国共产党更积极地融入世界格局提供经验借鉴，为进一步推动世界关系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 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从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衰落到当代中国的崛起，前后跨越了三个世纪。19世纪的60年、20世纪的100年、21世纪的20余年，加起来180余年，虽然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匆匆而过的短暂片刻，但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在深刻的变动中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世界关系不断发生历史性的重塑，人的认知也不断地更新。

从总体上看，自20世纪以来，对世界关系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主要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美苏两个大国的争霸、东欧剧变和苏联共产党失败悲剧的上演、欧盟力量的形成、时代主题的转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金砖国家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9·11事件”等恐怖主义的冲击、金融危机的爆发等等。这些重大事件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提出了重塑世界的需求，加速了世界变革的进程。回顾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事件，不难发现，不论中国处在怎样的历史境况和社会背景下，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变革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不仅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而且国际社会也热切关注。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进入近代世界格局以1840年为开端，并且是以一种被动、消极的方式进入的。一场鸦片战争使悲哀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英国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古老的东方帝国因战争失败而失去了曾在两千多年里领先世界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

国联军侵华战争相继打响，接踵而至的失败带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国不断涌现出一批批思想先进、视野开阔的改革者、奋斗者，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具、制度、文化，积极探寻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落后地位的救国方案，但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可以说，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被动地进入世界格局之中，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在世界关系中扮演着落后挨打的耻辱角色。这样的境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始终找不到摆脱自身命运的正确道路，列强也完全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到中国来横行霸道。

直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才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革命的面貌，为世界革命带来了新的变化，也开始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赋予“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sup>①</sup>这个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民族意义，更突显出这一历史事变的世界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认识世界大势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近代中国革命以 1919 年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旧之间，是思想意识的转变所决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但整体来看，近代中国仍旧是被西方列强强制打开国门，被动地融入世界格局之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使近代中国革命的面貌有了质的变化，在为中国革命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引领近代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格局转变为主动投身世界革命的大潮。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使世界发展的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增添了一支重要力量。在一个地域广袤的东方大国形成马克思主义政党，打破了资本主义在世界政治上一枝独秀的格局，历

---

<sup>①</sup>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342 页。

史发展大势也因为这个变化而改变了走向。

第三，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趋势。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影响世界关系的变量因素。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联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坚决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世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仅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以辉煌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的前景，而且也为世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sup>①</sup>新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从此展开新的篇章。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49年10月3日，在开国大典两天后，中苏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交并友好互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各业迅猛发展，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的道路上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令世界刮目相看，同时也在积极地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打破因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封锁与隔阂。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创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普遍广泛的世界关系。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清晰地展现出当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白皮书指出，截至2019年9月，世界范围内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179个，同时还建立了110对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sup>②</sup>此外，中国还加入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并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济贸易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达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页。



外国建立了 160 多个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订了 120 多个双边投资协定，与 27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14 个自由贸易区，已经有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建设方略的合作协议。这样一幅场景构成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大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在不同场合向国际社会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旨在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关怀。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间里世界可以对中国忽略不计的话，那么，21 世纪的国际社会没有中国在场就不成其为完整的世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引领中国融入世界格局之中，并且以大国的气度和胸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秉持大国责任，主动拓宽同世界各国的沟通渠道，更是在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智慧与经验。总结起来说，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可以归纳为四大转变。第一，实现了与世界关系上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第二，实现了从被世界边缘化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转变；第三，实现了建立世界关系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拓展的转变；第四，实现了从不能为世界做更多贡献到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转变。

## 二、中国共产党影响世界关系变化的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时代环境下展开，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具有不同的特征。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变化，党在形象塑造和外事外交等方面的具体行动也随之改变，这些行为均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宏观地看，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领导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 28 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先由北洋军阀掌握政权，后由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施统治，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性政党，在当时不利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很难与

世界取得联系。但这并不阻碍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有民族大义、国家情怀、世界视野的政治组织积极同世界各国建立联系，更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和平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难，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斗争精神。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抗战路线，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通过多方面的国际渠道宣传和塑造中国共产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象。1937年，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在英国出版。这是一部详细记录作者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所见所闻的纪实作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中国共产党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红区党组织、各种文件、会议的内容等均作为作者的创作素材。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种种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形象，通过新闻和文学等形式的作品展现在世界面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永垂史册。任谁也不能抹杀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无法阻碍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为国际社会正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样，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讲的：“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是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sup>①</sup>

领导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主要表现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动争取应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向世界各国、各政党组织展现自身的形象，主动宣传革命信念，并主动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组织展开联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融入世界格局打下了基础。

---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6、32页。

**第二个阶段：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sup>①</sup>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引发了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仇视，两个阵营的敌对阻挡着中国深度地融入世界体系之中。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国家实施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外交断绝，使中国被迫在封闭半封闭的条件下搞国家建设。但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努力尝试同世界各国建立积极的联系。1953年，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谈判时，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sup>②</sup>，得到亚非诸多备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支持。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斗争下，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以不卑不亢、和平友好的态度，打开了同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新变化。1971年我国实现了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突破，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舞台。同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英正式建交……这些关键性的外交事件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突破外交封锁，同世界关系走向正常化、多元化的里程碑。

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主要表现是排除外交困局，打破外部封锁，主动融入世界格局。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刚起步，贫穷落后的现实使中国难以在世界上产生应有的影响，加上世界处于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形势使中国融入世界还存在一系列主客观的障碍。尽管内忧外患，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并积极同世界各国取得联系，努力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取得良好的成效。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

**第三个阶段：领导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1978 年底中国共产党做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也为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全球体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调整对世界的认识，摆脱长期游离世界和全球体系之外的历史困局，努力扩大与世界的关系。1985 年邓小平创造性地对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做出研判，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时代主题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融入世界指明了方向。他强调：“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sup>①</sup>伴随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步伐，中国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频繁的世界交往既增强了国内改革的活力，也使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20、21 世纪交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1986 年中国提出申请重新返回关贸总协定，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 143 个成员方。同时，以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迅猛发展，给各国之间的互通交往带来“地球村”的便利，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历史发展大势。

领导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主要表现是顺应时代，主动作为。改革开放驱动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以积极作为在影响世界关系变化中发挥重大作用。

**第四个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高了影响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徘徊、政治形势局部动荡的情况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繁荣旺盛景象，不仅为破解世界发展僵局做出了贡献，而且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局面发生变化，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彻底破产。其次，习近平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4 页。

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联合国高度评价并采纳了这个富有创造性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引领世界向着正确的方向、科学的思维、理性的态度和健康的轨道发展。第三，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知识网络化、信息电子化、技术高端化、管理智慧化的时代环境下，世界各国面对国家治理的共同性问题越来越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卓越成就的办法、举措，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第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走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主要表现是发展与重塑，推动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空间已不再受任何力量的制约。新的历史定位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将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建构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格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处在一个重塑的阶段，中国在世界关系、世界秩序、世界格局变动中的引领意义日益彰显。

### 三、未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sup>①</sup>面对未来的世界，只有洞察时代演进走向，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影响世界关系变化中做出积极的作为。未来世界关系将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中国共产党又将引领我国承担怎样的世界责任？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形成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对于把握世界关系变化大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世界政治秩序将在重塑中发生变化，中国的政治话语权将日益提升。**从人类社会最近 200 多年的历史看，“西强东弱”构成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面。西方国家长期在全世界范围内掌握着政治话语权，并以他们的价

---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36 页。

价值观肆意评判其他国家的是非，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这种破坏他国主权的行径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同时，西方国家在制度成熟以后开始进入社会矛盾发酵爆发阶段，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则在经历了挫折后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人类共同灾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制度优势发挥到极致，引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奋力抵抗，将疫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影响降至最低，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反观许多西方国家，非但难以控制疫情的蔓延，更将重点放在了“疫情政治化”等方面，企图抹黑中国。对比之下，中国的制度优势已显而易见。这一正一反的发展轨迹将成为世界关系变化中“东升西降”的征兆，政治多极化会改进既有的世界政治秩序，世界关系中西方国家霸权主义的政治话语将逐渐式微，而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将日益提升。

**其次，世界经济格局将在调整中发生变化，中国将深刻影响经济格局。**未来世界关系变化中，各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国家掌握高端核心技术的水平和程度决定了其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的主动权。当前世界，一方面，产业链的区域范围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了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生产方式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成为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经济发展将以重新洗牌的方式进行格局上的调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截至 2020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 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 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人。<sup>①</sup>中国拥有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数量，2020 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提出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这样的成就对于全球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脱贫事业瓶颈期而言，是一剂有力的强心针。并且，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 70 余年的时间，将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

---

<sup>①</sup>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 年第 9 期，第 4-11 页。

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全新思路，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经验必将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世界各国关系将在协调中发生变化，中国将积极协调各国关系。**国家有大小之分，国家的发展水平也有发达与落后的区别，不同的国家必然有不同的发展诉求。制度适应于发展的现实情况而存在，因此，各国的制度也不尽相同。国家间的关系协调既要立足于国家自身利益，又要兼顾全球利益。人类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无论哪个国家在世界性风险的共同挑战面前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未来世界关系中，求同存异，谋求共识，协调利益，达成共赢，将成为主流。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中国将积极主动承担起协调各国关系，推动和谐世界的责任，这是因为求同存异、谋求共识是中国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外交理念。1955年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便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sup>①</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秉持更加包容与开放的对外姿态，承担大国责任、发挥大党价值，努力协调世界关系，将求同存异的理念不断发扬。

**第四，世界主导力量将在演进中发生变化，中国将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未来世界各国对主导力量的认知会发生变化，长期以来那种以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说话，靠强权、霸权、蛮权等方式来主导世界的做法已经行不通。未来的世界不需要由哪个国家充当“警察”，人类家园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维护。在全球治理共同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面对巨大风险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对世界贡献大小的事实将成为认同世界主导力量的标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地向世界贡献自身力量。因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23页。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①</sup>中国人民曾深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危害，在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之后走出了一条中国的发展之路，当中国有机会、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之时，必然将以最为和平友好的方式引领世界的和平发展，创建更为和谐的世界关系。

**第五，世界文明样式将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中国现代式文明将开创人类发展新形态。**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文明并存是客观事实，正是有各国、各民族丰富的文明发展，才呈现出人类文明的绚丽多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国围绕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东西方思想文化差异等文明形式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世界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如长期危害世界和平的极端恐怖组织等。未来世界关系变化中，这些矛盾依然会存在，但以“文明冲突”构成的对抗将退出世界舞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经验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文明当代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弘扬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正如习近平所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sup>②</sup>

未来世界的多重变化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是观察未来世界关系变化的指南。最近几十年里，世界形势发展呈现出变速快、程度深、范围广、影响大的特征，许多意料不到的突发事件令人震惊，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应接不暇，而且这样的局面持续发生着发酵性的变化，没有终结定型的迹象。我们面对着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一方面存在着诸多机遇，另一方面又有许多难以预测和不确定因素。世界关系的变化不会风平浪静，将经历一个周折不停地演变过程。未来世界关系向好发展还是向坏恶化，各种干预、干涉、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②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干扰的复杂因素很多很广，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的思维，坚信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客观规律不可违背，为构建健康的世界关系积极作为、主动创造，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over the past centu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world has embodied historic changes: from passive to active communication,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approaching the world center, from partial contact to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and from relatively backwardness to providing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to the whole world. The current world is characterized by fast speed, deep degree, wide range and great influences, whe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Fac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PC will gain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ake positive actions in influencing changes in world relation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Diplomacy, Chinese Wisdom, the World Relation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азвит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последнего столетия с момента её основания было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процессом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 разных этапах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ПК и миром претерпева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с общим переходом от пассивного к активному участию, от маргинализации к центру мира, от частичного контакта к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у постро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и о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отсталости к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ю миру китайской мудрости и китайских решен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итуации в мир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быстр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по скорости, глубине, масштабу и воздействию, при этом сосуществу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вызовы.

Перед лицом великих перемен, которых мир не видел уже целое столет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будет видеть э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ремени, улавливать общую тенденци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играть а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в оказании влияния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мир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итайская мудрость, мир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еликие перемены столетия

---

(责任编辑 崔 珩)

## 习近平“七一”讲话：用科学眼光审视 中国历史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纲领性文件\*

弗拉季连·布罗夫\*\*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光辉的英雄史诗，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保证政策连续稳定，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七一”讲话

**【中图分类号】**D26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017(9)

习近平在2021年7月1日发表的重要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讲话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奋斗成果的总结，更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认真思考，是一份用科学眼光审视中国历史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报告清晰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和胜利的原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01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BZX011）的阶段性成果。大标题和小标题为译者根据文章内容所加。

\*\* 弗拉季连·布罗夫（Владилен Буров），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儒学协会顾问。

##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的英雄史诗

很难想象，一个 1921 年 7 月只有 50 多名成员的组织会在百年后成长为拥有 9500 万党员的强大政党。正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sup>①</sup>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实践。毛泽东和中共历届领导人，都照例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制定斗争战略。

习近平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②</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亚洲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完成过这般艰难的任务。中国人民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犯过一些错误，也积累了必备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最终正确认识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政策应运而生。习近平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这一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sup>③</sup>

习近平的讲话具有历史意义。的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之前，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及过这一概念。这一理念极具创新性，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因此，习近平可以自豪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4 页。

② 同上，第 3 页。

③ 同上，第 5-6 页。

地宣告：“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sup>①</sup>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确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该理论确定了党的基本价值观，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念，该理念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当前，中国共产党在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政治基础。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 (1)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
- (2) 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3) 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 (4) 全面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5) 坚决打击腐败；
- (6) 加强共产党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7) 通过自我革命增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
- (8) 采用确保香港社会稳定的法律规范；
- (9) 通过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两大全球倡议，塑造中国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形象。

---

<sup>①</sup>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7-8 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后，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结合起来。这种方法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从未有中国领导人如此强烈地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到一起。尤其是近年来，习近平多次提及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学说的现实意义。几十年来，阳明心学一直未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王阳明捍卫人道主义思想、宣扬崇高道德理想，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正是习近平对他做出了公允的评价。

### 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取得的胜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个思想贯穿了习近平的整个讲话。习近平正确地强调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sup>②</sup>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要始终坚守社会主义建设先锋队的本色，能够无愧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就应该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几年前，习近平将“自我革命”引入政治实践中。他在 2017 年 2 月 13 日的讲话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sup>③</sup>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习近平在 2021 年“七一”讲话中坚定地重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3 页。

② 同上，第 10-11 页。

③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 14 日，第 1 版。

质、不变色、不变味，……”<sup>①</sup>习近平在反腐败方面的杰出贡献在国内外广为人知。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从人民中汲取力量。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解决群众诉求。习近平在讲话中呼吁所有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四、中国共产党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提出“一国两制”政策方针并重视其施行

在我看来，“实事求是”一词看似简单，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词汇。毛泽东最先提出了这一思想路线，它经常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习近平的讲话也涉及了这一概念。“实事求是”要求在做任何问题的具体决定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问题），都应该立足现实，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当这一路线涉及整个国家的利益时，便带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正是在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着重强调了“一国两制”方针。香港一系列事件发生后，欧美国家对中国领导层的不实指责甚嚣尘上，他们诋毁中国似乎放弃了“一国两制”方针。事实上，这种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众所周知，根据中国领导人的决定，香港回归后，坚持资本主义 50 年不变。在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期间，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香港市民没有广泛的自治权，自由受到殖民法案的严格限制。香港总督、立法机构成员均由英国王室任命。香港人没有选举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华人被施以残酷的殖民禁令，毫无人权可言。

英国殖民者在离开香港之前，为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置巨大的障碍，故意将行政权分给政务司，将“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推

---

<sup>①</sup>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3 页。

动所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民主化。实际上，英国背着中国政府，单方面通过了 184 项法律，修改了 845 项法律。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根据两国协议，在香港回归后沿用了既有的法律制度。例如，香港居民有权举行集会、批评中央政府、沿袭英式陪审团制度、宗教活动不受限制等。邓小平曾多次就“一国两制”进行过阐释，还曾特别承诺，对港方针 50 年期满后有延长的可能。在与香港市民代表的多次会面中，他表示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如果特别行政区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中央将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关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有些事情，比如 1997 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sup>①</sup>

很明显，近年来香港数次抗议活动的背后都有外部势力的干预，暴乱分子蓄意袭击驻港部队，妄图组织一场全球性运动，以抗议所谓的“践踏香港民主”“侵犯香港人权”等行为。尽管抗议活动给香港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但回想 2014-2015 年特别行政区政府阻止抗议的举措，以及 2019 年重新管制机场等措施，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中国领导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帮助下，中央政府试图劝服抗议者放弃他们的挑衅行为，只有当这些尝试不能取得成效时，才制定通过了一些有助于香港局势正常化的法律。中央政府没有让军队卷入冲突，一切问题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的。“一国两制”方针继续发挥着作用。

习近平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sup>②</sup>

新时代是全球化时代，当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相连时，一个国家、一个

---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1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20 页。



大陆的事件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大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深知这一点。他在发言中郑重宣布：“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sup>①</sup>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sup>②</sup>

基于本国历史传统，习近平强调：“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sup>③</sup>他郑重声明：“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④</sup>此外，习近平还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两大国际合作倡议。

在发言结尾，习近平号召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百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习近平的整篇讲话都洋溢着自豪感，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讲话的结构和风格都非常独特。讲话的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二部分展望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任务。此外，第二部分的每一段都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作为开头，并详细介绍了每项任务的具体内容。为了增强每项任务的约束力，习近平不断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然后提出完成任务的方法措施。独特的结构和风格使得本次讲话无比庄严。

（翻译 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嘉亮，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校对 郭丽双）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6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

**【Abstract】**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glorious and heroic epic. It has united and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thei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guiding them to move forward on the road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pening up a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advanc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 fresh and vari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practice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the courage to revolutionize itself. It serves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and seeks truth from facts, guaranteeing continuous, stable policies, and actively assum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t has always been the builder of world peace, contributor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defender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reating a good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Xi Jinping's "July 1<sup>st</sup>" Address

**【Аннотация】** Столетняя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КПК) - это славная и геро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КПК объединила и повела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к достиж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народ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а также по пути велик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ции. КПК всегда настаивала н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марксизма с конкрет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Китая, продвижении сочетания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марксизма с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открытии пути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н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арксизма с яркой и богатой практик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новой эре социализма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 последнее

достижение китаизац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смелая в своей самореволюции, искренняя в служении народу, прагматичная в своём подходе,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постоянн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олитики, активно выполняет сво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она всегда была строителем мир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глоб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защища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оздавала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велик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китаизация марксизма, речь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1 июля»

---

(责任编辑 崔 珩)

**苏联问题研究**

## 苏联解体的长时段考量 ——文明史视角的探讨\*

冯绍雷\*\*

**【内容提要】**从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探讨苏联解体问题，不仅必要，且国内国际学界已有初步积累。第一，“比较-结构”方法是较早的尝试。也即，从不同历史时段条件下的多民族关系的聚合性、传统治理模式多大程度存在中介性协调机制、文明所处的区位独特性等方面差异，探视苏联解体的端倪。第二，世纪之交以来，帝国形态研究、作为文明现象的苏联总体研究、以及文明与地缘政治相互关系等领域的探讨，指出文明与帝国现象相交织，大陆性帝国中央权力式微与周边动荡的紧密关联，是导致帝国解体的重要因素；帝国抱负过大、内外挑战前所未有，则是其崩溃的经典式动因。至于把苏联现象作为一个文明单位来系统考察，观察多民族构建、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如何处理外部关系，乃为事关苏联前途的关键问题，而苏联解体也恰恰缘起于这三个重大问题。同时，文明演进过程始终难以离开各大文明间的相互激荡，如果说，苏联解体也反射着美欧等文明单位先后趋于衰落，那么古巴导弹危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9年入侵阿富汗这三大扩张则明显表明：帝国对外扩张与国内的体制改革进程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联。改革停滞，无疑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诱因。第三，文明演进过程中思想史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9JJD810001）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的传递、演绎，特别是若干关键范畴的承继与缺失，对文明发展具有何种意义？特别是文明结合部条件下，思想史演绎与体现为民族心理与行为特征的“极化”的文明结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些问题对研究俄文明与苏联解体间的关联性十分重要。尤其是对“适度”这一思想行为范畴的研讨，有利于剖视苏联解体的深层动因。第四，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文明研究方法似已并不限于纯学术讨论，开始参与新兴国家与既存霸权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过程。本文主张在尊重各自文明存在的客观前提下，互学互鉴，避免文明冲突。由此，从文明史的视角探讨苏联解体问题，将长时段演进与中、短时段的变化相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有益于对苏联解体的深层结构的认知，也有益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取得借鉴。

**【关键词】** 苏联解体 俄苏文明 帝国研究 文明研究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026(26)

30 年来，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有了不小的进展。无论是对于具体因果关系的探究，还是来自于各个学科门类的分析；也无论是当事政治精英阶层的回忆与反思，还是来自民间社会的记忆，这些方面所提供的信息与理论研究，足以构成一部关于苏联解体的百科全书。但是，对于苏联这样一个超大体量与内涵极其丰富的世界大国兴衰起落的复杂过程，是否还可以有更多超越单一学科、单一现象的知识性解释？是否应该不限于某个单一领域，而是着眼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缘因素等各领域之间的复杂互动来进行系统考察，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接近于这一宏大过程的深层结构，对其尚有争议的内涵做更富于开拓性、也更加事关当下的探究？在这样的拷问之下，笔者认为，尚需从迄今还未被足够关注的长时段视角着手，与时俱进地进一步探寻对于苏联解体问题的认知。

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罗代尔认为，从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历史研究十分必要；而且他强调，长时段较之短时段观察与研究，对于理解重大历史问题，显得尤为重要。<sup>①</sup>就苏联解体而言，从文明

---

<sup>①</sup>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9-41页。

史视角的观察，毫无疑问可以被列为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因素”。布罗代尔虽然没能亲自经历苏联解体的整个复杂过程，但他所主张的长、中、短时段相互结合研究历史的方法，提供了考察苏联解体问题相当必要、同时也充满挑战的学术路径。

## 一、为何要从文明视角考量苏联解体问题？

从文明研究的角度来看，值得探讨的是，如何看一般意义上的“文明”范畴？作为苏联载体的俄罗斯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形态？然后，苏联解体与俄罗斯文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如果说两者存有相互关联的话，那么作为政治现象的苏联解体，又如何影响俄罗斯文明的发展路径？

百年来的文明研究有着可观的长进。虽然对“文明”这一现象本身的定义汗牛充栋，有数不尽的不同见解，但是依然值得介绍以下两种关于文明的界定。作为年鉴学派的当代传人、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莫里斯·埃马尔教授，曾经在布罗代尔《文明史》的序言中转述了这位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是如何从文化与文明的相互关系来看待“文明”概念的：“文化‘即尚未达到成熟、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无法确保其成长发展的文明’”。然后，布罗代尔又说：“经过一系列经济、一系列社会，仍生存下来，同时几乎只是一点一滴地才改变方向者，就是文明”。在这样的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年鉴学派主张“文明与长时段同一”。<sup>①</sup>换言之，如果从形态上看的话，文化是一种流动，那么文明则是一种相对的凝固。另一种定义，则是俄罗斯当代文明研究专家维·沙波瓦洛夫提出力求周全的界定：文明是“社会文化的总和，以共通的即超地域的价值为基础而形成，这些价值表现为世界性的宗教、道德、权利和艺术体系。这些价值与丰富的实践和精神知识体系，以及研究出来的象征性体系相关联，这些象征体系有助于克服原始机体的地域封闭性……只有这样，理论意义上‘文明’一词才获得了最为稳定的术语地位，并在文明理论

---

<sup>①</sup> [法]莫里斯·埃马尔：“序——布罗代尔教授历史”，载于[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自身中得到了验证”。<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沙波瓦洛夫的文明定义不仅相对全面，主张文明是复数，认为文明乃是多样性的统一，肯定每一文明有着自身兴衰的固有规律，强调文明通常跨越民族、政治、宗教单位的地理边界，也不一定与国家、民族或其他社会团体保持一致，强调一种文明并不一定要求某一种宗教信仰占主导地位，而且，可以在自己的构成中聚合不同信仰的人们，而更多的情况是将某一世界性宗教的信众联合起来。虽然，沙波瓦洛夫的文明定义更多地反映了俄罗斯人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但还是力求兼顾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概括。

为什么要用文明研究的解剖刀来分析苏联解体问题？

第一，苏联疆域辽阔，历史丰厚，国情多样，无论是在古代罗斯城邦国家、帝国、超级大国，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国家政治建构意义上的探讨，都难以穷尽其内涵的复杂性。俄苏现象，不仅仅是一个庞大帝国兴衰的物质性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聚集着这一广大地域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与精神求索。文明因素——包含以宗教、哲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偏好、心理与行为习俗及其表征体系，调处阶层、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规范与设施等等所有的这些因素——对国家政治建构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唯有从文明着手，才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国研究，从物质现象与精神诉求、从过去与将来的对话互动中，去探究苏联解体的来龙去脉。

第二，俄罗斯文明在千百年来前赴后继的学习求索和抗争博弈过程中，势必伴生与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往和竞争。因此，苏联解体本身也正如汤因比所言，是一个文明单位间的“挑战与应战”的产物。<sup>②</sup>这种“挑战与应战”，从俄罗斯文明产生之际即已存在，一直延续到当代。所以，从文明研究切入苏联解体问题，不只事关俄罗斯文明本身，而且，需要从相关各种文明的比较互动、合作抗争的演进中去揭示这一过程。

第三，苏联解体这一问题激起了经久不衰的争议。这些争议不仅伴随着

---

① [俄]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胡学星、王加兴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6页。

30 年来整个全球转型进程，而且，直接参与世纪之交以来有着鲜明文明兴衰背景的新、老国际主体之间的博弈，甚至事关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尽管，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并非冷战后整个国际进程的本质，但是，文明因素的深度介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话题。因此，苏联解体的研究离不开来自文明视角的考察。一定程度上，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文明史的问题。

## 二、“比较-结构”方法的尝试

20 世纪 90 年代，笔者曾应挪威卑尔根大学的邀请，前往做一次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演讲。苏联解体虽已过去，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远未尘埃落定。记得当时大家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之下，尤其关注中国的发展前景会怎样。在这一语境下，笔者曾尝试从文明视角切入，侧重于结构分析，同时也采用比较的方法，来回应这一问题（当时笔者并没有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叙事角度已包含着“比较-结构”分析的一些要素）。笔者主要谈了三点。

首先，从文明构成的要素——各民族相互结构关系中进行考察。中俄两大文明都是由多民族构成，两大文明同样是有着以汉民族和以俄罗斯民族为主干的基本构架。但是，中华文明所处地域空间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略有增减而大体稳定，而俄罗斯文明所处空间在四百多年相对较短的时段里经历了迅速的伸展。“如果仔细审视 17 世纪的莫斯科俄罗斯和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俄罗斯，就会目睹其变化之巨大。国家的疆域扩充了 35 倍。俄罗斯不仅扩张到了波罗的海（由于彼得的事业而经常引起关注），而且还将连接黑海和亚速海的广阔领土，把北高加索收入囊中，并将影响扩展到了外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远东变成了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sup>①</sup>俄罗斯文明所及疆域迅速扩大，意味着加入该文明的具有不同背景的民族主体数量大幅增加，使得主干民族俄罗斯面临调处诸多民族关系的尤为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轴心期”文明之一，中华文明不仅有数千年时间得以较为从容地滋养调处各民族间关系，而且其所处地域环境因内陆周边的高原阻隔，以及东部

---

① [俄]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第 11 页。



边界与各邻国远隔重洋而相对独立。相比之下，俄罗斯文明则始终面临着欧亚大陆辽阔平原地区各大强邻举手投足的难以隔绝的直接影响。所以，无论是外部影响推波助澜、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民族精英阶层自发地决裂，这一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因素，实际上是在一个长时段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换言之，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民族因素”，而应看到，这是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段中出现的多民族聚合的复杂结构，历经欧亚大陆枢纽地带来自周边的长时间“东拉西扯”，又遭逢苏联高层领导核心自乱阵脚，最终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崩溃。这是其一。

笔者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俄两大文明都具有政治权力相对集中的历史传统结构。但是，中俄文明结构的重要区别在于，不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传统具有尤为深厚的影响，尤其是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设置为中央权力在帝国治理系统中添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机制。平民经科举考试有机会进入帝国管理阶层，甚至直达天庭。有人对中国与俄罗斯文明所做的不同评价是：俄罗斯是“稳定型结构”，而中国则是“超稳定型结构”。其中关键区别就在于，通过科举选拔精英的体制在集权式垂直治理系统当中客观上充当了一个上通下达、带有协调制衡性质的中介机制。这样一种机制使中华文明在周而复始的治乱兴衰中，始终得以延续，发挥了“超稳定”的作用。然而，这正是俄苏历史在总体上并不具备的客观条件。苏联解体的危难之际，人们看到的是，培养多年的执政党核心、知识精英与权贵阶层不是去维护现有体制，反而纷纷转向反对派阵营。这暴露出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模式缺乏制衡与沟通机制的结构性困境。这是从文明视角来考察苏联解体的长时段动因的第二种分析。

第三个问题，除了上述中俄文明在民族结构样式、垂直集权治理模式这两个方面既有相近传统、又有重要差异之外，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华文明是数千年来雄踞于亚洲东部的原生态的轴心文明之一。而俄罗斯自古以来处于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以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文明继承者而自居的基辅罗斯与西欧基督教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分；从鞑靼占领起就存在的东方式烙印与四百多年来欧洲文化对于俄罗斯无处不在的浸润，在这里鲜明对立；来自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在这里

互相博弈；斯拉夫人、西欧人、亚洲人在此比邻而居，却又怀揣各自的抱负。直到今天，这个被波波·罗称为“孤独帝国”的俄罗斯，不得不在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制裁打压，尤其是对其内部的分化离间之下，备受遏制与挤压。<sup>①</sup>四五百年来，虽有着伊万雷帝式的、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女皇式的、以及列宁、斯大林式的一波又一波强劲有力的政治建构，但万花筒般的东西方文化在这一片空间持续地互相交织、又互相抗争，使俄罗斯既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专注于捍卫希腊罗马古典传统，也不能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执着地延续自己独一无二的古老文明。俄罗斯只能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历史轨迹之上，以顾盼东方与西方，但既不是东方、又不是西方的特立独行姿态，以其艰苦卓绝的博弈和有时需付出巨大的代价，方能彪炳显赫于世。这样一种结合部文明形态，虽能兼取东方与西方之优长，但又必定使俄罗斯在诸多文明汇集于结合部的空间之时，经常更多面临需迅速做出究竟是抗争、均衡、合作、还是结盟的艰难选择。如果说，作为轴心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以其数千年历史积累基础上所形成的稳固制度基础和政治定力，能够应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之交冷战晚期新自由主义浪潮的严峻挑战，并且把握历史机遇，坚定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么对处身于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绵延时间最长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面临着政治、军事、经济、信息、人文等几乎所有领域内外挑战的苏联而言，这一艰难局面不仅前所未见，而且早已是不堪负担的千钧重压。由此，苏联的解体命运在所难免。

笔者当时从文明视角观察苏联解体，对中俄文明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得出中国不会重蹈苏联解体覆辙的判断。卑尔根大学的东道主、北欧著名哲学家希尔伯格教授听了我的讲演，当即做出了“言之成理”的反应。作为年轻学者，在感受前辈鼓励的同时，也非常明白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还只是刚刚开始。尤其是从文明角度的介入，无论是就结构分析，还是就比较研究而言，这仅仅是从外部形态入手的非常初步的触碰。

---

<sup>①</sup> [澳]波波·罗：《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袁靖、傅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

### 三、值得关注的晚近发展

几十年来，从文明史视角对苏联解体问题的探讨，有若干方面的进展值得关注。尤其是在帝国形态的比较研究，作为文明现象的苏联总体研究，以及文明与地缘政治相互关系的研究等领域。虽然这些研究还只是初成格局，很多问题尚可争议，但命题、视角与方法可供参考。

首先，是帝国研究视野下的苏联解体问题。20世纪晚期以来，与其他领域相比有着较深厚积累的帝国研究，引起了各方重视。虽然，还很难判断，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人们已经意识到世界局势行将大变，或者依旧还仅是书生之见，于是，将“罗马帝国的兴衰”一类话题推到了知识生产的前台。但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可以发现在史学界（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引起的热议，同时全球史研究、内亚学派等诸多流派兴起）、文化批评界（萨义德《东方学》的发表及《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写作）、国际政治研究界（IPE有关霸权兴衰周期理论的出现）等各个领域，都相继涌现关于帝国——大国兴衰的争论。这表明，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各学科的普遍兴趣。客观地看，帝国现象是人类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治理模式。很多情况下，文明与帝国现象紧密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因此，俄苏兴衰历史势必成为从文明视角与帝国视角同时介入研究的一个客体。

在最近20年来的帝国研究领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多米尼克·列文乃是当之无愧而值得关注的一位学者。不仅是因为他对于苏联解体的预判得到了学界认可，尤其是他对欧美的俄苏历史研究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僵化状态，给予了公开而尖锐的批评。《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它的挑战者》一书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大量相关研究著作。首先，他对于俄苏帝国兴衰的系统思考是从俄罗斯帝国与哈布斯堡、奥斯曼、西班牙、也包括中国等各大帝国体系的比较研究着手的。而他最为着力、当然也是他最熟悉的，是俄罗斯帝国与大不列颠帝国的比较。在列文看来，俄帝国与英帝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在欧洲的外围——一个处于欧洲大陆本土之外的海域，另一个则处于欧洲文明核心之外的边缘地带。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两个帝国都存在于泛欧洲的思想世界中。20世纪初，

这两个帝国又都面临着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的挑战。虽然，这两大帝国都拥有庞大的权力，但它们的应对则有着很大差异。英帝国在推广公民权、代议制和附属国自治方面的成效，显然要比俄帝国更为显著。但是，列文冷静地指出：即使当海外白人殖民地被认为“最民主的时代”，当地居民也不欢迎以征服与剥夺为使命的殖民地官僚。“第一世界的民主未必都是第三世界依附者所希望得到的保障”。<sup>①</sup>而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帝国解体之际，大陆性帝国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相互关系，远不像海洋帝国那样具有如此清晰的区分。亦即，海外英联邦殖民地一个又一个地独立，并不妨碍母国本土的大体稳定；但大陆性帝国紧密比邻的周边附属地——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却直接动摇联邦中央政权的稳定。大陆性帝国这种中央与周边的紧密关联性，显然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动因。<sup>②</sup>

在列文看来，作为帝国的苏联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在内部与外部给自己设定了过于艰巨而难以实现的任务。在内部，其基本任务是在极其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种族的人群组成的巨大混合体中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壮举只能是在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的世界里才能实现，同时，只有普遍较高的文化程度与快速的经济的发展，才是苏联的合法性与存活的基本前提……所有的现代帝国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着将帝国秩序与现代化挑战相结合的严重困境。因苏联既是一个帝国，又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旗手，所以，它将会以最尖锐的形式遭遇这种挑战。”<sup>③</sup>在外部，苏联设定的目标是在一个较短时间内“推翻国际资本主义……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更不用说一个传统上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的国家了”，“这反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sup>④</sup>

把苏联现象作为一个文明单位来系统考察，从而观察其走向解体的来龙

---

① Доминик Ливен. Империя на периферии Европы: сравн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Под ред. А.И. Миллер.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4. С.91.

② [俄]Е.Т.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序言。

③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Unstated, 2002, p.330.

④ Ibid.

去脉，是总体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对俄苏现象的系统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所写作的《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花了不小的篇幅专门谈苏联。尽管布罗代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一直到苏联解体的全部历史过程，但他使用了“苏联文明”这一概念，探讨该文明现象的“现在和未来”。布罗代尔认为，以下三个问题乃是“涉猎苏联文明史上那些比较重大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俄国革命相遇，而后又怎样指导俄国革命的？（2）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计划和数据，从人道上讲，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3）在所有这些撞击、强制和变迁之中，苏联文明的现在与未来，能否被人理解？布罗代尔认为：“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摆脱了前所未有的重重困难，在物质领域行将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这些成功已在眼前。但是这些新的结构的建立远未完成。它纠缠于种种悲惨的回忆，甚至纠缠于苏联经验在全世界的声誉本身。在差不多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之际，它必须考虑它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凡此种种，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的自由，这种限制在非斯大林化以后依然存在。苏联在艺术、文学之‘上层建筑’领域（……没有它，文明既不能自动地贯彻到底，也不能全面地表达），也付出了代价。但愿这些上层建筑，像莫斯科大广场的苹果树，在春天稍有暖意的初阳下，一下子突然开放。”<sup>①</sup>

虽然，布罗代尔此书写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但在全书结尾所提出的三个问题，依然可以使理解苏联解体问题的人们获得启示。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苏联，正如其名称所指，是一个想成为各共和国的、原则上独立但联合为整体的国家联盟。这种共处能够好转和导向一个统一的强大文明吗？第二个问题：苏联文明（但仅仅是物质文明吗？）繁荣昌盛；或“资产阶级”文明把苏联引向共产主义社会极乐世界的二十年计划的宣布，并不是一纸空想。布罗代尔颇为乐观地预测：“未来尚是未定之天。苏联仍然可以想出既非美国的又非欧洲的，而是它自己的解决办法。”第三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事情同样也是悬而未决，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昭示未来的迹

---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 25 章。

象。<sup>①</sup>可以察觉，布罗代尔对于作为一个总体文明现象的迄止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苏联前途，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布罗代尔从一个历史学家的洞察中，至少看到了多民族构建、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如何处理世界事务以及与外部的关系，乃是事关苏联前途的关键问题，而苏联解体也恰恰缘起于这三个重大问题。

与布罗代尔的分析有关，有必要对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重要理论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作简要介绍。右翼自由主义阵营代表性人物，比如，曾作为政府代总理，主持解体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型的伊·盖达尔，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一位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专家，并长期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其代表作《帝国的消亡》的序言中曾提出，他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帝国解体实际发生的情形”。<sup>②</sup>在他看来，高度集权制度对治理基础的长期侵蚀，社会意识的保守僵化，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 20 世纪 80 年代石油价格下跌的毁灭性打击，使得苏联遭遇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以及作为大陆性帝国受边缘地区动荡形势扰动的天然的结构性的不稳定，这些都是导致苏联“理所当然崩溃”的深层原因。

再看中间派政治人物的观点。这里既有中间稍偏左、也担任过总理、外长等要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叶·普里马科夫；当然更应一提的是原先来自自由主义阵营，但政治立场更为中立，并具有更广谱影响力的现任总统普京。就普里马科夫而言，他认为：导致苏联垮台的深层经济原因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的危机中。而由于国家结构中长期缺乏联邦制引发的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危机，是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此外，保留苏共作为确保苏联统一的机制十分关键，但其必要条件是党本身的民主化。制约苏共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是执政党的各级机关，它的权力实际上高于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关于曾被寄予希望的欧美国家，普里马科夫认为，在帮助苏联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西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而苏联晚期困难至极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苏联的解体。<sup>③</sup>

---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 555-604 页。

② [俄]E.T.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序言。

③ [俄]E. 普里马科夫：“苏联为什么会终结？”《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37 页。

就普京而言，他对于苏联解体的最著名论断，就是将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sup>①</sup>普京本人对于苏联解体的看法，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景。2014年秋天的瓦尔代论坛上，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位大使马特洛克受邀在大会演讲，他特别讲到了老布什总统当年在苏联解体之际也曾想帮助戈尔巴乔夫。他讲完之后，回到主席台的嘉宾席，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普京总统面带微笑、非常礼貌地向马特洛克握手致意，然后以相当冷静的口吻和神态作了以下一段重要表述，他说：“首先，苏联解体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偌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就不会有解体这样的事情。同时，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什么都不想做，那也会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sup>②</sup>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左翼的理论家卡拉-穆尔扎的观点。这位非常多产、迄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来自共产党阵营的专家提出：其一，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也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极少数公民，在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其二，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应该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毛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其三，二战结束后，苏联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了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是死于自己的双手。其四，一个短时期中，在苏联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大约有整整两代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的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

---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致俄罗斯联邦议会国情咨文”，2005年4月25日，转引自[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序言。

② 笔者作为当年瓦尔代论坛的参与者，当场见证了这一幕戏剧性的对话。详细内容参见冯绍雷：“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方法论刍议——基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考察”，《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2期，第70页。

反苏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其五，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由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上下脱节，导致了雪崩式的后果。其六，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其七，卡拉-穆尔扎最后提出、但远非不重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苏联解体及当代俄罗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理性（实用的、科学的）的社会科学之不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工业社会的核心知识应该是理性的、科学的，仅拥有传统的知识并不够。而苏联的社会科学从方法论上讲，更接近于自然哲学，而不是科学。它未能预见到 20 世纪末期给苏联体制带来灾难的系统性危机……应该建立起新的社会科学体系。<sup>①</sup>从笔者 20 世纪 80 年代在苏联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一个较长时期的观察来看，卡拉-穆尔扎的说法是比较实事求是，也是具有深刻洞察力的。

最后，从文明史与地缘政治互动的角度考察苏联解体的动因。文明演进难以离开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地缘政治因素。地理与文明同样属于布罗代尔史学思想中的“长时段因素”。但是，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文明演进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至少有着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其一，从文明，或帝国的对外扩张与自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来看，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引起广泛反响的命题，那就是“过度扩张必然败亡”。无论是文明、还是帝国的对外扩张，都与国内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相关的互动关系。冷战早期阶段，如同很多国际秩序形成的初期，美苏之间还是比较谨慎和相互克制的。比如，当时苏联与西方在欧洲对峙的条件下，实际上的中立国安排——芬兰、奥地利、瑞典等——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1955 年苏联主动从奥地利撤军等行动，对于冷战早期双边关系的缓和是有帮助的。但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首先是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然后是 1968 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是 1979 年 12 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可以被视为催动苏联

---

<sup>①</sup> [俄]C. 卡拉-穆尔扎：“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40-58 页。



趋于解体的深层动因。事实上，在此之前，苏联也曾对外用兵，比如，1956年苏联对波兰的武力威胁和对匈牙利的直接出兵，并没有迅速导致解体，但是为什么 60 年代之后这几次苏联的对外扩张，逐渐地导致了自身的败亡？如果把国内体制转型与对外扩张的互动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观察的话，可以发现，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与赫鲁晓夫下台有着几乎直接的因果关系。而 1968 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直接导致苏联自身和其他东欧国家当时国内十分重要，而且已经在大规模推行的改革进程的停滞。至于 1979 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仅导致了苏联晚期国内又一波酝酿中的改革胎死腹中，而且苏军在被称为“帝国坟墓”的阿富汗的十年驻扎，毫无疑问，直接加速了苏联的败亡。

其二，苏联解体在多大程度上与欧洲文明、帝国兴衰同步，苏联解体在多大程度上也意味着作为竞争对手的美国的衰落，这是东西方文明体博弈互动中又一个值得观察的逻辑现象。来自保加利亚的欧洲学术新星伊万·克拉斯捷夫在苏联解体 30 周年的研讨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92 年 1 月 1 日，世界醒来，发现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没有战争或外国入侵，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就消失了。你如何解释这种不寻常的转变？”“好像苏联帝国太大了，不能崩溃；苏联太结实稳固了，不会垮台；而且里面装满了核武器，西方无法去恐吓它……鉴于过去 30 年里旧大陆创造的和毁灭的新国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即指非殖民化过程）……因此，从苏联解体的阴影中，人们理解了，正是非殖民化，而不是东西方冷战，才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sup>①</sup>克拉斯捷夫的判断多大程度上切合实际，似乎还需通过实证与进一步的逻辑思辨加以佐证，但这一想法还是为我们对苏联解体的理解打开了从欧洲非殖民化进程进行思考的另一扇窗户。

与克拉斯捷夫思想异曲同工的，乃是老一辈世界体系问题的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看来，苏联的解体与美国的趋于衰落乃是文明兴衰的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沃勒斯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提出：“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 1989 年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开始，但本书的论点正好与之相反，认为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

---

<sup>①</sup> Иван Красте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уничтожил Запад,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уничтожив себя//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6.

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结束。”沃勒斯坦进一步的解释是：“美国试图利用它建立的霸权机制减缓它经济衰退的方式——先是通过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的低姿态，然后通过里根时期的男人气质……最后当美国的力量被充分腐蚀时，苏联别无选择，只能进入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的危险境遇，期待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或至少俄罗斯的作用）能够在残存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中幸存。”<sup>①</sup>

如果说，在沃勒斯坦的辩证法中，苏联与美国乃是互为前提的存在，那么在另一位非常具有威望的文化史大家雅克·巴尔赞的眼中，美国的衰落并不只是辩证法，而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他在《从黎明到衰落》这部西方文明史巨著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便是：“20世纪即将结束。进一步深究后，还会发现西方过去500年的文化也将同时终结。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恰当的时候，应该依次回顾一遍我们这半个千年来伟大卓绝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sup>②</sup>从巴尔赞的逻辑来看，对于苏联解体，不仅应从俄苏文明本身，而且需要对整个西方文明兴衰的长时段进行同时探讨，才能得其真谛。

#### 四、阿韦林采夫命题的追问

记得当年在卑尔根大学演讲时，笔者尚未谈及一个较为具体、但却相当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范畴的命运，而这些范畴在而后俄苏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废存去立，被认为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晚期苏联颇有影响力的宗教史专家阿韦林采夫曾经在俄文《新世界》杂志1988年第7、8两期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题为《拜占庭与罗斯：两种精神世界》。这篇文章独到而又深刻地对拜占庭文明与古罗斯文明及其后续的发展进程做了比较，从教义文本、教会与世俗政权关系、以及不同时期和地域背景下东正教精神世界的演进变化，做了相当深入地分析。阿韦林采夫

---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化中的世界体系》，王逢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导言。

② [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作者的话。

有这样一段表述：“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天主教进行道德劝谕的经典中，有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词汇完全没有被翻译成俄语，也即Clementia。这个词并不能如通常那样把它翻译成‘慈悲’（Милосердие）。慈悲在拉丁语中确切对应的词语应该是Misericordia。而Clementia所指的也并不是俄语中的仁爱、善心（Милость），也不是怜悯、同情、恻隐之心（Жалость），而完全是另一个意思。福马·阿克文斯基<sup>①</sup>并非徒劳，而是完全有根有据地把这一词语解释为‘节制适度’的美德。”阿韦林采夫是在谈论权力的承担者在运用权力时，必须保持节制适度、反对肆意放纵的时候，才谈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体系之间通过语言传递信息时所难免发生的——尽管可能偶然、但却是十分关键的——遗漏、错失、抑或疏忽。在阿韦林采夫看来：“克制、分寸感，往往比良善更为重要。毫无疑问，Clementia这一词语是按照天主教体系规则，刻画出居于严酷的地狱和基督爱的恩宠之间‘天然合理’的法度。爱，不可度量，因此，爱的尺度就是没有尺度。然而，Clementia必然是可以度量的。”在这里，阿韦林采夫特地补充说：“再明显不过的是，俄罗斯教义当中并没有这样的概念。俄罗斯东正教并不是把世界一分为三，而是一分为二——光明与黑暗，没有比在权力运用问题上更可以尖锐地感觉到这一点的了。”<sup>②</sup>在卑尔根演讲之前，笔者虽然已经认真阅读过阿韦林采夫的这篇长文，但在当时，感到难以把握的是以下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对于内涵极其丰富的俄罗斯文明相当简约化的结构性描述，与重要范畴和文本、与关键具体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比如，除了结构性分析的框架之外，还有多少关键范畴与历史性细节需要提供验证，以使我们能够理解：何以俄罗斯文明有着这样一种独特的面貌和演进路径。第二，对于文明研究而言可能是最难、但也是最为关键的部分之一，乃是与阿韦林采夫上述命题相关的对民族性格问题的认知。尤其是对俄罗斯结合部文明背景下非常富有特点的民族性格的把握。换言之，为了理解民族特性，结构分析与思想史演绎这两者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一种关系？第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客观外在的文明历史的结构性存在，是否会像宿命论般地使

---

① 13世纪的意大利神学家。

② Аверинцев С.С. Византия и Русь: два типа духовности// Новый мир. 1988. №.7, 8.

得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路径始终是先天命定？还是恰恰相反，身处结合部的俄罗斯文明，在传承沿袭而又革故更新的长河中，能够主动地做出调整，因时而异地做出历史性选择，使得自身文明及其政治载体的发展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随着积累的深入，笔者认为，固然每一种文明都存在着一些相当突出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是否就独断并永恒地决定着该文明的发展趋势呢？比如，村社现象，这是从马克思一直到当代自由主义学者都曾给予高度关注的一个俄罗斯文明的典型现象。但是，村社现象是否就如此直接、并全面制约着俄罗斯文明自古至今的所有重要进程呢？就直至 20 世纪初仍大量存在、但迅速解体中的原始村社而言，显然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以及苏联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铺垫，包括对苏俄不同于欧美的政党政治体制也非常可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是，如何来衡量这一存在对于当时进程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除了推理与演绎，似乎还需要更多经验材料的证明。包括阿韦林采夫提出拉丁语天主教经典文献中的 *Clementia*（节制、适度）这一词语未被翻译成俄语这一事实，究竟如何评价，还值得细细掂量。尽管，节制和适度的缺失，显然是俄苏政治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行为偏好与相当部分危机的原因，但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由于 *Clementia* 的缺失，致使在拜占庭之后的俄罗斯历史都呈现缺乏节制、贬抑中庸的特点呢？这一追问，可能涉及思想史演绎与历史结构分析这两种略带抽象意义的学术方法，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比如，是思想史的演绎还是历史结构的分析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或者，还需要从新的方法论的构架才能给出解释？在我看来，结论应该是非常开放性的。

关于上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说法：某个民族比较激进，而某个民族比较保守；某个民族举止优雅，而某个民族比较粗鲁；甚至是某个民族比较好战，而某个民族则热爱和平，诸如此类。人们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类对民族个性的描述会如何影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苏联解体。当代俄罗斯文明研究专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维·沙波瓦洛夫这样认为：文明本身往往存在相互对立的具有矛盾性的内在结构，但是，这种在每一文明中都存在的极化性的结构现象，确实对身处结合部文明背景下的俄罗斯而言，

又特别地引人注目。比如，就俄罗斯人对宗教的态度来说，别林斯基说过“俄罗斯民族在所有民族中最不相信神的存在”，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俄罗斯民族在所有民族中最具宗教和神秘主义色彩”。<sup>①</sup>在沙波瓦洛夫教授看来，两种不同倾向在俄罗斯人身上都存在；通常是处于两极的并非多数，而居“中间地带”的人数则颇为可观。于是，他只能得出一个比较折中而含混的结论：对信仰的不断探求，是俄罗斯性格的典型特征之一。<sup>②</sup>更为鲜明的例子，则是广为流传的别尔嘉耶夫的著名观点。别尔嘉耶夫认为：要解开隐藏于俄罗斯精神之中的谜团，可先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承认其可怕的矛盾性。<sup>③</sup>他尖锐地指出：“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暴力倾向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即对宗教采取形式主义态度，不假思索地完成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世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好战的无神论；平和与蛮横；恭顺与反叛。”<sup>④</sup>这种普遍存在的两极化的结构性特征，在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则被大大强化了。而俄罗斯文明起承转合的成长过程中，又凸显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亦即，俄罗斯文明怎样调处具有极化品性的两端间的关系。

非常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空间背景之下，俄罗斯传统中优点与弱点的对立，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也非常需要执政者具有在两端之间调控把持的高度能力。调处得好，俄罗斯文明便高歌前进；若调处失当，或是过于生猛武断，或是过于迂回迁就，都可能会导致千年古国由盛而衰，甚至一败涂地。

晚期苏联的若干年当中，在对于传统体制究竟是改革、还是守成，是开放、还是隔离等等这些重大问题上，或是一再拖延，或是盲目冒进。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把握失度、运筹失当的鲜明例证。可见，应该

---

① [俄]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第6页。

② 同上。

③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Опыты по психологии войны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М.: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ССР, 1990. С.10.

④ [俄]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第23页。

通过怎样的调节，从而使得犹如苏联解体一类的历史性危机得以弛缓，甚至避免？这对于分寸感的拿捏有很高的要求。不光是俄罗斯如此，这是每一种文明克服挑战、延展赓续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三个问题，无论是经典传承、转译中的缺失，还是两极化结构特性，都完全不意味着文明的未来乃是天定宿命。首先，文明史研究中一直有着关于各大文明是否会如同生命有机体那样的兴衰起落乃至最后终结的争论。历经各大帝国的存亡、各类文明的消长，的确很难论断文明现象可以超越生命体现象的起始与终止过程。但是，历史又证明，无论是新兴年轻的文明，还是千年的轴心文明，都还取决于事在人为。

一种形态是政治国家可以中断，传统文明尚会延续。另一种是国家与文明相互支撑，而这在当代社会形成了一道尤为夺目的景观。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乃在于世纪之交出现的文明、地理等长时段因素有力而鲜明地重返国际舞台。与这一种古老文明重新活跃现象同步的，是包括中、俄在内的一大批非西方经济政治实体的“第二次”兴起。在非西方文明群体兴起的总体背景下，首先面临挑战的是西方文明本身，而不是非西方文明。

其次，国家解体后，文明何以重趋复兴，这是当代文明研究中的又一个关键问题。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明复兴，更是一个重要案例。俄罗斯文明在苏联解体 30 年之后的反应，很可能，就是汤因比所说的当今各大文明的“挑战-应战”范式中最值得关注的应战之一。一方面，俄罗斯有着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国家成长道路——数百年中疆域几十倍地空前拓展，几度陷于西方强敌的全面入侵而终于反败为胜，二战之后登顶世界超级大国而又在西方持续挑战压力下遭遇解体的灭顶之灾——这一种非常独特的经历和艰难的成长过程，培养了俄罗斯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同时，世纪之交以来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在内政外交方面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和进步，包括对所遭受的内外艰难挑战和长期困难问题的应对举措，也包括在“俄罗斯世界”旗帜之下重新集结欧亚经济联盟、加强集安组织及大幅推进俄白联盟，尽管充满争议，但同时受到令人关注的肯定。众所周知，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会对普京治理能力表示由衷称赞，可见，对于文明重构背景下的俄罗斯复兴，不能等闲视之。

## 五、文明研究的方法论之争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乃是相关的一系列方法论问题。当前争论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之间。

第一种，是比较偏重于本质主义的方法，强调作为复数的文明本身的各不相同，强调各种文明具有的独立意义与主体特征，强调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对于现实政治建构的影响力与规定性。比如“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对原苏联部分国家的影响力，比如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古老文明传统对当今再次崛起的巨大意义。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艾德里安·帕布斯特著文认为：“文明，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新支柱。英国脱欧、特朗普的出现，俄罗斯、中国、印度的复兴等，所有这些现象，已经把文化与文明认同置于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核心。一种态度是纵容已经遍及西方舆论的‘文化战争’，另一种态度则是非西方世界的相当部分国家抵制西方的普世主义。有关文明的规范不仅吸引了人们的思想，也打动了他们的心灵、欲望与归属感。”帕布斯特提出：“文明复兴正在被视为对自由民主模式当前进程的回应。由于自由民主国家治理体系正在后退……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释放出了民主的恶魔——寡头、蛊惑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暴政。这些力量削弱了西方文明的基础，玷污了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作为回应，俄罗斯和中国采用了一种‘国家-文明’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不是通过人种、民族，或者疆域特性来定义的，而是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体现。‘国家-文明’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实力平衡，还导致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向文化排他性的地缘政治转型。也因此，一个‘后美国’与‘后西方’的世界正在形成。”<sup>①</sup>这说明，文明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活跃，并且实质性地参与着当代国际政治进程。<sup>②</sup>

另一方面，当代文明研究又出现了反思性倾向。2007年马丁·霍尔和帕特里克·杰克逊主编的《文明认同》，应被视为这一立场的代表性作品。

---

① Пабст А.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1. №4. С.26-42.

② Martin Hall,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Palgrave, 2007, Introduction.

作者通过总结百年来文明研究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韦伯、迪尔凯姆等研究者为代表的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以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为代表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亨廷顿、艾森斯塔德为代表的第三阶段，作者认为，直到第四阶段更为年轻一代的出现，才开始摆脱以往的文明研究始终存在着的“本质主义”观念的束缚。在作者看来，应该从文明的“后本质主义”（post-essentialism）论点出发，也即，不将文明视为本质上相互截然不同、相互间具有明确的边界，而是应将文明理解为一个持续过程，亦即，是文明体之间的边界不断产生而又再现的持续过程。2010年，知名建构主义学者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提出，亨廷顿将“文明”视为分立的、单一的、同质的且易发生“冲突”的行为体，这具有明显的缺陷。在他看来，文明是多样的（世界上存在着诸多文明）和多元的（它们是由趋同或趋异的行为者和过程所组成的）。文明并非是静止的，实际上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的集合体”。文明体之间“最相似的并不是它们的文化一致性和冲突倾向，而是它们的多元差异、以及文明间的遭遇和跨文明接触”。以此为出发点，卡赞斯坦同样将文明的“混合性”置于“概念本质主义”之上。<sup>①</sup>

总之，不把文明间关系视为对立和趋于敌对的关系，仅此而言，比起20世纪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本质主义的文明观不同，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家们所提出“非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则否认“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的观点。比如，马丁·霍尔等在《文明认同》一书中题为“文明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序言里提出：“文明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特别是不断生产和复制边界的过程。”<sup>②</sup>该书的作者建议：“迈向有用的文明分析概念，第一步，就是停止再把文明看作是结构或者事物，而把它们看成是过程和关系。”这样一种不把文明视为“结构或事物”的观点，是否真正有利于形成对文明现象的认知？

---

① [美]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一章“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世界：多元行为体、多元传统与多元实践”。

② Martin Hall,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p.7.



真正有利于把握各种文明间的复杂关系？在上述背景下，我们究竟倾向于怎样的一种方法论？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不仅具有对文明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且一定程度上正在被视为含有当下国际政治博弈特征的两种立场。

值得再次提到的是俄罗斯学者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一方面该书与上述两位西方学者对文明概念的解读相类似，作者表示：“本书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各种文明彼此间有一种本能的敌意。”但同时，沙波瓦洛夫还是相当务实地补充说，“实际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从竞争和角逐到相互谅解和合作。不过，由于在文化、精神理念、自然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位置等方面的差异，要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相互谅解的关系，会出现相当大的困难”。<sup>①</sup>沙波瓦洛夫客观地道出了，当代文明研究要想在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间采取“纯客观”立场是相当困难的。

习近平主席 2014 年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演讲。首先，他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同时，“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与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然后，他又说道：“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sup>②</sup>

当前这场有关文明研究的方法论争议，可以上述原则为指导，在首先强调各种文明的特性与结构客观存在的同时，互学互鉴，推动文明和谐。

## 六、结语

从文明史视角探讨苏联解体问题，将文明的长时段演进与中、短时段的变化相互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到不少仅仅从苏联解体具体过程的观察中所看不到的深层结构与现象。从文明传承过程中的恪守与创新，文明交流过程中的谦虚与自主，一直到对自身文明传统的维护与反思，所有这一切，通过

---

① [俄]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第 6 页。

②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文）”，人民网，2014 年 3 月 28 日。

观念形态的构建、价值标准的选择、具体制度的构建，都曾深深影响着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经验教训的借鉴，如何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去推动本国现代化，也推动全球转型有序进行，不能缺少从该角度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问题的再思考。

从文明史视角对苏联解体问题的探讨，一直会充满争议。一个越来越多样化、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对于像苏联解体这样既事关价值、又涉及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不可能不存在争论。马克思对俄罗斯文明问题的立场与态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马克思对于沙俄帝国有过不少尖锐的批评，但是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地研究俄国现象，他不仅对俄国发展的前景表现出越发谨慎的态度——他对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四易其稿，且越写越短，就是一个证明。马克思始终将对于俄国前途的判断与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总的前景相互联系。但同时，马克思一再强调：“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①</sup> 这一点，对任何当代重大国际现象的研究，尤其是大国现象的研究，恐怕都是须臾无法离开的基本问题。

---

**【Abstract】**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possible to discus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longue duré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irst, the “comparison-structure” approach is an earlier attempt, that is, to explore the cohesion of multi-ethnic relation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to what extent there is an intermediar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s, and differences in such fields as locations of civilizations, and to seek clu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econd,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study of empire forms, the overall research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civilization phenomenon and the discussion of relationship

---

<sup>①</sup> [德]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卷，第126-131页。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geopolitics have all pointed out the intertwined linkage of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phenomena.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cline of central powers of continental empires and their neighbors' turmoil directly le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empires. An empire's excessive ambitions, unprecedent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re classic causes of its collapse. As for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viet phenomenon as a civilization unit, careful observation of the multi-ethnic,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how to deal with external relations are key to the fu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s precisely due to these three issues. Meanwhile, the civilization could hardly evolve without mutual influences among civilizations. I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lso reflects the successive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unit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three expansions namely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Czechoslovak incident in 1968, and the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1979 clearly show that an empire's external expans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its domestic system reform. The stagnation in reform is undoubtedly one cause which le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ird,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mission and de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during th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especially the inheritance and lack of certain key categor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particular,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ivilization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the polarized civilization structure embodied as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The discussion on the "clementia", category in thought and behavior, is conducive to analyze root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Fourth, it seems that essentialism and post-essentialism civilization research approaches are not just limited to pure academic discussions. They have already been used in observing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hegemon.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at under the objective premise of respec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ir respective civilizations, countries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avoid conflicts among civilizations. Therefore, it is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exploring the long-term evolution and changes in the medium and short-term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Soviet Civilization, Empire Studies, Civilization Studies,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Аннотация】** Изучени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л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тор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е тольк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о и уж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Во-первых,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й» подход является ранней попыткой этого. Он исследует различия в сплочённости поли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аз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степень, в котор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способ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посредовали механизмы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локус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 целью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ков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о-вторых, с начала век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мпер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целом как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феномена,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указывают на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и имперских феноменов, тесную взаимосвязь упад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ых империях и периферийных флуктуаций,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едущих к распаду империи, классическую динамику имперского краха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а чрезмерных имперских амбиций и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истемн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феномена как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единицы, то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полиэтничности,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идеолог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а также работа с внешни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были ключевы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будущ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именно эти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аспекта привели к его распаду.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оцесс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эволюции всегда было трудно отделить о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основными цивилизациями: если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акже отражал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й упадок так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единиц, как США и Европа, то три крупных экспансии -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события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1968 году и вторжение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в 1979 году - чётк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тесную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между внешней экспансией империй и процессо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Стагнация реформ, несомненно, послужила толчком к распаду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третьих, ка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меет передача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истории идей в эволюц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собенно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ключевых категорий?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акова связь между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ей истории идей и поляризованным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которы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психологию и поведение в условиях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нексуса? Изучение вопроса «Clementia» как сферы мышления и поведения поможет разгадать глубинные причины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четвёртых, эссенциалистские и постэссенциалистские подходы к изучению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похоже, уже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ся чист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и дискуссиями, а начинают вовлекаться в процесс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ежду развивающими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устоявшимися державами-гегемонами. Автор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то, чтобы учиться друг у друга и избегать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уважая объективны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кажд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бсуждени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очетающее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эволюцию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среднесрочном и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м периодах, полезно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глуби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йско-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мпер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вая форм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责任编辑 崔 珩)

## 共产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 ——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未来\*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 柳德米拉·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

**【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要意义在于展示 21 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光明前景。中国以创造性的劳动推动了 21 世纪世界共产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本文探析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判定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和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等问题，进而揭示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借鉴意义。共产主义是一种取代所有对抗性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制度，其基本原则是通过创造性的工作、自由支配时间和实现按需分配来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正在走向“自由王国”，其前提是将人从全面异化中解放出来。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一种“突变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初期理想模式的过渡性理论与实践，体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借鉴了苏联几十年的建设经验及教训，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的引领者。

**【关键词】**苏联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 中国共产党 世界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052(22)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01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1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BZX011）的阶段性成果。

\*\*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Александр Бузгалин），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柳德米拉·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Людмила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对全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日，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条是显而易见的：当前，中国是繁荣强盛、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大国。本文将辨析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的一系列问题，揭示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展望中国在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角色。

## 一、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要意义 ——展示 21 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劳动人民，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经受了許多严峻的考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其更加深层、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团结、友谊、为劳动人民服务、不追求私利。共产主义原则是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最高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生命的重要意义和工作的重要追求。日复一日地践行共产主义原则，将他们锻造成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金钱、名利、权力这些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不是他们所追逐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中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成就，假如年轻人不想变成资本主义老狗身上的跳蚤，就应该铭记这段历史。

苏联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探索同样困难且艰辛、英勇而悲壮。苏联共产党是第一个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到一起的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一个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苏联共产党在 70 余年的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成就，对全世界的左翼力量来说，这些探索一直都是宝贵的经验。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成了混合经济模式的首创者和实施者，这种模式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将市场和计划、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小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结合到了一起。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扛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重担，他们建立起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苏联，苏联的教育水平领先世界，在技术、科学和文化各领域的成就冠绝全球。但同时，苏联共产党人也经受了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艰难考验，遭遇了

官僚化和“短缺经济”的矛盾，种种深刻的问题使得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苏联的发展进程中，个人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人民将理论付诸实践的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伟大的人永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我们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反思苏联的成就、矛盾和本质，同时还要向中国的同志们提出问题——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苏联的发展道路有多大的相似性？中国可以从苏联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吸收到什么教训？

我们将从一个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话题开始，至少它看起来与现代问题相去甚远——现代技术是迈向未来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基础。21 世纪的技术革命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许多手工劳动甚至一些机器劳动都不再必要，“智慧生产”方兴未艾，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建立在信息交流、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基础上的生产为人类主要从事创造性劳动提供了机会。我们想着重讨论这个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非同寻常的问题，它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高科技和创造性劳动的发展是 21 世纪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

在此，本文要澄清什么是创造性劳动。关于这一点，有时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明白。创造性劳动不是市场营销、广告、金融中介、商业性演出和地产开发商意义上的创造性商业活动。首先，对于 21 世纪经济发展而言，教育劳动者的劳动是更富创造性、更有意义的劳动。教育应该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而不是仅仅针对精英阶层的教育，它应该贯穿每个人的一生，从幼儿园、中小学的培育到提升职业技能水平的培养，再到教授老年人学习新技术的培训，教育伴随着人们的一生。第二种创造性劳动是医生的劳动，不只是知名专家医生的劳动，还有普通医生、护士和卫生员的劳动，他们救死扶伤，予人温暖，还关怀每一位病人，保护健康的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万千医生和志愿者舍生忘死，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是艰苦危险但又富有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从本质上讲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第三种创造性劳动是各行各业善于思考的工人和工程师以及程序员、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劳动。从事第三种创造性劳动的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使得环境和社会免于遭受



各种形式的污染，清理各种垃圾和反社会元素。

创造性劳动的发展是 21 世纪实现共产主义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共产主义不是普遍贫穷，而是不断趋向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人类最重要的追求是有趣味的、内容丰富的创造性劳动，共产主义是追求劳动的世界，而不是购物狂的世界。教师和医生需要什么才能成为幸福的人？是宫殿，劳斯莱斯，还是价值百万美金的手表？都不是，他们需要的是舒适的居所，漂亮的服饰和清洁的生态环境。当然，还有受人尊敬的、内容丰富的的工作。只有资本主义才驱使他们追求过度消费和无度积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幻景。

我们深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物质富足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世界日新月异，现在尤其是共产主义者充当世界发展急先锋的时刻。70 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还经常食不果腹，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生产大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不再为吃穿住用发愁，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就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创造性劳动是共产主义的需要。一方面，创造性劳动是所有快速发展的技术和社会进程的基础；另一方面，创造性劳动不允许将人赶进戕害人们心灵、导致经济灾难的一味追求消费的死胡同。走上创造性劳动道路的国家将使自己人民的生活更有意义，也必将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导者。

共产主义者用作自己政党名字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何种面貌？我们不会借助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诉诸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正处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推进的时期，这个时期既是漫长的，也是不平衡的。

## 二、人类正在走向“自由王国” ——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情境

人们习惯在思考某个现代问题时，要么是以完全非历史性的眼光审视它，要么就在前后不超过几十年的背景下进行思考。而我们将在几个世纪的跨度内，向读者介绍通往“自由王国”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只有在漫长

时间跨度内的深度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活动的重要原则和规律，推动当前的活动取得新进展。

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们将引用无产阶级的经典原著。我们先后纪念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百周年诞辰，但很少有人记得，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是如何论述新社会起源的。我们在此处将引用两段经典论述，即使是左翼理论家也对它们知之甚少。下面，我们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两段引文。

第一段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本书被列宁称作“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也曾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sup>①</sup>

第二段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该卷由恩格斯编辑出版。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

---

<sup>①</sup> Энгельс Ф. Анти-Дюринг//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 Изд.2. Т.20.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1. С.294-295. 译文参见[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6-307页。

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sup>①</sup>

在以上所引用的论点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未来社会最重要的特征，这一社会的诞生不仅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而且能够摆脱“必然王国”状态。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在幻想一个他们所相信的乌托邦，而是从分析异化世界的客观历史发展矛盾中推断出自己的预测。

未来社会的第一个特征：社会占有生产资料，通过改变劳动条件消除劳动主体的异化。

未来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消除（我们也译为“扬弃”，辩证否定）商品生产、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

未来社会的第三个特征：不断掌握更多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的力量，放弃追逐私利，避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扬弃了社会异化，人就能够掌控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最终从动物般的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人与自然界的异化才能实现自我扬弃，将人转变为自己历史真正的自由创造者。

未来社会的第四个特征：“自由王国”处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那里，人类能力和潜能被当作目的本身；“自由王国”的基础是集体性个人、相关生产者对生产的社会化控制以及自由时间的最大扩展。

---

<sup>①</sup> Маркс К. Капитал. Т. III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2-е изд. Т. 26. ч. II.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С. 386-387. 译文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从“自由王国”概念诞生起，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它是否已成了现实？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一方面，大部分人仍处在“必然王国”之中；另一方面，“自由王国”的元素不断增多，在大规模实践中逐渐萌芽发展，在客观上已成为现实。这既有苏联从 1917 年到 1991 年的实践经验，也有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为建设新社会而斗争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其他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飞跃，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之一。数十个国家都曾探索过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强调的是：不仅是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市场和资本的社会管理与调控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里处于“中心”和“半边缘”状态……

我们必须牢记，第一，“自由王国”的元素才刚刚诞生，还没有取得优势，因此它们以过渡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意识中，其中，糅合了过去（异化）和未来（解放）关系的诸多特征。第二，“自由王国”元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20 世纪中叶我们见证了其广泛而快速的发展，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西欧和其他国家的反共倾向不断加深，但与此同时，反对这种倒退倾向的抗议活动空前增多，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声浪也日渐高涨。第三，历史还远未终结：30 年前的轰动性预言显然已经落空。从 20 世纪共产主义斗争的教训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事实上，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应该被视为全球社会解放进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政策导致了“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此处指的是苏联），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背景。

在分析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具有重要意义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之前，我们想稍微偏离一点儿主题，补充一些重要而丰富的内容，帮助读者回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从未停止过战斗。

### 三、什么是共产主义？

我们将主要依据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卢森

堡、葛兰西的基本观点来思考这一问题。此外，我们还将引用齐泽克<sup>①</sup>及其同事关于共产主义通信辩论的内容。

让我们先给共产主义下一个极其简洁的定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自由王国”的概念）——一种取代所有对抗性社会经济形态（“必然王国”“史前时期”）的社会制度，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发展通过创造性工作、自由支配时间和实现按需分配。

我们还要记住，那些将共产主义社会当作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思潮（更宽泛地说是各种左翼革命思潮）都应该被称为共产主义。以前，苏联学者经常使用“共产主义”一词来表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本文中的“共产主义”并非这一含义。

我们在前文提到很多论述过共产主义的学者，在他们看来，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它是一个与从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论述的“自由王国”，它的繁荣建立在“必然王国”（高效率劳动）的基础上，但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

我们要重点强调：共产主义是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自由、自愿地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取代资本主义，而且能够取代整个异化世界的原因。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的客观条件是：

（1）生产力不断进步，并朝着自动化（“智能化”）的、生态环保的生产方向发展，这为人们在管理、教育、卫生、艺术、科学等领域从事创造性劳动提供了条件；生产力朝这个方向发展的结果是：创造出共产主义所需的物质基础，实现“智能化”生产。

（2）文化不断进步，文化领域是一个人类共同创造的空间，在对象化和去对象化的过程中创造和运用了无限的社会价值（艺术作品、知识、技术、人的创造性、审美和道德价值）；李卜克内西用公式简练地表达了共产主义与文化的联系：“共产主义=文化”。

---

<sup>①</sup> 参见 Жижек С.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в красном цвете. М.: Европа, 2011; C. Douzinas, S.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Verso, 2010.

(3) 共同的社会创造力——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列宁所称的“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在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中，社会异化关系得到最大限度的扬弃，共产主义这个“自由王国”诞生了。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在于，内部矛盾是其发展的源泉。这些矛盾包括创造性活动中内含的所有矛盾（如独舞者与舞蹈团之间的矛盾等），创作自由与社会规范限制之间的矛盾等。共产主义与其说是最后的社会形态，不如说是有着全新发展结构和发展阶段的新时代开端，它不再是确切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形态。

共产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时空，其萌芽和元素在异化世界中就已出现并发展。实现共产主义，要参与到各种斗争中来，争取社会解放、科学和艺术创造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发展，直接参与到经济社会组织的斗争中。一方面，这些因素将市场、资本结合起来，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以过渡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公共卫生和教育、累进所得税、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社会和环境规范等，都是这种过渡关系的体现。非异化公共社会关系和异化日常性关系的比例反映了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进度。社会和个人空闲时间的增长也是反映这种进度的一个量化标准，空闲时间是用于个人发展的时间。社会解放的主体是从属于异化关系下的劳动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是将人从全面异化中解放出来。因此，这一初级阶段的矛盾在于，革命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完成的，而政治上敢为人先的先锋队是共产主义的直接建设者。将异化世界的人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需要多长时间，花费多大代价，决定了共产主义未来的发展。

由于共产主义不是无根之木，而是从资本主义及其所有矛盾中产生的，因此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首先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或“不完全的”共产主义）。这些时期的特点，是异化力量（重复性劳动、市场、国家、社会不平等、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其他要素）与新兴的共产主义力量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共产主义力量主要是社会创造力（团结、“热情”）和文化。在过渡时期，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要消灭已经失败但仍然存在的社会异化关系和形式。

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是保持工人领导的国家长期存在。在这种形态下，

国家政治活动不仅要维护工人的利益，还要在工人的直接参与和监督下进行；保证工人参与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级管理中来（这种政权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结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开始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制度被取代，作为一种特殊政治机构的国家逐渐消亡，全体公民开始参与管理，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公民社会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大（在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种制度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既有“进攻”时期，也有“退却”时期。共产主义在一国或多国取得进一步成功的条件是国际左翼力量紧密团结，强大到足以抵御外部威胁的程度。一些国家要在过渡时期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必须团结国际反对资本的力量，积极支持和保卫革命胜利国家的共产主义萌芽。一国共产主义在第一阶段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只有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共产主义最初在各国的发展并不平衡），才能过渡到第二阶段（共产主义）。

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建设的成败取决于社会创造力和群众的参与度，取决于文化进步和人类素质的提升，取决于政治先锋队的理论依据、行动效率和民主实践。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由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补充完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以此命名。然而，由于现实原因，这个模式经受过不小的调整，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就可见一斑，我们接着要谈谈苏联的经验教训，同时请我们的中国同志们总结，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什么方式、将哪些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经典理论应用到中国——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富经验、瞩目成就，同时存在诸多问题的伟大国家。

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它的答案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些关于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判定苏联的性质。

#### **四、判定苏联的性质是解决 21 世纪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就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自由王国”）加速突

变进行过多次详细论述，这是共产主义制度发展的最初阶段。<sup>①</sup>本文的作者之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多次使用“突变社会主义”来命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引起了两类人的批评。第一类是苏联的拥护者，他们在精彩动作电影的语境下将“突变”一词与可怕丑陋的变种人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来理解（众所周知，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也源于自然科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意识形态”这个词取自植物生态学，本意为“群系”）。第二类是所有根本否认苏联制度社会主义性质的人。

在回应批评前，我们需要指出，本文作者不认同“市场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体系”，也不认同基于这一观点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如上所述，我们跟随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和前辈，探寻了新制度诞生的主客观前提，充分合理地证明了全新社会制度出现的可能性和规律性，不仅为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还为人的个性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我们看来，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积极意义的明确论述缺乏说服力，认为苏联解体是主观因素导致的偶然事件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我们会尽量以公正的目光审视，客观探寻“现实社会主义”的深层内部矛盾和国际环境。一方面，国际环境催生了这个独特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又导致了它走向解体。此外，我们还要从苏维埃制度的出现和崩溃的原因这个基本相同的角度出发，更加详细地审视其充满荆棘的发展过程。

我们的切入点是：现代社会的矛盾为“自由王国”的诞生创造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同时，这些矛盾也证明了，异化关系的消亡必然是一个长期的、非线性的世界性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社会主义”。问题就在于要批判性地发展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线性的理解，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在“后古典资本主义”框架下，通过改革（社会民主）可以部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体系。

如果把新社会的诞生看成是人类历史向全球化、国际化的重要转变，那么这个转变过程本身也就具有了新特点。因此，与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

---

① 相关的具体论述可参见 Бузгалин А.В,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 Л.А, Колганов А.И. СССР: оптимистиче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М., 2018; Бузгалин А.В. Еще раз о причинах ухода СССР//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20. №3. С.59-70.



意识形态的形成阶段，不如说它是从异化时代向“自由王国”（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它始于劳动人民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掌握。它的前提和萌芽是资本主义框架内包含了社会主义特征的过渡关系。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一以贯之地包括革命和反革命，新社会在个别国家和地区的产生、消亡和重生。新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将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和反改革，伴随着各种社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而起伏。社会主义作为全球范围内新社会诞生的过程具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些转变具有不平衡性、矛盾性和世界性。

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将“现实社会主义”定义为“自由王国”诞生这一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加速突变。我们需要对这些论题进行说明。

首先，在我们的研究中必须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的深层倾向与发展趋势。苏联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其深层特征没有获得与之相符的形式，也无法激发生产力进步固有的潜力，受当时的客观条件所限，不能将人作为真正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一员来看待，我们可以判定，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是突变的社会主义。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并不存在某种社会主义“理想”被扭曲变形。关键在于，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历史现实趋势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实萌芽，都是在不利的外部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突变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突变的既有社会主义萌芽，又有后市场调节，其中也包括计划经济，它曾取得过显著成效，却也导致了官僚主义畸变，催生了巨额赤字；社会财富分配也出现了突变，分配方式被主管部门和“非公开分配”所扭曲；苏联人民在反对庸俗的从众心理和消费主义的斗争中失败了，新的价值观占据了上风；在政治领域，工人自治曾成效显著（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最终也因官僚暴力而畸变。<sup>①</sup>

其次，使用“突变”一词并非偶然。笔者参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借用自然科学领域的词汇进行类比。我们通过与进化生物学中的突变概念进行类比，使用“突变社会主义”来定义苏联的社会形态（突变是指属于某个物种的有机体，具有能够突变的多种特征，即“突变库”，在不同程度

---

<sup>①</sup> 详细的论述可参见 Колганов А.И. Пут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пройденный и непройденный. От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 тупику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зд. 2-е,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М.: ЛЕНАНД, 2018.

上可以突变为“纯”物种，并且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这些特征可以成为“自然选择”的基础，个体携带特定的“突变库”生存以便分离成为新物种)。从 1917 年革命开始，不断成长的新社会就具有了一系列特征（“突变库”），使其能够沿着不同的轨迹进化，其中也包含偏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演化最佳路径的可能。“环境”的特征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基础、俄罗斯人的文化素质和国际形势，这些特征导致在当时的“突变库”中，官僚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渐取得了优势，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和巩固，形成了一个稳定但毫无伸缩余地的体制，它不适应未来的激进变革。结果，在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突变体。

这样的有机体正是由突变而成，它一方面很好地适应了俄罗斯的“环境”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和中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另一方面（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远远偏离了共产主义运动轨迹，偏离了异化世界非线性消亡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和矛盾。结果，苏联形成了一个可以在既有工农业基础上生存、发展甚至战斗的体系。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最有力的证明。但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总体性”、战略性的异变），这个“物种”没有能力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无法有力回应日益加剧的全球挑战，也无法追赶 20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快速发展。<sup>①</sup>

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制度，由于官僚主义的僵化，具有极其狭隘的一套特征（“突变库”），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进一步变化。这个突变体带有巨大的矛盾（潜在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毒瘤，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元素（“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萌芽），这些元素包含了进化的潜力，使苏联的制度能够应对 20 世纪后期新问题的挑战。但渐渐地，它们被官僚主义的毒瘤压垮了。结果是，突变社会主义无法朝着更有利于建成“自由王国”的方向发展，持续推进的科技革命、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都给“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共产主义价值观和规范带来了巨大挑战。僵化的突变社会主义无法应对这些挑战。

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新经济政策给了我们许多有益建议，它

---

<sup>①</sup> 20 世纪 50、60 年代，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出现局部的社会主义化和人道主义化，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影响下的产物。

向我们指引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更准确地说，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我们看来，借鉴新经济政策经验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积极借鉴了苏联几十年的建设经验。

## 五、新经济政策与列宁的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初期理想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深入分析新经济政策，对于确定现代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新经济政策是劳动阶级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国家的必然阶段，也是建立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即“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自由王国”取代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它取代的是整个社会的异化时代，即“必然王国”。

新经济政策作为建立“自由王国”漫长道路上的必经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形成激发劳动人民社会和文化创造力的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形成利用固定资产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直接的经济社会组织关系。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着很多内部矛盾，但在极端不利的内外部条件下仍有完成革命、促成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可能。新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应该由整个社会异化关系（市场、私有财产、资本、国家和官僚机构）的消亡（但不是官僚主义的迅速崩溃）和共产主义原则的落实来决定。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验，它们对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在前文，我们已重点提到过历史背景的重要意义，即，将历史事件置于历史进程之中观察。在审视“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同样将其历史背景视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必要条件：

（1）劳动者取得反沙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但同时，国家制度带有官僚主义畸变；<sup>①</sup>

（2）一战和内战破坏了迈向“自由王国”的基本物质和文化条件；

---

<sup>①</sup> 对此，列宁写道，“我们的工人国家带有官僚主义畸变”，参见 Ленин В.И. 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ах, о текущем моменте и об ошибках т. Троцкого. Речь на соедин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делегатов VIII съезда Советов, членов ВЦСПС и МГСПС - членов РКП(б). 30 декабря 1920 г.//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5-е изд. Т.42.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С.208.

(3)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外部对苏联形成了包围之势，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社会主义力量受挫。

在这种条件下，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就要做到：在激发劳动者先锋队社会创造力的基础上，利用好革命和国内战争胜利为人民带来的热情；同时要在苏联因官僚化变形的框架内，与“必然王国”的残余进行斗争。

以下三点是新经济政策的“秘密”所在。只有同时依靠这“三大支柱”，才能在夺取政权和控制经济核心部门的条件下，平稳推进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建设。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仅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苏联初期的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创造新社会的热情无处不在。新经济政策就是这种热情的体现。左翼历史学家经常“忽视”这方面的问题。列宁确实曾指出，“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革命所产生的群众热情来建立”，但左翼历史学家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属于旧世界的市场调节是必要的，它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重要补充。这里的重点不是数量上的比例。当然，对于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来说，新经济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和激励机制恰恰在于它的“旧”（属于“必然王国”），即，旧有的市场、旧有的私有财产制度，甚至是旧有的传统。但是，可以定义从“新经济俄罗斯”到“社会主义俄罗斯”这场转变性质的，是那些从革命和胜利中诞生的新关系、新价值和新动力，它们是“自由王国”的要素。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称“星期六义务劳动”为“共产主义的伟大开端”，他们委托国家政治保安局救助流浪儿童，派遣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到农村支教，他们给无产阶级文教机关的拨款比官员的薪俸都要多，在一个半贫困的国家支持创建数以万计的公共组织，它们遍及教育、艺术、技术、科学、体育、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等各个领域。（这种氛围在很多著作和论文中都可见一斑，如：安德烈·科尔加诺夫教授的小说《历史的轱辘》和他的历史理论著作《社会主义之路：实现与未竟》，以及本文作者之一布兹加林娜一系列关于苏联前十年群众社会创造力的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共同沿着这条“红线”前进，因为苏联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我们将使用那个时代的术语——都参与到清查、监督、管理、执行中来，他们发挥了重要功能，

这在列宁 1917 年直至去世前的作品中都有呈现，包括列宁晚年的著作《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所以它致力于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苏联当时制定和实施全国电气化计划，开设学校，开办医院，建立自愿合作社，恢复建立企业，避免反革命和外部侵略势力的干扰（下文还将提到更多苏联当时的举措）。充满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倾向催生了新经济政策的这条“红线”，它是苏联共产主义最初的萌芽，在与异化关系的矛盾统一中不断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早期共产主义者，背负着异化的“杂质”）性质。正因为如此，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这条“红线”，一直或多或少地沾染着异化的灰色尘埃。

社会主义诞生和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支柱”是“必然王国”中本来就存在的关系。“必然王国”不仅包括市场关系，还包括广泛的前市场关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村社制残余、宗法主义、阶级不平等、暴力）和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等。在新经济政策下，这条“黑线”也在悄然发展，但与之前的形式大有不同。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所有的异化关系都不同程度地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它们在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下发展，因此这条“黑线”有着（遗憾的是，不总是时时处处）即使不是纯红的、至少也是粉红的外框。

新经济政策的第三个“支柱”是官僚及其附庸，一旦国家获得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和带有异化因素的共产主义制度），官僚的“嘴脸”（我们借用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词）就暴露出来了。没有官僚，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的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机构就无法运作。官僚的附庸是世界历史几千年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在“必然王国”几千年的统治下，“类本质”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成了工具，变成了异化的奴隶，远离了自己的社会力量。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宣传（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小说《毒蛇》中曾有过形象的描述），都无法解救这个必然世界的行为体。只有将工人纳入社会和文化创造的进程——我们形象地称之为苏联历史的“红线”，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新经济政策的第三个主要支柱即“黑线”，是“红线”最危险的敌人，它像锈一样，从内部不知不觉地腐蚀着每一位创造者，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新经济政策的本质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反对异化力量的团结斗争。社会主义与异化这对矛盾的重点是从“新经济政策下的俄罗斯”转变为“社会主义

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建设初期，共产党人在艰难中摸索前进，共产主义必须将广泛的社会异化关系（宗法主义、市场、资本、官僚、从众心理）容纳进来。尽管如此，苏联仍然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虽然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畸形的形式，但社会主义已经蜕变为一个成熟的体系，为走向“自由王国”、消灭“必然王国”奠定了基础。

## 六、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评价 ——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是否改变了？

在明确了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后，我们需要提出一个疑问：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否与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变化有关？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且值得注意的最鲜明的观点，是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谈到的：我们应该原则性地改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不是断章取义，我们将在下文引用相关段落）。但是对于 20 世纪下半叶和 21 世纪初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从这句话中看到的不是从军事斗争到和平创造的过渡：最为肤浅的理解是在所谓的“列宁理论遗产”上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最深刻的理解也不过是将社会主义与新经济政策混为一谈的（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优点”的混合模式）认识。列宁的原意是什么呢？在此，我们要特地引用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的一段话：

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

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从以上引文可知，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实质是：从军事手段转向和平手段；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构；推进合作制（首先是农民）；进行文化革命（列宁在其他著作中多次强调过文化革命）。

现在让我们进行一番深入探究。除了政治评论外，列宁提出的任务与党纲规定的任务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得到了快速落实（其中包括列宁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因内战和国外武装干涉而被迫推迟的方案也快速落地。在当时，没有战时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打败世界帝国主义（那时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都反对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为了和平建设，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机构、文化革命和经济建设问题（利用市场、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手段）。这些任务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新鲜。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用一个全新的国家取代它——这个任务由马克思提出，列宁在革命前发展了该理论，并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进行了阐述。

革命实际上是要实现文化变革，将人作为进步的主体，未来社会的最高目标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明确，早在内战期间就在实践中得到了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1903年就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

前面引用的列宁的这段文字有何新意，以至于不断为后人所提及？其新意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建立新型社会关系、打造新文化、培养新人。战争、同反革命势力斗争不再是大多数人意识里的中心任务。其次，它强调了合作社的重要性，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革命之前就讨论、叙述过合作社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列宁撰写《论合作社》之前就成了最重要的工作方向之一（既是战略方向又是战术手段）。列宁十

---

<sup>①</sup> Ленин В.И. О кооперации//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5-е изд. Т.45.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С.376. 译文参见[苏]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1-372页。

分重视发展合作社，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对列宁来说，社会主义等同于“文明的合作社社员制度”？是否可以说，他去世前一年成了“合作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他曾说过“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脚跟”，但答案仍是否定的。因为农民的普遍合作是对已有事物的补充，我之前曾多次写过，最重要的是，普遍合作早已被付诸实践：包括生产社会化，全国技术创新计划（全国电气化计划），劳动者掌握权力（虽带有官僚主义的扭曲和矛盾，但仍然是苏维埃政权，关于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论述的国家机构根本变革，我们已在前文提到过）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出结论：列宁“社会主义观发生根本转变”适用的范围很小，它的具体历史意义在于从军事手段转向和平手段建立一个新世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特别是合作计划的实施，是否能够证明列宁在涉及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改变？答案还是否定的。我们无法在有限的文本中对此进行考证，但是那些按照我们的研究方法研究列宁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以下几点。第一，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属于劳动者，他们以不断消亡的国家作为自己的工具；社会主义只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最初阶段——列宁并没有修改这些基本纲领。第二，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适合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而且是适用于以农民为主的落后国家的政策，并不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佳模式，不具有普适意义。第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都没有提出立即将整个经济国有化的任务，也没有提出立即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和实物交换。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以及1917年冬至1918年的一系列著作中，列宁都没有提到过要直接“引入”社会主义，而是论述了将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提出要实行全国核算和监管。即使是内战结束后，也没有人质疑这些任务的必要性。实物交换和激进国有化是多数国家在紧急情况和战争时期都会应用的手段（需要注意的是，沙皇俄国时期就出现了余粮征集制，临时政府时期该制度继续推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在不断地发展、丰富、修正。列宁将新经济政策视为一个过渡时期、一件“严肃且长



期”的任务，应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十年甚至二十年）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列宁不认为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私人资本等做法是社会主义的最优模式。因此，列宁不应被当作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先驱。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绝不是主张在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应该放弃创造性地运用新经济政策与合作制。在创造性运用列宁思想时，我们需要警惕三个问题。首先，不能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子空间系统视作社会创造力的最终目标。其次，无法防止这种过渡制度走向腐败。在过渡期，需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最后，不能指望靠“突击”手段一蹴而就。诚然，在重大关头，这种手段十分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千百万“普通”工人参与到社会与文化的和平创造中来。列宁在晚期著作中写道，需要借助“文化教育”和文化革命激发民众的热情。

至此，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 21 世纪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建议中国同志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未来，更无法建议他们迈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但是，作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理论家和维护共产主义价值观及原则的社会活动实践者，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要想成功地迈向美好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制定出科学精准的战略，根据客观趋势制定发展战略目标，确保人与国家的和谐发展。在未来众多发展方向中，最重要的就是迈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的“自由王国”，中国共产党因共产主义而得名，它历经风雨，走过了百年历程。

其次，我们都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我们有一个理论上经过验证的策略，如果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沿着这条道路迈出第一步。如果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就要参照自己和同路人的经验，与他们并肩前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独自应对了很多挑战，然而，苏联 70 年的共产主义建设经验，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具有宝贵价值，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探索中也多次创造性地借鉴了这些经验。

最后，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是笔直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充满了曲折和困难，掺杂着胜利与失败。苏联的共产主义之路在 1991 年以悲剧收场。

但是，苏联共产主义者和苏联人民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为当今的社会主义者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希望苏联的成就和失败能够激励和警醒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使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避免苏联犯过的错误，扩大社会主义成果。

（翻译 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嘉亮，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校对 郭丽双）

---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celeb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o show the bright prospects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China has promoted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world communism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with creative work.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at many Chinese Communists regar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as their lifelong goals and the meaning of their liv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at is communism, how to judge 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alism, how to evaluate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Lenin's view of socialism, and then reveals the lessons of Soviet socialism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m is a social system that replaces all antagonistic social and economic forms. Its basic principle is to ensur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rough creative work, free control of time, and distribution on demand. The mankind is moving towards 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 premise is to liberate man from total alienation. The socialism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mmunism and a "mutation of socialism".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s a transi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ideal mode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reflec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Lenin's view of socialism. With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orrowe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China will lead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ocialism in the future.

**【 Key Words 】** Soviet Socialism, New Economic Polic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lobal Social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Значение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столетия со дня осн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светл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21 веке. Творческий труд Китая стал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скачка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21 веке.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ая причина успеха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мн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сделали достижение коммунизма целью всей своей жизни и её смыслом.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такие вопросы, как суть коммунизм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приро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ценки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ЭП) и взглядов Ленина на социализм,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значение урок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д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Коммунизм - эт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заменяющий все антагонистически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и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принципе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к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творческого труда, свободног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временем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по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движется к «царству свободы», которо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от полного отчужде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был первым этапом в развитии коммунизма, «социализмом-мутантом». НЭП была переходной теорией и практикой идеальной модели ранне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ражающей эволюционирующе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Ленина. Кита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ритически и творческ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десятилетний опыт и уро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й будет будущим лидером в развитии миров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ел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зм

---

(责任编辑 崔 珩)

## 转向“灾难外交”：切尔诺贝利事故中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外交行为探究\*

张菊萍\*\*

**【内容提要】**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初，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决策层内部两派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结果，并与决策参与者各自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相关联。一派以葛罗米柯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即以“灾难不外交”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即“灾难外交”。在救灾过程中，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由“灾难不外交”转向“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是由救灾需求所导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转向“灾难外交”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方式确有失误，但也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关键词】**切尔诺贝利事故 戈尔巴乔夫外交 “新思维” “灾难外交”

**【中图分类号】**D8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074(23)

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的爆炸与核泄漏事故。苏联作为彼时冷战格局的一极，如何向国际社会通报事故、开展事故的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成了戈尔巴乔夫（М.С. Горбачев）政府对外战略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起事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苏联政府的传统外交行为，而且揭示出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领域的革新意图与苏共高层保守意

\*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解体过程的俄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62）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张菊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见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探讨苏联政府围绕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外交行为，对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对外战略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史学界对切尔诺贝利事故进行的学术研究，或侧重于考察事故的救灾响应措施，<sup>①</sup>或将此次事故置于核电发展史的进程中，以追溯事故的个中成因。<sup>②</sup>即使有少数研究涉及苏联领导层围绕应对事故的决策过程，<sup>③</sup>也缺乏对事故外交决策方面的专门讨论，导致学界对事故后苏联政府外交行为与外交政策变化的解释并不充分。此方面的现有研究，多着墨于领导人和观念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而对苏联国内政治斗争关注较少。如阿奇·布朗提出，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强烈的“核忧虑”<sup>④</sup>是促成苏联外交变化的重要因素。祖博克认为，这种变化是戈尔巴乔夫为应对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而借势的选择。<sup>⑤</sup>罗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指出，事故救灾管理国际合作与开放性方面的经验教训，强化了苏联领导层内新思维支持者的立场。<sup>⑥</sup>随着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部分文件的解密和披露，<sup>⑦</sup>以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陆续

---

① David Marples,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Chernobyl disaster*,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1988; Медведев Г.У.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тетрадь. М.: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1990; Капица П.Л. Письма о науке.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рабочие, 1989; Zhores Medvedev, *The Legacy of Chernoby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Edward Geist, “Political Fallout: The Failur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t Chernobyl”, *Slavic Review*, 2015, Vol.74, No.1, pp.104-126.

② Сидоренко В.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ой// История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России. 2001. Выпуск 1. С.217-239; Бурлакова Е.Б, Кузнецов В.М. (ред.)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Чернобыль: история, события, факты, уроки. М.: МНЭПУ, 2006; S.D. Schmid, *Producing Power: The Pre-Chernobyl History of the Soviet Nuclear Indust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5.

③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М.: Другие берега, 1992; [俄]皮霍亚:《苏联政权史》，徐锦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31-542页。

④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30-231.

⑤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2-396页。

⑥ Robert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5-222.

⑦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Родина. 1992. №1. С.83-87;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М.: Другие берега, 1992; Барановська Н.П.(ред.) 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а Трагедія: Документи і матеріали. Київ: Київ наукова думка, 1996; 叶利钦政府另将部分相关文件收录于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РГАНИ)的89号全宗(Фонд 89)里。

出版,<sup>①</sup>苏联领导层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外交决策过程得以大致勾勒出来。本文将结合苏联决策层档案、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报刊信息等史料,借用“灾难外交”概念,梳理事故发生初期苏联政府相关的外交活动,并试图考察其决策过程,以分析此一阶段苏联政府外交行为的动因。

虽然目前学界对“灾难外交”(Disaster Diplomacy)尚无明确、统一的界定,不过相关研究已关注到灾难带来的外交机会。<sup>②</sup>康福特(Louise Comfort)等人认为,基于政治行为体对“共担风险”的科学认知,“灾难外交”可作为一国外交的催化剂,具有“切实但并非主导性”的作用,加以适当发展,对外可促进政治行为体之间的长期合作,对内则可加速国内政治改革,化解国内各方的冲突,提供冲突各方接触与合作的机会。<sup>③</sup>另一种意见认为,灾难之下的外交来往,由于援助方政治意图的不确定性、受灾国因此面临外部干预的两难困境,使“反思灾难外交”或“灾难不外交”才更具解释力。<sup>④</sup>本文中,“灾难(不)外交”涉及的苏联政府行为包括:发布及通报切尔诺贝利事故信息,<sup>⑤</sup>回应外国政府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和外国个人)合作及援助意愿,以及在境外采购所需救灾物资。

---

①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Э.А. Мой выбор: 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вободы. М.: Новости, 1991; Воронников В.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2003; Ковалев А.Г. Искусство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2016; [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俄]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 Christa Maciver, “Disaster Diplomacy: A Brief Review”, December 2012, <https://sai-dc.com/wp-content/uploads/2014/07/Disaster-Diplomacy-FINAL-Lit-Review.pdf>

③ Louise K. Comfort, “Disaster: Agent of Diplomacy or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 Vol.14, No.1, pp.277-294.

④ Lino Naranjo Diaz, “Hurricane Early Warning in Cuba: An Uncommon Experience”, October 2003, <http://www.islandvulnerability.org/cuba/NaranjoDiazMichelle.pdf>; Ilan Kelman, “Mirror Disaster Diplomacy or Inverse Disaster Diplomacy”, May 11, 2004, <http://www.disasterdiplomacy.org/projects.html#mirror>; Ilan Kelman, “Disaster Diplomacy is Dead! Long Live Diplomacy!” January 13, 2004, <https://www.scoop.co.nz/stories/HL0401/S00038.htm>

⑤ 此处借用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概念,现代危机管理制度中的“信息沟通与公开制度”包括信息报告、通报、通知与发布制度。信息报告的对象是同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信息通报的对象包括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国内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不同的行政区域,通知的对象是受事件影响的公民和单位,信息发布的对象是公众和媒体。可参见闫绪娴:《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69-171页。

本文认为，在事故的紧急应对阶段，苏联政府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是苏共领导层中两派意见相争的结果：一派以葛罗米柯（А.А. Громыко）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另一派则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随着救灾进程的推进，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不得不由前者主张的“灾难不外交”转向后者提议的“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由救灾客观需求所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本文将“事故的紧急应对阶段”界定为事故发生后，直至系统的救灾政策成型，即至1986年5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进程及加强工作的决议》为止。此一阶段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发生转向，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方式确有失误，但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动力机组突发爆炸事故。如果考察以往苏联政府在核事故发生时的“灾难外交”，会发现其从未主动承认过该国涉及核工业领域的事故，<sup>①</sup>因此也无从考察苏联与其他国际主体就事故展开的外交活动。苏联政府不发布核工业事故信息，是因其一贯将核领域的事故与对外战略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对外战略总体上服务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偏重于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而非合作，即使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时有缓和，也仍以追求相对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优势为目标。<sup>②</sup>若承认该国核工业领域发生重大事故，就意味着

---

① David Marples, *Chernobyl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SS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1. 苏联政府未承认过，并不是说此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故。1979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苏联生物学家若·梅德韦杰夫首次揭露1957年乌拉尔核泄漏事故，在西方引起了极大反响，不过苏联并未予以承认。可参见Z. Medvedev, *Nuclear Disaster in the Urals*, New York: W.W. Norton, 1979. 1990年作家格·梅德韦杰夫披露苏联更多不为人所知的核事故，如1966年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梅列克耶斯市（现俄罗斯季米特洛夫格勒市）一个沸水堆的中子反应失控，致使两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受到辐射。Медведев Г.У.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тетрадь. М.: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1990. С.10.

② 左凤荣：“从对外战略的角度看苏联剧变的原因”，《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2期，第64-69页。

苏联核军工体系的败絮之处将暴露于睽睽之下，不利于维持苏联苦心经营的军事优势。

戈尔巴乔夫政府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并不意味着苏联高层不知晓事故情况。26日清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Н.И. Рыжков）等人即获悉该电站发生事故。<sup>①</sup>上午11时，政府临时委员会成立，并于当晚8时抵达切尔诺贝利地区。<sup>②</sup>27日凌晨，政府临时委员会与莫斯科取得联系，告知后者情况比先前获悉的更严重，<sup>③</sup>但苏联政府的态度仍是秘而不发。

促使苏联领导层意识到应讨论事故信息发布问题的，是国际社会对欧洲部分地区核辐射水平升高的关注。28日上午，国际原子能机构从瑞典能源部获悉，该国东部的福尔马克核电站检测到当地辐射水平升高，瑞典推断此现象的源头在境外。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致电包括苏联在内的多国，询问有无异常，苏联并未马上承认。不过美国与欧洲的间谍卫星已经转向苏联，发现乌克兰核电站废墟中裂开的洞口飘出了烟幕。<sup>④</sup>除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问询外，在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开始前，已有十多个国家的驻苏大使联系苏联外交部，表示奉其各自政府的紧急命令，要求苏联就各国大气、土壤和水中出现放射性元素做出解释，并要求立刻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Э.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或其副手见面。<sup>⑤</sup>

在稍后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管重工业等领域的苏共中央书记多尔吉赫（В.И. Долгих）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前事态做出初步报告。针对事故的信息政策，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如何开展事故的信息工作，第一种意见认为信息控制工作并不重要，如多尔吉赫提出，控制放射源的工作才是重点。第二种意见由戈尔巴乔夫提出，他认为必须尽快提供事故信息，包括利加乔夫（Е.К. Лигачев）、

---

① [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48页；[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168页。

② [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169页。

③ Воротников В.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С.114.

④ Thomas Johnson, *The Battle of Chernobyl* (Documentary film), Discovery Channel, 2006.

⑤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Э.А. Мой выбор: 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вободы. С.287.



沃罗特尼科夫 (В.И. Воротников)、阿利耶夫 (Г.А. Алиев)、切布里科夫 (В.М. Чебриков)、雅科夫列夫 (А.Н. Яковлев)、多勃雷宁 (А.Ф. Добрынин) 在内的多数政治局成员也赞同此种意见。<sup>①</sup>

因此, 信息内容成了接下来讨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认为, 发布的信息中“应当讲发生了爆炸, 以及正在采取措施控制其后果”。切布里科夫补充指出, 还可以提及政府正在援助受灾者。<sup>②</sup>实际上, 此次会议批准的信息文本也仅包含这些内容, 甚至未指出事发的时间和具体的受损反应堆。这是因为会议还同意了葛罗米柯的建议, 信息应当“写得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不安和慌乱”, <sup>③</sup>即应尽量少提供信息。葛罗米柯提出的这一建议, 是基于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对苏联对外战略目标的一贯理解, 即苏联对外政策强调的是“冷战”中与西方的竞争和对抗。

不过, 尽管葛罗米柯和戈尔巴乔夫都认为应该提供事故信息, 但前者建议只面向“朋友们”, 因为他们从苏联处购买核电站设备; 后者则认为, 应首先告知苏联民众。<sup>④</sup>在此问题上, 会议采纳了戈尔巴乔夫的意见, 未专门向“朋友们”告知事故情况。<sup>⑤</sup>根据 28 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 <sup>⑥</sup>批准的信息经塔斯社, <sup>⑦</sup>由当晚 9 点的苏联新闻节目《时间》和莫斯科广播电台予以播报。与此同时, 苏联国家原子能利用委员会 (ГКАЭ) 主席彼得罗相茨 (А.М. Петросьянц) 也将此信息告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sup>⑧</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第一次会议, 是苏共领导层摸索事故相关政府外交行为的开端。以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提供事故信息为前提,

---

①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 Первые дни после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варии// Вестник. 1996. №.5. С.89-90.

②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8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от 28 апреля 1986 года//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1. л.3.

③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 Первые дни после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варии. С.89-90.

④ Там же.

⑤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8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от 28 апреля 1986 года//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1. л.1-2.

⑥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8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от 28 апреля 1986 года//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1. л.3.

⑦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исполняется 30 лет. 26 апреля 2016 г. <http://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3237411>

⑧ Thomas Johnson, *The Battle of Chernobyl* (Documentary film).

会议听取了葛罗米柯的建议，未提供过多信息，同时也依照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将信息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发布。这种信息政策，在引发国际社会震动的同时，也说明苏共决策层的两种意见分歧已经出现端倪。

## 二

事故信息一经公开，国际社会反响极大。波兰向苏联索要更多信息。<sup>①</sup>瑞典、芬兰和丹麦担心放射性污染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国土，强烈批评苏联的行为。这几个国家的代表要求获取事故规模、原因、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进度等信息，尤其是瑞典代表还试图提出索赔事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地利大使馆也表示担心事故地区侨民的安全。<sup>②</sup>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如美国合众国际社、《纽约时报》等，<sup>③</sup>开始指责苏联政府对事故的表态落后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就在这时，有关此事故的国际舆论开始发酵。4月29日，美国合众国际社发布了一条有关事故死亡人数的消息，被其他媒体如《纽约时报》《普罗维登斯杂志》《西雅图时报》等大量引用。<sup>④</sup>美国媒体还强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规模超出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许多倍，乌克兰大面积的产粮区和第聂伯河流域受到辐射污染。<sup>⑤</sup>此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称，一些在苏的外国外交家和记者正尝试收集事故的详细信息。<sup>⑥</sup>

29日，政治局依前一日会议的决定，<sup>⑦</sup>继续开会讨论相关问题。戈尔巴

---

①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С.90.

② Записк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ЦК КПСС. 30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6.

③ Anna Christensen, "Soviets Say Reactor Damaged in Ukraine Nuclear Accident", *UPI's 20th Century Top Stories*, April 28, 1986; "Soviet Announces Nuclear Accident at Electric Plant",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86.

④ "Nuclear Disaster: A Spreading Cloud and an Aid Appeal; U.P.I. Says Toll May Pass 2,000",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86; Ростова Н. О том, какими были перв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о катастрофе. <https://republic.ru/posts/67168>

⑤ Записк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ЦК КПСС. 30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7.

⑥ Записка Чебрикова ЦК КПСС о реак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ипломатов 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ов на сообщение об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30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12.

⑦ Воротников В.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С.114.

乔夫在会上指出，相比于周边国家，苏联对事故做出的反应太小。关于如何防止国际舆论进一步发酵的问题，与会人员提出了不同看法。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均鲜明主张相对开放的信息政策。前者指出，在当前态势下，所有人都有理由向苏联索要信息。因而他认为，苏联应当提供更多信息，并准备好原始数据，将信息提供给其他国家，“以免事情变得戏剧化”。例如应公布已采取的措施、参与事故处理的部队、对气象监测的各组织的情况，让人们知道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越诚实越好”。<sup>①</sup>雅科夫列夫也提议，应就此次事故面向在莫斯科的 500 位外国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与他们所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观念一脉相连。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便已展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对外战略思想。<sup>③</sup>1984 年 12 月访英时，他向英国议会表示，“冷战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它不断带来军事威胁。人们生活在相当脆弱但又相互关联的世界，对战争与和平的传统看法尤因核武器的性质而改变，核时代必将产生“新的政治思维”。<sup>④</sup>戈氏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这篇演说中的许多看法，在苏共二十七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得以体现。这一文件中所阐述的对外战略理论，虽然保留了不少旧调重弹的措辞，但突破了斯大林主义两极阵营对立的世界观与安全观，强调人类在核时代存在着共同利益与普遍安全关切。

雅科夫列夫是这一思想的坚定拥护者，甚至比戈尔巴乔夫有过之而无不及。1983 年夏，戈尔巴乔夫率团出访加拿大时，与时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戈尔巴乔夫返苏后不久，雅科夫列夫便被召回国，出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从而实际上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非正式顾问之一。同时，该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经济与外交

---

①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С.92.

② Там же.

③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M.P. Leffler and O.A. Westa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45-248.

④ Горбачёв М.С.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ом 2.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С.109-116.

政策建议，可通过他直接上达最高决策层。<sup>①</sup>此外，雅科夫列夫对新思维的直接拥护还体现在苏共二十七大会报上。该报告奠定了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雅科夫列夫则在其起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②</sup>他本人回忆道，改革者们不得不“狡猾地”在二十七大的文件中加入一些语句，如“一个矛盾重重、然而相互依存、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世界正在艰难地、某种程度上仿佛是在摸索着形成之中”。雅科夫列夫认为，此番说辞即意味着坚决背离“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方针，是对两个体系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怀疑；亦是旧体制条件下，政治高层发出的关于主要国际进程全球化的第一个信号。<sup>③</sup>

依据相对开放的对外战略思想，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信息发布问题上，认识到此次事故的后果需要苏联与世界共同应对。而政治局会议上的另一种看法则相对保守，其支持者试图从不同角度说明，公布更多详细信息对苏联无益。

例如，多勃雷宁表现出对民众反核运动的担心。他自1962年起担任苏联驻美大使，1986年3月刚被召回苏联。多勃雷宁以美国的核电站事故为例，指出事故后美国出现了反对建设核电站的民众运动，致使美国仍未建起一座新的核电站。<sup>④</sup>1985年，核能发电占全苏总发电量的10%，<sup>⑤</sup>且该比例仍计划增长。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90年，核能发电将占全苏总发电量的20%以上，到20世纪末将占到33%。<sup>⑥</sup>倘若信息公开导致苏联国内出现任何类似的“反核运动”，无疑是对苏联核电计划的致命打击。此外，多勃雷宁还特别强调美国可能的宣传攻势。在前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指出美国定会利用此次事故来展开反苏宣传。此次会议中，他再次强调“里根桌子上已经有（事故的）照片了”<sup>⑦</sup>。多勃雷宁对事故信息发布问题

---

①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75.

② [俄]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0-374页。

③ 同上，第371-372页。

④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С.90-93.

⑤ 陆南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164页。

⑥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⑦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С.89-93.

的看法，一方面是顾虑民众反应会干扰本国核电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美苏对抗的思想，担心美国方面会从中作梗。

葛罗米柯也认为应限制事故信息发布的范围，他主张告知“兄弟国家”“更多”信息，告知华盛顿和伦敦“一定”信息。<sup>①</sup>此次会议完全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事故相关信息“分别转达给苏联国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党的领导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和领导人”。<sup>②</sup>根据此次会议决议中接收事故信息国家的名单推测，这一建议体现了苏联的现实利益考虑。

首先，这一名单排除了苏联决策层唯意识形态是重的可能性。苏联政府仅向八个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和南斯拉夫）发送了拟定好的事故信息，此八国均为经互会国家。<sup>③</sup>当时经互会是苏联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伙伴。<sup>④</sup>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经互会框架内与苏联签订核电站项目合作的国家正为此八国。<sup>⑤</sup>苏联在出口核电站相关技术的同时，也借机营造其核工业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例如 1983 年 2 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一次核技术讨论会上，苏联原子能出口公司称，苏联为经互会国家建造的核电站运行顺利，电站设备与系统基本未发生过严重事故。<sup>⑥</sup>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也在 28 日的政治局会

---

①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С.90-93.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КПСС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29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2. л.1.

③ 其中，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古巴为经互会正式成员国，南斯拉夫为咨询国。

④ 1985 年苏联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总额约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54.87%。参见陆南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 653-654 页。

⑤ 1979 年 6 月，苏联与七个经互会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和南斯拉夫）政府签订了 1981 至 1990 年期间共同生产、互相供应核电站设备的多边国际专业化协定。参见 A. Panasenkov, “Co-operation among CMEA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Its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PT”, *IAEA-Bulletin*, 1980, Vol.22, No.3/4, p.96. 而古巴已于 1975 年与苏联签署《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协定》和《在原子能领域建立直接科技合作的协定》，次年双方签署协议，由苏联帮助古巴建造位于西恩富戈斯省的胡拉瓜核电站。参见 James F. Keeley, “A list of bilateral civilian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s”,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Winter 1994,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p.125-127.

⑥ 王建京（译）：“苏联向国外提供售出后的技术援助”，《国外核新闻》，1983 年第 9 期，第 28 页。

议上被提及，葛罗米柯当时即建议专门向购买相关设备的“朋友们”通报事故信息。<sup>①</sup>因此，29日政治局会议的相关决定，实则是向经互会与苏联存在核电站项目合作的国家通报事故信息，具有维护本国核电工业声誉、宽解核电站项目合作国情绪之意。

同样地，苏联政府将稍有不同<sup>②</sup>的事故信息仅发送给了二十二个资本主义国家，<sup>③</sup>这一行为很可能针对的仅是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下简称《最后文件》）且与苏联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1973-1975年，欧洲国家及北约非欧洲成员国在赫尔辛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欧洲安全与合作问题。会议拟定并通过了《最后文件》。该文件分为四部分，其中一部分便是《关于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其内容规定，与会国应在控制空气、水污染和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开展合作。一方面，苏联政府决定向其通报事故信息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均签署了《最后文件》；另一方面，签署该文件的资本主义国家仅有五个<sup>④</sup>未被包括在苏联发送事故信息的名单内，其中四个<sup>⑤</sup>未与苏联建交。《最后文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西方缓和的氛围中。1984年年底，戈氏访问英国时多次提及该文件，并指出其“仍是欧洲、甚至欧洲之外相互理解与合作趋势的活力之源”。<sup>⑥</sup>因此，葛罗米柯将事故信息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议是基于履行国际准则的义务，具有希望减轻国际舆论对其指责之意。

由此次会议的结果来看，保守意见占据了上风：会议决定搁置召开新闻

---

① [俄]皮霍亚：《苏联政权史》，第533-536页。

② 相较于发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息，在发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本末尾多了两句话：“（指示苏联驻各国大使们向驻在国领导人）阐明类似的信息将会转达给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领导人。补充说明在必要的情况下我方将告诉朋友们一些额外信息。”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КПСС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29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2. л.3-6.

③ 即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芬兰、挪威、瑞典、希腊、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马耳他、塞浦路斯、土耳其、加拿大。

④ 即冰岛、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

⑤ 即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

⑥ Горбачёв М.С.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ом 2.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С.113.

发布会的提议，批准发布的信息文本<sup>①</sup>也仅包含对救灾情况的简单陈述，另备有额外信息<sup>②</sup>发往苏联驻上述三十国大使处。此种对事故信息的限制，与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中“我们越诚实越好”的表态显然背道而驰。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重要的外交决策者”，未能实践其原有主张的原因有二。

其一，戈氏提出的对外战略新思维，在苏共领导层中本就引起保守派的颇多质疑，对其实践构成阻力。1984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在英国议会的讲话，尽管并未言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性转变，但“包含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和语气”，<sup>③</sup>引发了葛罗米柯的不满并指责前者“出尽了风头”。<sup>④</sup>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又与葛罗米柯在苏联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主张。多勃雷宁指出，戈尔巴乔夫在制定他自己的外交路线并得到政治局批准之前，不得不继续执行由葛罗米柯反复推敲的外交路线。<sup>⑤</sup>1985年11月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谈结束后，苏联加大力度制定优先考虑的政策的工作，<sup>⑥</sup>并于次年年初提出了一份走向无核世界的纲领。戈尔巴乔夫回忆称，此时的苏联领导层中还有人心存疑虑，认为这只是“冷战”中的蛊惑手段。<sup>⑦</sup>与这份纲领同时筹备的，还有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等文件。当时苏共国际部部长、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Б.Н. Пономарев）参与撰写二十七大会报告中外交政策部分的内容，修改委员会认为该部分未能反映“新思维”。波诺马廖夫气愤地驳斥道：“什么‘新思维’？我们的思维是正确的！让美国人去改变他们的思维吧！”<sup>⑧</sup>

其二，尽管为减少这种阻力，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后不久，通过任命

---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КПСС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29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2. л.3.

② 发往前述三十国的信息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上，简要补充说明了辐射污染的扩散方向及辐射水平。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КПСС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29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2. л.1-2.

③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246.

④ [俄]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47页。

⑤ 同上，第645-647页。

⑥ [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第735页。

⑦ 同上，第736页。

⑧ [俄]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650-651页；[俄]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65页。

身边官方及非官方的助手和顾问、改变政治局人员构成等方式，使苏共领导层内部对外交政策等的影响力与权力的倾斜得到了调整，<sup>①</sup>但他个人的行事风格与性格特点，也促使他改变了处理事故信息发布问题的原有立场。在29日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听取了保守派的意见后，反应不尽相同。戈尔巴乔夫表示妥协，赞成发布一条关于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进程的信息。而雅科夫列夫则反驳称，如此一来，外国记者将会寻找一些流言。对此，葛罗米柯强调，不应在通告中过多“戏剧化”现状。<sup>②</sup>最终雅科夫列夫寡不敌众，此次会议确定的信息发布政策还是由保守意见主导。究其原因，是会议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作为昔日同僚，雅科夫列夫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冒险主义”，他随时力图做到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希望拖延采取行动和做出决定，以免“再次惹恼他认为对于保持秩序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sup>③</sup>他还会避免公开维护自己的支持者，“这是出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考虑”。<sup>④</sup>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信息政策是苏联政府“灾难外交”活动的基础，保守的事故信息政策必然限制相关的外交活动，这使得此一阶段苏联政府对事故的反应呈现出“灾难不外交”的形式。苏联政府证实，事故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政府纷纷来函，提出援助苏联政府消除事故后果。<sup>⑤</sup>对此，苏联外交部建议婉拒外国政府的援助，只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感谢，并可表明在当前阶段尚无其他国家协助的需要。<sup>⑥</sup>苏联决策层落实了此项建议。4月30日，苏联政府向驻部分国家的大使发出指示：“苏联拥有足够的资源和科技能力进行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目前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协助。若驻在国愿提供这类帮助，要表示感谢。”<sup>⑦</sup>

---

①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外交领域的人员调整及其影响可参见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p.212-220.

②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 Первые дни после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варии. С.92-93.

③ [俄]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第425页。

④ 同上，第399页。

⑤ Записк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ЦК КПСС. 30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6-7.

⑥ Там же. л.8-9.

⑦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Родина. 1992. №.1. С.84.



事故发生之初，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达了积极的关切。<sup>①</sup>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早先向苏联提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并不打算对此次核电站事故开展调查，只是想向苏联政府寻求相关解释。<sup>②</sup>虽然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发送一份解释信息，<sup>③</sup>但在一次政治局切尔诺贝利事故工作组会议上<sup>④</sup>，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А.Г. Ковалев）提出布利克斯想访问莫斯科和切尔诺贝利地区，工作组并未予以明确答复。<sup>⑤</sup>

此外，国外个人援助意愿也被苏联决策层置诸高阁。4月29日，美国知名“红色资本家”、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A. Hammer），通过苏联驻华盛顿使馆临时代办奥列格·索科洛夫（Олег Соколов）及多勃雷宁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一封信，请求苏联准许美国医学博士盖尔（Gale）赴苏协助治疗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病人。<sup>⑥</sup>据科瓦廖夫回忆，政治局工作组在讨论盖尔医生赴苏问题时，没有表达清晰的态度，还有人不无尖酸地认为苏联的外科医生做得不会比盖尔差。政府临时委员会中许多人都担心，病人们居住环境糟糕、衣不蔽体、穿着胶鞋，会在外国医生面前呈现出一个“体面国家”不体面的一面。<sup>⑦</sup>故而苏联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盖尔医生的协助意愿。

苏联政府的“灾难不外交”不仅限制了外界对事故的了解，还将围绕事故可能展开的国际合作与救援拒之门外。其结果是国际舆论情况进一步恶化，救灾工作也遭遇瓶颈。

---

①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对美、苏施加的是最低限度的控制承诺，故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苏联政府无强制性约束力。相关背景可参见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old War History*, 2016, Vol.16, No.2, pp.177-193.

② Записк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ЦК КПСС. 30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8.

③ Воротников В.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С.115-116.

④ 推测是在4月29日晚的政治局工作组会议上，科瓦廖夫报告了布利克斯意欲访苏之事，因为4月30日科瓦廖夫未参加工作组会议；5月1日工作组已开始将国外援助意愿纳入考虑范围。可参见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250-262.

⑤ Ковалев А.Г. Искусство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402-403.

⑥ Хаммер А. Мой век - двадцатый. Пути и встречи. М.: Прогресс, 1988. С.11.

⑦ Ковалев А.Г. Искусство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403.

### 三

苏联外交部报告，切尔诺贝利事故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首先，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5月1日，华沙街头发生反苏骚乱，现场的传单指责苏联没有及时通知事故信息，也没有防护好核反应堆。同时，苏联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开始被事故波及。丹麦当局禁止从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进口食物，新西兰的右翼分子提出禁止苏联商品入境。5月1日起，联邦德国的边境检查站针对全苏汽车运输总局的车辆进行重点检查。印度、古巴也开始出现谨慎与苏联在核领域合作的声音。还有一些西方媒体指责苏联正在倡议的核裁军路线不过一纸空文。<sup>①</sup>

在国际舆论质疑的同时，苏联国内的救灾能力也捉襟见肘。在灾后去辐射污染的工作中，苏联缺乏相关的材料和设备。4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民防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会议明确指出，苏联民防的去辐射污染工作组组织得十分糟糕，所需设备和材料缺口巨大，人员和设备没有防辐射保护，无法靠近放射污染严重的区域。<sup>②</sup>另外，雷日科夫回忆，当时苏联救治伤者所需的药品也极为紧缺。<sup>③</sup>

基于上述压力，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加入政治局工作组。雅科夫列夫曾受政治局工作组之邀，列席过工作组的会议。他在回忆录中指责工作组成员里没有加入宣传领域的人，事故“由有关的中央各部中的军人来负责报道”。<sup>④</sup>自5月1日起，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工作组固定成员的位置上。<sup>⑤</sup>如前所述，雅科夫列夫坚持苏联政府围绕事故的外交行为应相对开放。根据沃罗特尼科夫的说法，为保证新的信息工作，政治局工作组后来吸纳了雅科夫列夫，由其负

---

① Записк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ЦК КПСС. 3 ма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13-14.

② Воротников В.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С.115.

③ [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175页。

④ [俄]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第334页。

⑤ Протокол №.3 заседания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групп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1 ма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1. д.19. л.1.

责修改发布到刊物上的有关事故的官方信息。<sup>①</sup>雅科夫列夫加入政治局工作组，一方面意味着前一阶段苏联政府的“灾难不外交”宣告失败，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围绕着事故的外交行为逐步转向了“灾难外交”。

首先，苏联政府通过外交渠道通报了更多的事故信息。4月30日晚，科瓦廖夫依照指派，安排彼得罗相茨等专家同“尤为关心切尔诺贝利信息的各国驻苏大使”进行了交谈。科瓦廖夫称，此次会谈中专家使用的事实和论据，让大使们的情绪安定了不少。<sup>②</sup>同时，苏联政府还扩大了事故信息的通报范围。5月1日，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杜比宁（Ю.В. Дубинин）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了苏联所有的官方消息。<sup>③</sup>同日，政治局工作组会议决定筹办有关事故的新闻发布会。<sup>④</sup>两天后，政治局工作组即确定了新闻发布会举办的时间与地点。<sup>⑤</sup>

除通过外交渠道向一些国家透露更多信息之外，塔斯社授权发布的事故信息愈加具体和丰富。如5月1日《时间》电视节目播报的政府信息中提到：“18位病人遭到重度辐射”“无外国人伤亡”。3日，莫斯科电台报道了前一日雷日科夫、利加乔夫访问切尔诺贝利事故地区的消息。4日，《时间》节目第一次放出了一张事故现场图片等等。<sup>⑥</sup>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苏联决策层开始考虑发布更多的信息，仍会对相关内容进行筛选与保留，以防事态发展“戏剧化”。如，尽管5月1日公布了“18位病人遭到重度辐射”的消息，但在两天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成员们还得知“10位病人为极重度状态”。<sup>⑦</sup>5月1日工作组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还决定“为准备报刊和电视素材，见证切尔诺贝利核电

---

① Воротников В.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С.115-116.

② Ковалев А.Г. Искусство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404.

③ [俄]杜比宁：《巨变的时代——前苏联大使杜比宁驻美札记》，王仲宣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④ Протокол №.3 заседания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групп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л.2.

⑤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262.

⑥ Alexander Amerisov, “Chernobyl, the emerging story: A chronology of Soviet media coverag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986, Vol.42, No.7, pp.38-39.

⑦ Чтобы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забывали об этом факте: Первые дни после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варии. С.91.

站周边地区正常的日常生活，派一组苏联记者前往这些地区”。<sup>①</sup>5月3日，外交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紧急增加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信息量，要尽可能地具体，特别是公布有关核辐射水平的绝对数字”。<sup>②</sup>不过从苏联政府后续实际行动中可知，官方发布的信息量虽有所增加，但未公布“有关核辐射水平的绝对数字”。

在公布更多事故信息的同时，苏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利用外国物资开展救灾活动。5月1日，政治局工作组指示对外贸易部紧急签订合同，从国外采购苏联卫生部所列清单上必要数量的药物。<sup>③</sup>5月3日，工作组要求卫生部在24小时内准备好一份提案，列出需要从国外获取的药剂、仪器、医疗器械，并转交给对外贸易部，由后者尽快与国外公司谈判采购事宜。<sup>④</sup>5日，苏联政府即找到了药品的卖家。<sup>⑤</sup>除药品外，5月3日，苏联政府决定从法国购买专门的乳胶和相应的技术设施喷涂污染表层，由对外贸易部紧急谈判、采购。<sup>⑥</sup>5日，苏联对外贸易部便从法国采购了9.6吨去除表层放射性污染所需的乳胶。<sup>⑦</sup>苏共领导层也开始考虑国外各领域专家赴苏参与救灾的提议，不过并非完全基于国内的实际需求，而是倾向于根据申请者对事故所持的立场，判断是否接受此类援助。

对于以个人名义提出援助的外国专家，苏联政府态度谨慎。5月1日，政治局工作组指示苏联卫生部考虑放射性疾病领域的国外顶尖医生赴苏的提议。<sup>⑧</sup>是日，哈默收到苏联方面的回复，称同意盖尔医生访苏。当天，盖

---

① Протокол №.3 заседания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групп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1 ма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1. д.19. л.3.

② Записк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ЦК КПСС. 3 ма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17.

③ Протокол №.3 заседания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групп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1 ма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1. д.19. л.2.

④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260.

⑤ [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175页。

⑥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261.

⑦ Там же. С.268.

⑧ Протокол №.3 заседания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групп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1 ма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1. д.19. л.3.

尔医生即启程飞往莫斯科。<sup>①</sup>不过此时并非所有外国专家提出的赴苏援助意愿都为苏联所接受。5月4日，政治局工作组接受了同样由哈默引荐的美国医学博士寺崎（Tarasaki）教授，却搁置了法国巴黎血液病和免疫遗传病学院院长马特（Matt）教授的援助意愿。<sup>②</sup>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了苏联政府“灾难外交”的突破口。苏共领导层在与该机构接触之初，更在意的是这一国际组织关注此次事故的意图。该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在得知事故发生在苏联后指出，若苏联向该机构提供相关数据，将有助于防范蓄意策划的骚动。他还援引事实说，美国在1979年三岛核电站事故几个月后，便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详细信息。<sup>③</sup>当时苏联决策层未对此建议做出回复。在国际舆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5月3日，苏联外交部建议，为对抗反苏运动，考虑到“布利克斯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客观态度、其在此方面社会舆论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所表达的意愿”，可邀请布利克斯于五月中旬访问莫斯科。此外，外交部认为以布利克斯的访问为由，还可避免其他国家和组织派自己的专家赴苏。<sup>④</sup>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正式邀请汉斯·布利克斯访苏。<sup>⑤</sup>当日，布利克斯即抵达莫斯科。6日，科瓦廖夫奉命会见布利克斯及其同事，负责观察来访者的情绪，试探“他们如何评价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规模及其潜在危险”。科瓦廖夫的结论是，会谈中布利克斯及其同事表现平和，没有任何想要夸大事故的意图。<sup>⑥</sup>同日，政治局工作组即批准国家水文气象和自然环境监督委员会的提议，同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系统地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辐射水平。<sup>⑦</sup>5月10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布利克斯明确表示，人类需要在原子能领域相互协商，国际原子能机构便是平台。他肯定了苏联在此方面的实际行动：苏联专家答应前往维也纳进一步讨论救灾结果，也将及时向该机构通报辐射情况。正如布利克斯所言，“就在我们

---

① Хаммер А. Мой век - двадцатый. Пути и встречи. С.12.

②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265.

③ Записк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ЦК КПСС. 30 апрел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8.

④ Там же. л.17.

⑤ Заседа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5 мая 1986 г.// АПРФ. ф.3. оп.120. д.66. л.1-18. С.103.

⑥ Ковалев А.Г. Искусство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405.

⑦ Ярошинская А.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273.

从莫斯科出发的今天，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信息渠道开启了”<sup>①</sup>。

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转向“灾难外交”，并不意味着其领导层愿意将事故的话语权拱手让人。苏联政府开始利用官方言论和表态，将这一民用原子能事故与其军用原子能政策相关联，用以宣传当时戈尔巴乔夫政府单方面缩减核武器、缓和国际军备竞赛的政策立场。5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需要以此事向所有人发出一种信号。要使舆论转向我们缩减军备的各项步骤。这种情况[指事故]也正说明，在和平的环境下不能容忍发生核战争。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这一点。”<sup>②</sup>次日，在苏联政府首次切尔诺贝利事故新闻发布会上，政府临时委员会第一任负责人谢尔比纳（Б.Е. Щербина）的发言即遵循了这一路线。他指出，切尔诺贝利事故使政府、人民和全体人类无权忘记核武器的危险，而这正是停止核试验、削减核武器的出发点。此后谢尔比纳便将立场转移到苏联缩减核军备的倡议上，表示苏联愿意将地球从核武器中解放出来，安全、和平地利用原子能。<sup>③</sup>

苏联政府围绕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外交行为向“灾难外交”转变的趋势，于5月5日正式确定下来。当日政治局会议决议承认该起事故的规模之大与形势之复杂。苏联政府的救灾工作由紧急应对转向有计划应对，其中对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方式也趋于系统、完整。决议还认为，应继续在报刊上公布有关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进程信息，并将信息传达给地方民众；应采取措施将相关信息系统性地介绍给社会主义国家驻苏联大使，也定期地介绍给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驻苏联大使；可继续就事故问题举办新闻发布会；在说明清理事故后果的过程时，应加强“宣传鼓动机构”的工作；用实际数据积极对抗“资本主义宣传的欺骗之辞”；苏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组以及苏联科学院等相关部门，应研究关于外国有意协助救灾的提议并通过相应的决议。<sup>④</sup>

---

①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АЭС: Ситуация стабилизируетс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Москве// Правда. 10 мая 1986 г.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5 мая 1986 г.// АПРФ. С.102.

③ К событиям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В пресс-центре МИД СССР// Правда. 7 мая 1986 г.

④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КПСС о ходе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и мерах по усилению этих работ. 5 ма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3. л.3.

此后，苏联政府在逐步扩大信息公开的同时，<sup>①</sup>加强了对外合作，尤其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苏联政府转向“灾难外交”，一方面促进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调查与救灾工作——1986年8月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举行专家会议，苏联代表向会议提供了有关事故及其后果的信息，双方就事故进行了深入探讨<sup>②</sup>；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国际核能安全发展机制的建立——同年9月底，《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sup>③</sup>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应运而生。

#### 四

在苏联围绕切尔诺贝利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中，戈尔巴乔夫个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尽管他与雅科夫列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信息的相对开放，但由于他的性格特点，一度改变立场，站在保守派一边，从而使苏联的事故应对在初期呈“灾难不外交”的状态。另一方面，基于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以及由于苏联救灾工作的组织不力而造成的国内外舆论压力，“灾难不外交”转向了“灾难外交”。戈尔巴乔夫在继续推进其外交改革时，成功地利用了这场事故带来的契机。正如珍妮丝·斯坦因(Janice Stein)所言，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能从外交政策的失败中得到激励的人。<sup>④</sup>最后，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前就已酝酿的非传统对外战略思想，后来成为“灾难外交”的理论前提，帮助苏联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在国际舞台上争夺事故的话语权。

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应对举措走向系统性、计划性，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革新派力量抓住了外交领域改革的机会，将事故中表现出的“灾难外交”视为苏联对外路线的“试金石”。苏联政府起初依据传统外交方式应对事故

---

① 苏联媒体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报道的时间表可参见 Alexander Amerisov, “Chernobyl, the emerging story: A chronology of Soviet media coverag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986, Vol.42, No.7, pp.38-39.

② Записка В.А. Легасова ЦК КПСС. 8 сентября 1986 г.// РГАНИ. ф.89. оп.53. д.20. л.7-22.

③ Convention on Early Notification of a Nuclear Accident; Convention on Assistance in the Case of a Nuclear Accident or Radiological Emergency.

④ Janice Stein, “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 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Vol.48, No.2, pp.155-183.

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使戈尔巴乔夫有理由在同僚面前主张摒弃旧的外交行为观念。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道：“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sup>①</sup>他评价苏联外交工作时称，旧作风主要是“显示不屈不挠，为了强硬而强硬。一味死硬，只顾全面子，既不考虑政治的需要，也不考虑实际的需要”。<sup>②</sup>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及该起事故反映出来的苏联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遇到了习惯效应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一切。我们处在自己人民的监督下，也处在全世界的监督下”，<sup>③</sup>“已经发生的事件关系到所有的人……我们要对全世界公开宣布所发生的事情”，<sup>④</sup>“应该开诚布公地告知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该了解后果和我们的举措……应提供给世界最大限度的信息，尤其是在西方的人们才会了解实际状况”。<sup>⑤</sup>“我们没有任何必要掩盖真相。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sup>⑥</sup>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以俄、英两种文字同时面世。该书详细地阐述了戈尔巴乔夫“新的政治思维”及其提出的背景，指出人类迫切需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除了消除核威胁之外，还应该解决包括经济发展和生态问题在内的所有其他全球性问题。<sup>⑦</sup>

切尔诺贝利事故反映出核能潜在的危險性，打开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进一步开展禁止核试验问题对话的窗口，为他践行外交“新思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故发生后，他在不同场合向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呼吁，双方应就停止核试验、核军备竞赛问题举行会面。5月14日，在就事故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自己向里根总统的提议，美苏首脑应尽快会晤，以

---

① [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52页。

② 同上，第734页。

③ Черняев А.(рук. пр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М.: Горбачев-Фонд, 2008. С.39.

④ [俄]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94页。

⑤ Черняев А.(рук. пр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С.62.

⑥ [俄]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95页。

⑦ [俄]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69-204页。



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核时代要求联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为停止灾难性的军备竞赛、彻底改善国际政治气氛而做出努力。<sup>①</sup>6月1日，他在致里根的信中重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经验教训是全人类的，空间堆的时代更要求世界各国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推出新政策。他呼吁美方全面权衡局势，与苏联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双边共识。<sup>②</sup>最终在戈尔巴乔夫的不断倡议之下，美苏双方决定就军备竞赛等问题举行会晤。当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走向了打开美苏缓和之门的雷克雅未克。

总之，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发挥了一种将内政与外交连接、转换的特殊作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革新派力量借此次事故，转变了苏联的外交行为。一方面，苏联摒弃了“灾难不外交”的传统做法，改革了重大事故的处置和救助机制，提升了应对灾难的能力。在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大地震中，戈尔巴乔夫政府就延续了“灾难外交”的做法，在国内组织救援的同时，接受了来自众多国家的物资援助与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以切尔诺贝利事故为突破口，戈尔巴乔夫为未来进一步推行和完善他的外交“新思维”奠定了基础。

---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ernobyl accident, the Soviet government's related diplomatic conduct wa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two parties within decision-makers. It was also interrelated to the diplomatic strategic thinking held by participants in decision-making. One group, represented by Gromyko, advoc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diplomatic conduct regarding accidents should b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that is, "no diplomacy for disaster" a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other group, represented by Gorbachev and Yakovlev, sought more open government diplomacy, that is, "disaster diplomacy". During the disaster relief, the Soviet government's diplomatic conduct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This shift is not only caused by the need for disaster relief, but also due to Gorbachev's reform intentions in the diplomatic field as an ideological

---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С.Горбачева по советскому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Правда. 15 мая 1986 г.

② У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Горбачева. 1 июня 1986 г. [https://nsarchive.gwu.edu/rus/text\\_files/Letters/1986-07-01-Gorb.pdf](https://nsarchive.gwu.edu/rus/text_files/Letters/1986-07-01-Gorb.pdf)

prerequisite. Although the shift to “disaster diplomacy” meant that the Soviet government made mistakes with regards to its initial disaster relief methods, yet it also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Gorbachev to further develop his new diplomatic strategic thinking.

**【Key Words】** the Chernobyl Accident, Gorbachev’s “New Diplomatic Thinking”, “Disaster Diplo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начале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связи с аварией фактически был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оронами в сфере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и были связаны с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мышлением участников процесса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Одна групп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ая Громыко, выступала за то, чтобы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округ аварии был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й, то есть «катастрофа без дипломатии» была её основны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другая групп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ая Горбачёвым и Яковлевым, выступала за более открытую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то есть, «дипломатию катастрофы». В процессе оказания помощи в дан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пове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изменилось с «катастрофы без дипломатии»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ю катастрофы». Этот сдвиг был вызван не тольк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оказания помощи при стихийных бедствиях, но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Горбачё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дипломатии. Хотя переход к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атастроф» означал, чт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е методы оказания помощи при стихийных бедствиях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ыли ошибочными, он также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Горбачё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авария,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Горбачёва в дипломати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атастроф»

---

(责任编辑 苟利武)

**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对国际区域学理论的探讨\***

张蕴岭\*\*

**【内容提要】**国际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国家-国际区域-世界，构成一个整体。现代国际区域是以国家为本位，由多种区域链接机制和区域共享利益构成的。尽管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也有作为国际区域的共同特性。需要创建国际区域学理论，回答国际区域是什么、国际区域怎样构成和国际区域如何运行的问题。国际区域学是把国际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需要把国际区域基础研究、国际区域功能研究、国际区域制度研究统合起来，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国际区域学 国际区域链接 国际区域功能 国际区域制度

**【中图分类号】**D8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097(18)

国际区域是多个国家共处的地区，地缘链接是国际区域的基础。<sup>①</sup>国际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具有显性的关系和直接的利益。对于国家而言，所在国际区域的关系和利益通常被置于对外关系和涉外利益的首要地位。对于世界来说，区域是国家群组的重要载体，承担着重要的发展与治理职能。我们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引领与行动”（项目批准号：18ZDA12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是基于作者主编的《国际区域学概论》第一章的内容撰写而成，该书将于2022年出版。

\*\*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

① 这里之所以用“国际区域”（international region），一是这里所说的区域是各国共同相处的区域，对一国来说，本国以外的具有国际的性质，区内链接是国家间的联系，区内关系为国际关系；其二，一国之内也有不同的区域（region），区域学也是专门的学问，国际区域与国内区域不同。通常所说的“区域合作”，实际上是“国际区域合作”的简称。

通常把区域国别研究放在一起，尽管区域和国别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特征，即研究区域离不开对国别的研究，研究国别也不能忽视所在的区域，但国际区域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国际区域有着独立的组成结构和运行机制，因此，创建国际区域学理论体系十分必要。国际区域学理论需要回答：国际区域是什么、国际区域怎样构成和国际区域如何运行。

## 一、国际区域的构成与定位

### （一）国际区域的构成基础

世界是一个整体，在组成结构上，分为三个层次：国家-国际区域-世界。国家是现实世界的本位和基础，国际区域介于国家与世界之间。国际区域是一个多国共处的地缘与利益空间，也就是说，国际区域既基于地缘链接，也基于利益链接，既有国家间的关系，也有区域层次的关系；既有区域内关系，也有区域间关系。从世界范围看，尽管不同的区域在构成、链接方式、关系结构、治理形式等方面很不相同，但是，作为区域，也有相同与相似之处，有体现国际区域存在与发展的普遍性特征与规律。因此，国际区域学理论是在对世界不同国际区域的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区域构成与运行的一般规律。<sup>①</sup>

地缘是国际区域划定的基础，通常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大区域，以洲为界，分为五大洲区；第二层是次区域，在大洲之内划分，基本以近地缘为界。此外，在次区域之内，还有基于接壤地区链接的各类小区域，大多是由几个国家间的相邻区域构成，规模不等，且划分也因不同的定位而异。

基于地缘定位的大区域，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它们也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存在。基于长期历史的发展，各洲内部都有着特殊的内在联系与利益基础。洲际区域范围广，国家之间存在种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出于地缘链接的原因，特别是出于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社会的、

---

<sup>①</sup> 国内通行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别，二是区域。尽管二者有密切的联系，但研究上有很大的不同，国别研究着眼于单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而区域研究则被认为是“更加重视整体主义，强调应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参见郭树勇等编著：《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49页。

文化的联系和利益驱动,各洲际区域都发展起了形式多样的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机制。在世界五大洲中,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都建立了洲际区域组织,对区域进行治理。在次区域层次,由于地缘更近,利益链接更直接,人文交流更密切,因此,在许多方面,区域的特性更强,大多发展起了区域组织或者合作机制,对区域进行更有深度的管理和治理。

国际区域性机制构建加强了国际区域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国际区域机制构建的驱动和支持要素是多样的。比如阿拉伯联盟(阿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既有地缘链接,又有族群和政治特征。像东亚,其地缘定位是指东北亚与东南亚,但如今,属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加入了东亚区域合作框架,被认为是属于利益上的东亚区域。印度属于南亚,由于加入了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使得东亚的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东亚既有基于地缘构建的国际合作区域,也有基于利益构建的功能性合作区域。因此,国际区域学理论构建,既包括地缘基础上的国际区域,也涵盖基于利益的功能性区域。<sup>①</sup>显然,地缘国际区域的客观存在,是产生区域机制构建的基础,而区域机制的构建,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形式,都是对国际区域存在的加强,区域机制的多样性,凸显了国际区域的差别特征。<sup>②</sup>

世界分为各种区域,但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限,主要是所在的区域,可以说,近缘区域就是“天下”,即认识的整个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区域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把区域置于世界的大框架之下,出现了不同的区域。<sup>③</sup>现代民族国家规则确定之后,区域的地位又发生了变化,

---

① 对基于功能性构建的机制,能否视为国际区域,要做具体分析。比如,像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就不被认为是区域性功能构建。还有像欧盟和日本签订了经济伙伴关系,被视为有别于全球多边协议的区域性协议,但这也应该属于跨国的功能性机制构建协议,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区域范畴。比如像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由东盟推动建立,尽管前者有美国和俄罗斯参加,后者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主体还是基于东亚范围,应该属于国际区域组织或者机制。

② 彼得·普瑞斯顿(Peter Preston)认为,地区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各国推动构建的结果。这种观点实际上有些本末倒置,不是有了机制才有区域,而是有了区域才有构建机制的基础。关于普瑞斯顿的观点,可参见 Mark Beeson, Richard Stubbs edit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 Regionalis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2, p.41.

③ 地理大发现(Age of exploration)是指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利用海上优势,到世界各地发现贸易机会,进行殖民扩张,“发现”了亚洲、美洲。

把区域置于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成为由国家构成的区域，区域具备了国际的性质；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区域进一步发生变化，把区域置于开放的全球框架之下，成为全球的区域。

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是本位，因此国际区域的核心问题是不同国家间如何相处，涉及利益分享、关系处理和制度构建。作为客观存在，国际区域有着诸多超国家的链接，称之为共域链，它们是构成国际区域的内在链接机制，涉及区内各国的共同利益。在国际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或合作分歧往往引发对抗、冲突和战争，理性的或者说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各国通过合作与共同参与，实现利益的分享与秩序共治。

地缘链接，即地理连接，本身造就了区域的自然性基础，山川、河流、海域、空域等都具有天然的区域性链接特征。历史表明，地理条件对人类活动、权力形成、文明发展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支配的作用。起初，人类的活动，权力与利益争夺，主要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进行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带有凸显的地缘区域特性。

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确立后，地缘国际地区具有鲜明的国家性特征，即由数个国家组成。区域的国家属性是对地缘自然性的政治分割，尽管被分割，但也“藕断丝连”，存在资源的共域和共享问题。比如一条河流，基于属地的原因，被分割为不同的国家所有，每个国家都有对其拥有部分进行开发利用的独占权。但是，河流割而不断：一则，河水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二则，上下游贯通，在生态环境、河水流经上具有整体性。因此，这需要相关国家开展合作，合理利用和分享水资源，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共同治理。再比如海域，尽管有基于联合国海洋法的领海和专属区划分，但海域具有天然的链接属性，特别是海水、海底资源、海洋生态等，都有很凸显的共域性特征。同时，海洋作为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共同维护，其中，区域性维护居于重要地位。

跨国链接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跨国关系，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近缘区域为国家推动对外交往，为企业走出去开展贸易、投资，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地缘环境和人文环境，因此成为各国政策、企业战略以及个人境外活动的首选之地。在近地缘区域，生产和经营活

动的分工、产业链、供应链，具有物流、人脉、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区域性经济链得到快速发展。

基于受益的认知和动机，国家会积极支持加强区域经济链接，推动区域合作，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等环境。比如，通过签订区域性协议，推动开放市场，消除或减少贸易投资壁垒，为开展区内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提供优惠待遇；通过建设区域基础设施如交通网络、通信网络等，为经贸活动、人员流动提供便利。鉴于通过加强合作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使得区内贸易、投资等能有更快的增长，因此经济区域化的趋势不断加强。

区域安全涉及各国的直接利益，包括诸多方面，有与国家间关系相联系的安全问题，有安全威胁跨国扩散的问题，也有共同安全的问题等。就安全的性质而言，可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军事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冲突或战争是在一些国家之间，特别是相邻国家之间发生的，表现为区域性冲突或战争。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的表现形式是非军事的，但其危害性并不亚于、甚至大于军事手段的战争。在现代情况下，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并且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比如，毒品、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人的安全，以及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公共卫生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大多具有共同的性质，即其威胁与损害不仅仅限于单个国家，往往是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

民族、宗教、思想、文化都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因此，成为国际区域链接的重要元素。比如，一个民族往往分布在很大的区域，被切割到不同的国家。由于一个民族分布在多个国家，民族联系成为国家之间和国际区域内人际交往的重要链接。许多宗教往往以特定的区域范围为基础，作为群体共同的信仰，以内在的方式渗透到不同国家的社会生活，并且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宗教往往跨区传播，有着多区域的链接。就思想文化而言，其跨国传播与联系的最直接路径是近地缘区域，长期的积累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圈。历史积淀与传承是思想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而积淀与传承的重心大多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这为形成具有区域性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国家为基础构成的国际区域和作为国际区域成员的国家，二者有着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国际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带有一定特殊性的

国际关系。具有特殊性，是因为它们有着与一般国际关系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文化链接，它们既可以导致国家间守望相助，和谐相处，也会发生由权力争夺、霸占、吞并等驱动的冲突和战争。从历史看，各个国际区域都不乏动荡与战争的记录。国际区域不是封闭的，都会与其他区域有着多样性的联系，并且作为全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与发展。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区域都有着多重的对外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区域在链接与组合上是互有交叉的，有时一个国家可以参与多个区域，<sup>①</sup>这就使得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区域的关系具有多向、多层的特征。

国际区域研究利用交叉学科的方法，以区域为视点，对构成国际区域的要素、运行、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找出国际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尽管每一个国际区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着构成国际区域的特色要素，以不同的方式运行，发挥不同的作用与影响，但国际区域作为世界总体结构中的一个实际存在，也有属于共性、普遍性的东西。同时，交叉学科研究也适用于对次区域的观察，分析其综合的构成与特征，比如，中东、北非、南亚、东南亚、南美等等。学科专门研究方法，是对国际区域的各个领域，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治理等进行专门研究，从而产生基于区域视点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的研究成果。因此，国际区域学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可以有许多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分类。

## （二）国际区域的认知与定位

究竟如何认识和定位国际区域，这是国际区域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地缘角度来认识，国际区域是一种自然属性，并不拥有独立于国家的法定边界，主要是基于多种要素的链接，形成了诸多共享的区域性资源和利益，因此，区域的自然属性也具有政治与社会要素链接的内涵。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认识，基于利益的考虑和长期积累的历史、文化传承，国家对区域有身份认同，即赋予区域以特殊的定位，愿意在区域关系处理和机制构建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安排。从区域治理机制的角度来考虑，在基于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所在国家通过合作构建区域机制或组织，使得区域组

---

<sup>①</sup> 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地缘跨区域（欧亚两洲）国家，在申请加入欧盟时，其身份受到欧盟成员的质疑。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国家参加多个跨区域的合作机制，特别是自贸区。



织拥有区域管理和治理功能，由此，国际区域就有了独立的治理权属性，通过区域组织签署的协议、条约等具有法律效力，依据区域组织所制定的法律、规则实施管理与治理，不仅得到成员国的认可，而且对成员国有约束力，成员国有遵守的责任和义务。<sup>①</sup>

国际区域具有涵盖范围，其地缘范围以所有成员方的边界为基础。但是，功能性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是可以跨区的。在一些情况下，基于“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国家基于利益的区域定位可以有多个选择，也就是说，不一定仅参与一个区域。基于功能性构建的区域机制，形式多样，情况比较复杂，有些并不具有很强的紧密区域性特征，只是在某个领域开展合作。

国际区域的关系结构是多层次的，概括地说，主要基于三个层次：国家间关系、区域关系和区域间关系。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区域国家相互间的关系，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有多个双边、三边或更多的对外关系，因此，国家间关系呈现相互交叉的复杂格局。区域关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区域国家关系的总和，健康的国家关系可以使得区域关系走向和谐与合作，紧张的国家关系可以使得区域关系走向冲突与对抗。现实中，如果两个或者几个国家间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对抗，区域关系就会陷入困境，导致区域局势动荡，甚至冲突。国家间关系紧张，不仅危及当事方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二是区域框架下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制度构建下的关系。国家对于区域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关系，但同时，区域性规制对于国家的行为有着明确的要求。

区域间关系是指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关系，包括国家与其他区域的关系，以及区域之间发展的关系。区域间关系一方面受到不同区域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不同区域间构建的关系框架与机制。区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良好的区域关系建立在区内利益共享和秩序共建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创建良好的区域关系有着共利的基础，因为可以为区域共处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各国从中获益。实现良好的区域关系目标，既要

---

<sup>①</sup> 关于国家为何推动国际区域的机制或者制度构建，有许多理论性解释，如“联邦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制度主义”等等。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介绍，可参见 Mark Beeson, Richard Stubbs edit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 Regionalism*, pp.11-21.

靠各方的自觉行为，也要靠共建区域机制。

区域间关系对国际区域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的角度看，区域内的国家与其他区域的国家可能结成不同的关系，有的可能因为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等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有的甚至会结伙反对区域内或区域外其他的国家。就区域而言，在有的情况下，区域之间也可能会结成不同的关系，进而对区域的发展产生影响。

区域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在一些区域，基于不同的原因，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由于国家在资源占有、领土归属、政治制度、宗教派系等方面存在分歧引发争端、敌对，由于强国推行扩张或霸权，引发区域性冲突与战争。在一些区域，长期的冲突无解，不时爆发战争，使得区域关系陷入混乱，地区秩序坍塌。区域关系涉及许多因素，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有过强国治下的稳定的地区关系和秩序，但是，难以维持长久，要么因为大国衰落失去掌控能力，要么因为国家间权力争夺，导致关系结构与区域秩序遭到破坏。从长远看，良好的区域关系需要建立在合作性的区域规则与法律基础之上，在有的地区，如欧洲、东南亚，分别通过欧盟与东盟构建了区域共处的基本规则。<sup>①</sup>

## 二、国际区域学理论的研究方法

从综合研究的角度，国际区域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功能研究和制度研究。基础研究着重于对构成区域的基础因素——地缘和国家——进行研究；功能研究着重于对构成区域的链接机制——政治、经济、文化在区域运行中的功能——进行研究；制度研究着重于对国际区域的制度构建和区域治理进行研究。

### （一）国际区域的基础研究

地缘链接是国际区域的基本形态，因为地缘的链接把域内各国天然地连

---

<sup>①</sup> 欧盟的发展建立在一系列共同签署的条约基础上，如《罗马条约》《布鲁塞尔条约》《欧洲联盟条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斯本条约》。东盟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有《曼谷宣言》《新加坡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宪章》。

接在一起。地缘链接的要素是土地、山川、森林、河流、海洋等，它们在自然属性上是一体的。研究国际区域，需要研究区域的自然属性，即区域地理链接的结构与特征。但是，国际区域学研究的地理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地理是有区别的。国际区域学所注重的，主要是地理自然属性与国家属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二者之间的平衡与矛盾。因此，国际区域学的地缘研究包括了附着于其上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人文因素。比如，一条大河流经几个国家，一方面河段被分割，各国都有控制和利用径流河水的权利，另一方面，水作为区域的公共产品，需要对水资源进行综合调配、管理和治理，因此，河流就被赋予了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在国际区域内还有诸多基于地理要素的链接，而这些链接使得国际区域具有整体性，也使得各个国家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地缘区域具有特殊的含义，不同的地缘区域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运行方式，由此形成了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地缘关系学、地缘社会学、地缘文化学等等。

国家是国际区域构成的基础，国家对国际区域的认同和参与是国际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国家，就不了解区域，因此，研究国际区域要从研究区域内的国家开始。然而，国际区域学框架中的国家与专门的国别研究不同。国别研究需要对一个国家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语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既需要分类研究，深刻了解每一个领域，也需要综合研究，以了解国家的全貌。作为国际区域学的国家研究，重点不是国家构成本身，而是国家的政治、政策和对外关系，特别是区域关系，以及区域国家的比较。

国家政治包括制度、政党、政局、领导人等，对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对国家的区域认同、参与和作用起着导向性影响。有的国家，出于复杂的原因，区域认同度低，因此，对国际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与发展参与度就低；有的因政局动荡，或执政者更替，会改变对国际区域事务参与的态度；还有的因为与相邻国家发生矛盾、冲突，而不愿参与有对方参加的区域性机制等等。在有的情况下，政治的歧见也会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区域关系。

国家政策，即国家参与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与治理的投入，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国际区域发展的进程。国家的参与是建立在区域认同基础上的，而政策取向则是出于多种考虑，既有政治、经济、安全上的考虑，也有宗教、文化上的考虑，还有战略上的考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国家对参与区域的政策会发生变化。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变得更为积极，在有些情况下，则可能变得消极，甚至反对。在正常情况下，由于参与国际区域机制或制度构建能够带来直接的利益，且有着制度性约束，国家不会轻易退出。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国家可能会决意退出，或因为不遵守规则而被暂停参与资格等。

国家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区域国家的关系，对于国际区域的构建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各国对外关系中，首要的是与近邻区域国家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各国都对与邻国的关系给予特别的重视。较之其他的对外关系，邻国关系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直接的利益关联性更强。久远的历史交往，积淀了丰富的遗产，也累积了许多问题。历史传承加深了国家间的关系，而遗留的问题往往成为关系紧张、甚至冲突的诱因。国家间关系好，有助于国际区域的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而国家间关系不好，则影响到相关国家以及国际区域的相处与发展环境。一旦发生战争，受到损害的不仅是直接参与的国家，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国际区域。在有的情况下，局部的战争甚至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先从欧洲局部开始，扩展到世界的。

在现实中，合作性国际区域机制或制度的构建，对于改善国家间关系有着显著的作用。通过国际区域组织制定的法规、达成的协议等，对于成员是有约束性的，成员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共同制定的法规，如果退出，也要经过相应的程序。在一些地区，区域组织和制度在改善国家间关系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区域观是国家以己为中心对所处国际区域的认知和定位，因此，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他国的区域观。以国家为中心的区域观，核心是如何在共处环境中定位自己的利益，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在区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显然，区域观对国家制定区域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鉴于各国的区域观是以己为中心的，在区域各国间形成区域观的共识并不容易。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区域观，但基于历史共处的积累和相互链接

的多重关系与利益,也存在各国在区域定位、关系定位和利益定位上的趋同,即区域观上的认同。在现实发展中,出于共同推动国际区域合作的需要,也需要寻求和凝聚共识。事实上,在一些领域,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区域观共识是可能的与可行的。国际区域的共域空间是推动区域观共识的重要基础,同时,在诸多方面亦可以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区域认知与构建的认同,比如,基于安全的区域认同、经济的区域认同、宗教的区域认同、文化的区域认同等。

## (二) 国际区域的功能研究

区域政治、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和区域治理,是国际区域构建与运行的重要支撑。国际区域政治是建立在国家政治基础上的,但并不是国别政治的累加。各国都有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因此,研究区域政治需要研究国别政治,包括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政策、对外关系等。但从区域政治的研究来说,一则,需要以国别政治为基础,进行国别政治比较,理清异同;二则,在国别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国际区域政治的协同和认同。

国际区域政治的历史充满敌视、排斥、争斗的记录,自现代国家制度确立以来,政治纷争、统合与分裂反复上演,构成区域政治复杂的历史。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对于国家间的相处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应该说,国际区域政治有了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国家主权独立和政治多样性,认同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方式的合法性基础;合作与和平共处,抵御和制止扩张、侵略与霸权,构建基于国际法基础的共守规则;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开展平等参与的政治对话,反对强权、霸权政治;建立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认同并参与基于共商共利的区域治理等等。在各种区域政治构建中,这些基本原则也都被写入共同签署的章程、条约等。应该说,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sup>①</sup>

出于多种原因,政治矛盾、冲突往往成为国际区域不稳定,甚至发生战争的成因。比如,基于对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非认同,往往会发生政

---

<sup>①</sup>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确立的转折点,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但真正为国家、国际关系和秩序确立具有法律性质的原则是联合国宪章。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分析,参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9-25页。

治对立、政治排斥与对抗，甚至由此引发战争。基于强国对自己政治优越性的认知与定位，往往会引发对其他政治体制的压制，甚至采取强制性推行改变他国政治的行动。事实上，许多现代战争都是由政治的原因引发的。政治对话是增加相互了解和理解、弥合政治歧见裂缝、避免发生冲突的理性选择。开展政治对话，可以基于当事方的主动理性政治动机驱动，也可以是被动接受教训的结果。如今，在世界各个国际区域，几乎都建立起了政治对话的机制，实现领导人的定期与不定期会晤，并且构建了从部长会议到职能部门合作的多层区域对话合作框架，在有的地区，比如欧洲，以各方的政治共识为基础，推动构建了超国家的区域性治理体系。

社会因素在区域政治中的作用不可轻视。社会因素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公民的参与包括对国家政治的认同、对执政者的选择和对权益的诉求等，这些本身也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社会诉求可以通过媒体舆论来加以表达和发表，并且形成社会运动，一旦社会运动被动员起来，就会对国家政治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扩散和传播性，国际区域往往是扩散与传播的主要方向，从而产生呼应，对区域政治造成很大的影响。

经济是国际区域最重要的链接，资源、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的流动构成了各国间最直接的联系网络。国际区域是各国对外经济联系的首站，在一般情况下，区域各国间会建立比其他国家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经济的优势可以体现在：地缘、社会联系上的方便和互通，使得经济交往更为易行；形成区域性的规模优势，为各国发挥比较优势提供地缘空间；发展区域交通设施易行网络，实现互联互通；通过机制和制度构建，创造区域共享利益等等。

经济全球化是以世界市场为框架所推动的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多边体系机制与国家开放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经济区域化是以区域市场为平台，通过生产与经营的分工，构建分工链、供应链网络，与全球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是在分享多边体系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做加法。国际区域的经济机制构建，要么是推动更高程度的开放，要么是做多边体系不能做，或者尚未做的事情，旨在为区域经济联系创建更好的环境，打造区域经济发

展和竞争优势。在多边体系难以深化，或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在区域范围推动机制构建可能会更容易，因此，考虑到多边体系和全球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区域化可能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各国可能会对国际区域的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给予更大的支持。

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即各方都能从参与中获益，并且随着市场开放度的加深、经济规模的扩大，参与者（主要是企业和个人）能够分享更多的利益。但是，在现实发展中，实现利益分享均衡并非易事，导致失衡的原因主要有：竞争力差别，强者分享更多的利益；市场、技术、交易垄断，利益向垄断者倾斜；区域制度构建缺少利益均衡调节机制，过度依赖市场调节机制等。在有的情况下，强权或者霸权国家可能会采取利己的单边主义政策，从而导致结构失衡，制度调节失灵。

受益均衡、发展均衡是区域经济合作可持续的关键。如果受益过度失衡，发展差距拉大，推动区域经济开放与一体化的动力就会降低，反对的声音和势力就会增强，有些国家甚至会退出区域组织或协议安排。特别是社会公众，一旦他们感到不能从中受益，甚至受到了伤害，就会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激发社会运动。从现实的发展看，以往区域经济构建的重点是推动市场开放，或者称之为经济自由化，而对获益和发展均衡的调节关注甚少，这种取向导致了许多问题，既包括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包括政治、社会、关系等问题。因此，在国际区域经济机制的构建中，必须把利益均衡与发展均衡放到突出的位置，并采取有效措施。各国政府在参与中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可能出现的利益失衡与发展不平衡进行纠正，同时，也需要加强区域经济机制中的调节功能，特别是要加强经济合作的议程，在改善发展环境、加强能力建设、促进资本和技术流动等方面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

文化联系是国际区域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际区域的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多样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会有独具特征的文化；传播性，文化是流动的，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传播与扩散，并以多样的形式融合；传承性，作为非物质的存在形式，文化的传承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在国际区域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文化是主体，不同文化之间有着

各种形式的交流。文化具有民族和国家属性，但又是开放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够推动各国在文化上的互学互鉴。在国际区域内，长期的历史交往与传承，容易形成具有“同质特征”的文化圈。这里所说的“同质”并非同一，而是指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形成对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认同。

不同文化的竞争会导致文化冲突。维护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是各国文化价值的取向，为此，国家都对自己的文化给予特别的支持和保护，以免受到其他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压制或者侵蚀。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看，强势文化往往借助国家的力量进行扩张，把战胜甚至消灭其他文化作为目标。在一些情况下，文化扩张也被作为强国势力扩张的重要工具。因此，文化冲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并不鲜见。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由此引发的争斗。有观点认为，文化冲突有两种：一种是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由不同文化准则对立而产生的法规冲突。文化冲突可以发生在国内不同种族、地区之间，在国际区域范围，文化冲突更多表现为价值、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排斥与诋毁。

国际区域发展离不开区域文化的构建。区域文化构建的目标是推动不同文化的互学互鉴，凝聚认同和共识，创建区域开放、包容、合作的共处环境，增加共享利益。在很多情况下，文化在促进沟通、增进理解等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 （三）国际区域的制度研究

制度建设是国际区域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建设有多种形式，功能各异，制度化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有共同之处，即对区域关系、区域事务进行管理。按照研究分类，以区域主义理念推动和引领的被称为制度化建设，以功能性理念引领的被称为机制化建设。一般而言，制度建设以参与各方对国际区域的高度认同为前提，愿意让渡部分国家治权，交由区域组织来实施。

成立区域组织是国际区域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形式，有的区域组织逐步构建起比较完善的区域制度，包括立法机构、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等，比如欧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区域政治制度体系，包括欧洲理事会（决策机构）、欧洲议会（立法机构）、欧盟理事会（执行机构）、欧洲法院（仲裁机构）；有的则在区域组织基础上建立领导人会晤、部长会议与职能部门沟通的合作



机制框架，主要是进行对话协商，就重要事务达成共识，而具体实施主要依靠成员国进行；也有的在区域组织下建立有选择的职能管理机构，行使部分管理权。功能性构建并不需要成立区域组织，而是通过签署相关协议来进行。有些近地缘小区域的构建，形式更为灵活，主要是推动基于共同需要的项目合作，有的也与区域组织有直接的联系。

国际区域作为一个共处区，有着诸多超越国家范畴的公共资源、公共环境、发展空间、区域关系、社会文化等，因此，需要区域层次的管理与治理。区域管理和治理可以通过签订区域性协议，或者建立区域组织来实现。比如，由于资源的跨境特性（水资源、矿产资源等），在拥有、分配、利用和开发等方面，各国间往往存在分歧与争端；由于权力争夺、利益冲突，或者其他原因，国家间往往出现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兵戎相见，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区域治理来进行调节与管理，以维护区域共处的秩序。

在国际区域内，存在着国家之间的竞争或者争斗，主要是为了利益争夺、权力争夺，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的争斗等。利益争夺主要体现在对疆土、资源、市场等领域的占有与利用。纵观历史，国家间的战争大多是为了疆土、资源等利益的争夺。权力争夺，主要是大国对区域控制权的争斗，是影响区域关系的重要因素，是导致地区动荡、战祸频仍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地区，宗教冲突对区域关系的影响很大，与其他方面的冲突不同，由于不同的教派难以实现和解，有的争斗延续上千年，使得区域长期处于不稳定与动荡之中。

区域治理有些是区域各方的主动行为，有些是由于问题或者危机驱动。总体来看，推动国际区域治理的动机，主要是共同应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创建区域性共利空间，维护区域的和平与发展环境。主要的方式是，构建区域治理的制度体系，包括成立区域组织，签订协议，制定治理法律、规则与行动议程；协调国家间关系和区域关系，创建区域公共产品，包括创建区域市场、实现区域互联互通等。

区域治理并不替代或者弱化国家治理，而是做加法，做单个国家不能做，或做不成的事情。区域治理的方式主要有：区域大国主导下的治理，功能性机制治理与区域综合制度治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治理的方式不同。历史上，大国主导下的治理曾是主要的形式，形成一个大国主导下

的区域关系结构与秩序。如今，大国主导下的区域治理式微，功能性机制构建和组织制度建设成为国际区域治理的主流。

功能性治理，主要是指针对存在的区域性问题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制定共同遵守的法规，或者各方达成共同参与和投入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在有的情况下，也可以建立合作机制来加以解决。功能性治理有针对性，有明确的目标，成为解决区域性问题的重要方式。功能性治理具有目标明确的选择性和针对性，一则，在一些具有自然性争议的领域，如跨境河流的治理（特别是水资源），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海域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等，通过协商合作、签订协议、制定规则等方式，实现治理的目标；二则，在一些公共性强的领域，如市场开放、跨境公共安全（走私、毒品、极端势力等）、人员流动、资本流动等领域，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实现区域内的有序安排与治理。在构建和参与上，功能性治理并不要求区域内所有的成员都参加，在许多情况下，所签协议或者开展的项目，往往是由几个国家先行，其他国家后续参加。

制度治理的层次比较高，主要是通过构建区域组织对区域事务进行管理和治理。国际区域制度治理的主要特征是，构建具有行使治理功能的区域组织，通过区域组织对所涉及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综合治理。高水平的区域制度治理是，依靠区域组织，构建一套制度体系，对区域事务进行治理。基于制度构建的区域治理的关键是，参与国家同意让渡治理权，赋予区域组织以超国家行使职能的合法性。

现实中，能实现高水平国际区域制度构建的区域很少，因为这不仅要求各方有区域观共识和高度契合的政治环境，而且也要求有与其相适应、或者说可以提供支持的国家治理基础。在有些区域，尽管成立了区域组织，设立了区域治理的明确目标，构建了区域治理的制度框架，但是并没有建立高水平的制度体系。在有的区域，出于各方对国家主权、自主性的维护，并不愿意把治权让渡给区域组织，因而根据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与环境，实行被称为“软制度”的治理方式，其主要特点是：制度建设主要是为了提供区域性合作的平台机制，汇聚共识、推动议程，而非进行超国家管理，议程落实主要依靠成员国的政治承诺与责任担当。在此情况下，区域治理制定

的议程、通过的法规、签订的协议等，主要靠成员国实施，而不是依靠区域组织来推行。在有的国际区域，尽管建立了区域组织，构建了一定的治理机制，但在实际的运行上，功能发挥很有限，甚至是基本无效的。

总的来看，国际区域治理建立在国家对区域认同的基础之上，同时，区域治理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也需要有各方较高的认同基础，只有这样，才可以制定和遵守区域治理规则，开展治理行动。国家对区域的认同意味着，作为区域的国家，不仅有参与治理的意愿，而且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认识。当然，从区域治理方面来说，若要得到各国的支持，必须能够为各国带来可见的利益，并且能够让社会公众真正受益，得到社会的支持。

---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 i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The country,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 and the world constitute a whole.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gion is country-oriented, composed of multiple regional linkage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shared interest. Although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y still have some characteristics in common. For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what an international region is, how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 is constituted, and how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 operate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tudies treat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 as a whole. It needs to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bas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 regional function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ystem research to buil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Link, International Regional Funct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ystem

**【Аннот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егион - это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стран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регионы - мир составляют единое целое. Субъектом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являе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а сами они состоят из множества механизм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связей и общ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Хотя разные регионы имеют различ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ни также имеют общие черт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здать теор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которая ответит на вопросы о том, что так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егион, как он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и как функциониру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егионализм - эт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как единого целого, требуе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котора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изучение функц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и изуч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вязи, функ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институт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регионов

---

(责任编辑 崔 珩)

## 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逻辑\*

曲文轶 杨雯晶\*\*

**【内容提要】**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受阻,各国纷纷转向双边或区域的自由贸易。将自身定位为大国的俄罗斯,也加紧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自由贸易网络,除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为基础成立欧亚经济联盟之外,还推动后者与越南、伊朗、塞尔维亚和新加坡四国达成自贸协定。俄罗斯选择的自贸伙伴虽然经济体量较小,但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国家战略和国内社会三个不同层次,系统考察俄罗斯选择自贸伙伴的逻辑。从国际权力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对自贸伙伴的选择,需要承载俄罗斯打造多极世界中“一极”的战略愿景和参与世界经贸规则决策过程的战略意图。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自贸伙伴的选择还需契合俄罗斯国家发展对于经济安全、能源技术、吸引外资及商品出口等领域的战略需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最后,从国内社会的角度来看,自贸伙伴的选择也传递着俄罗斯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图。

**【关键词】**俄罗斯自由贸易协定 俄罗斯自由贸易伙伴 欧亚经济联盟

**【中图分类号】**D73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115(2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3)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在欧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0BGJ065)的阶段性成果。  
\*\* 曲文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杨雯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引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各阶层在全球化中的获得感、成就感差异很大，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开始日益分化。近年来，在世界多处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之下，逆全球化运动不断兴起。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奉行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政策，给全球化进程以沉重打击。欧盟在经历债务、难民危机之后，仍陷在“超级全球化”的淤泥中无法自拔。英国强行“脱欧”，不仅是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也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在此之前，WTO 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上诉机制也由于美国的阻挠而陷于瘫痪。面对多边主义受挫的严峻形势，各国纷纷转向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仅 2017 年至 2021 年间，达成的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就有 114 个，<sup>①</sup>包括“欧日自由贸易协定”（2019 年）、“欧越自由贸易协定”（2020 年）、“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2020 年）和“日英自由贸易协定”（2021 年）等，亚洲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于 2020 年正式签订。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建设的进展与多边贸易谈判机制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美、欧、日，以及中国快速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同时，另一个大国俄罗斯是如何应对逆全球化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相对较少。实际上，近些年俄罗斯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样动作频频：2010 年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组建了三国“关税同盟”；2015 年以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为基础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生效，同年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8-2019 年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伊朗、塞尔维亚和新加坡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看出，俄罗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也在加快构建自由贸易网络。那么，俄罗斯是如何构建其自贸网络的？特别是，俄罗斯是如何选择自贸伙伴的？其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主体，与越南、伊朗、塞尔维亚和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从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方面就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世贸组织官网（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 二、关于俄罗斯自贸伙伴选择的研究

有关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散见于三个主题的研究中：俄罗斯对外经贸战略、欧亚经济联盟的 FTA 战略以及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以外国家构建的自由贸易协定。

**有关俄罗斯对外经贸战略的研究**，多数是在对不同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时，涉及贸易伙伴选择的分析。叶利钦执政时期，在 1996 年之前，俄罗斯的对外经贸政策主要是谋求与西方的全面合作，期冀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贸易伙伴以美、日、欧为主；1996 年以后，俄罗斯认识到西方根本无意帮助其发展经济，因此开始全面调整对外经贸政策，对外贸易的重心由单纯面向西方逐步转向东西并重，但欧美依然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sup>①</sup>普京的第一、第二两个总统任期内，强调俄罗斯的对外经贸战略已转变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通过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循序渐进地融入世界经济，一方面开始重视与独联体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发展紧密的经贸联系，另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与欧盟的经贸合作，并试图在后苏联国家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同时，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还注重制定中长期对外贸易战略，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地区经济组织活动，巩固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力争使俄罗斯成长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经济强国。<sup>②</sup>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时期，基本沿用了普京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思想，但更注重鼓

---

① 葛霖生：“论俄罗斯联邦的对外经济战略与我国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 年第 9 期，第 1-7 页；王晓菊：“俄罗斯的对外经贸政策及其调整”，《西伯利亚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20-22 页；Майер К.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нового профиля внешн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 зарубеж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рия 2: Экономика. Реферативный журнал. 1995. №.2. С.31-35; Косикова Л.С. Как России стро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странами СНГ?//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2005. №.1. С. 140-160.

② 张养志：“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对外经贸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5 期，第 32-36 页；张红侠：“俄罗斯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及发展前景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5 期，第 27-31 页；Войтешонок Я.А. Эволюция приоритетов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2000-2010гг.)//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2011. №.2. С.14-22; Е.У. Арапова, Т.М. Isachenko, “Russian trade policy: Main trends and impact on bilateral trade flow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in Emerging Economies*, 2019, Vol.12, No.1, pp.26-48.

励采用创新型、现代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贸易伙伴的选择上依然是将独联体国家放在首位，有所调整的是逐渐将贸易伙伴的对象转向亚洲，加强与中国、印度、阿富汗、蒙古及伊朗等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sup>①</sup>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其与西方的关系恶化，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主要通过欧亚经济联盟打造自身的对外贸易网络，贸易伙伴的选择基本是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中心展开。对这一时期俄罗斯自贸协定伙伴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成果主要以“贸易伙伴”而非自贸协定伙伴为考察对象，并且这些作品也未深入分析俄罗斯选择特定贸易伙伴的原因和逻辑。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在这类研究当中，学者们大多以欧亚经济联盟与某一具体的国家（经济体）或区域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为对象进行分析。关于欧亚经济联盟与塞尔维亚签署自贸协定，研究者认为，自贸协定的达成可以让塞尔维亚在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从而扩大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有利于在西巴尔干投射俄罗斯的软实力。<sup>②</sup>关于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新加坡的自贸协定，研究强调此类自贸协定具有试验（审慎）性质，通过复制这种合作模式可进一步扩大欧亚经济联盟在东盟的战略伙伴数量。<sup>③</sup>当然，也有以中俄构建自贸协定的前景和限制条件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多数认为，当前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

---

① 赵正东：“俄罗斯转轨时期对外贸易战略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5-38页；刘军梅：“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演进的理论逻辑与政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第138-144页。

② Лисоволик Я.Д., Чимириш Е.С. Сербия-ЕАЭС: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рамках зоны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РСМД. 2016. №37. С.4-25; М.А. Maksakova, “Foreign trade problems of Serbia with the EU and EAEU”, *Russian Foreign Economic Journal*, 2018, No.1, pp.37-45; Торопыгин А.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зоны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Сербия-ЕАЭС//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политика. 2021. №2. С.120-131.

③ Хейфец Б.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здания зоны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между ЕАЭС и АСЕАН// Вест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экономики РАН. 2018. №5. С.107-120; N.V. Fedorov,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AEU and Vietnam as a factor of Russian-Vietnamese rel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Russia*, 2018, Vol.9, No.1, pp.74-90; N. Volovik, “Free Trade Zone betwee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comes into force”,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s*, 2016, No.10, pp.20-24; Канаев Е.А., Королев А.С. ЕАЭС и АСЕАН: результат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20. №1. С.64-72.



贸区困难重重，应清醒认识中国在欧亚经济联盟国际经济网络中的定位。<sup>①</sup>关于未来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网络的构建，研究者指出，其重点方向是欧洲（塞尔维亚、摩尔多瓦）、亚洲（越南、中国、新加坡、印度等）和中东（伊朗、埃及、以色列）。<sup>②</sup>

**关于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外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目前俄罗斯仅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首先，这些国家均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历史上便与俄罗斯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其次，它们大都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地理位置优越，连接着欧洲和亚洲。关于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自贸协定，学者们指出俄罗斯是阿塞拜疆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战略伙伴之一，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具有特别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重要性。阿塞拜疆既是俄罗斯石油管线中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也是俄罗斯发展南北国际（能源）运输走廊的重要合作方，阿方可以从过境国服务中获得可观的收入。<sup>③</sup>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保持经济联系的原因，也是因为格鲁吉亚是中亚和高加索等国能源输出的过境国。<sup>④</sup>由此可见，俄罗斯在后苏联国家中自贸伙伴的选择，与巩固能源合作、加强对过境国能源的监管，以及打通国际运输走廊有重要的关系。

---

① 丛晓男：“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的经济障碍与现实选择——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 GMR-CGE”，《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82-111 页；宫艳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评析”，《欧亚经济》，2020 年第 6 期，第 45-61 页。

② 闫亚娟、陈志恒：“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贸区建设的进展与方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33-51 页；E. 维诺库罗夫：“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现状与初步成果”，《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3-26 页；E.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109-141; M.A. Maksakova, S. Gajić, “EAEU-Third countries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Natalia A. Piskulova, ed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Eurasian Integration*, Basel: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1, pp.209-226.

③ Исмаилова Л.Г.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х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Наука, техника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19. №.3. С.66-70; Лосева Д.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ые приорите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ысль. 2014. №.4. С.190-192; С. Stanislav, “Russia and Azerbaijan: the special features and main vectors of interstate coope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The Caucasus & Globalization*, 2010, Vol.4, No.1-2, pp.26-35.

④ Кривицкий В.О.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Грузия//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3. №.2. С.76-82; I. Indans, “Relations of Russia and Georgia: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Baltic security & defence review*, 2007, Vol.9, No.1-2, pp.131-149.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关于俄罗斯自贸伙伴选择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多数是在梳理和解读俄罗斯对外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对贸易伙伴（而非自由贸易伙伴）的选择有所提及，或是对欧亚经济联盟与某一国家（经济体）或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分析时有所涉及，但欠缺对俄罗斯自贸伙伴选择的全景式剖析。此外，关于俄罗斯自贸伙伴选择的动因分析，仍局限于国家战略层面，未将俄罗斯自由贸易网络构建嵌入到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更缺乏俄罗斯内部视角的阐释。本文通过系统层次分析法全面探析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逻辑，希望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和把握俄罗斯对外经济战略的全景规划和未来发展脉络，进而为推进“一带一盟”的对接以及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 三、俄罗斯自贸伙伴网络的建设

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开启了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1993年6月俄罗斯申请加入世贸组织（WTO），2012年成为WTO的正式成员。此外，俄罗斯还试图推进后苏联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1993年至1994年，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先后生效；1997年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三国自贸协定开始生效，自此以后，俄、白、哈三国成为独联体范围内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力量。俄罗斯还将独联体范围内的多边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2011年10月18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共同签署了《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定》，该协定于2012年9月20日正式生效，规定将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sup>①</sup>2013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第九个成员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自贸区协定之后，2015年12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于对俄方的利益和经济安全的考虑，紧急签署“关于终止与乌克兰有关的独联体自由

---

<sup>①</sup> 曲文轶：“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虽限制重重，但中国该如何应对”，观察者网，2021年3月20日，[https://www.guancha.cn/quwenyi/2021\\_03\\_18\\_584498.shtml](https://www.guancha.cn/quwenyi/2021_03_18_584498.shtml)

贸易区协定”的总统令。<sup>①</sup>自此，乌克兰退出了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定。

2014年5月29日，俄白哈三方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2015年1月1日生效，规定联盟内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在三国自由流动，并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同年，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后，俄罗斯以该组织为基础，推动跨区域经济合作，重点是与第三方开展自贸区建设。在自贸区建设初期，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已有50多个伙伴表达了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合作的意愿。<sup>②</sup>2015年5月，越南成为第一个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该协定于2016年10月正式生效，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份协议。欧亚经济联盟的第二个自贸协定伙伴是伊朗，2018年5月17日双方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临时自贸协议，2021年10月7日达成永久自贸协议。2019年10月，欧亚经济联盟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签署了自贸协定，与后者的自贸协定已于2021年7月10日正式生效。此外，欧亚经济联盟还与以色列、印度和埃及等国正在就自贸协定进行谈判。

至2021年11月，俄罗斯通报世贸组织已生效的自贸协定共12个，其中独联体范围内的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9个，以欧亚经济联盟为基础的跨区域双边自贸协定3个，共包含12个国家。<sup>③</sup>尽管在独联体范围内俄罗斯的自贸区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域外的自贸区拓展相对落后。从全球来看，至2021年11月已生效且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共351个，绝大部分是自贸协定。欧盟生效了46个自贸协定；美国生效了14个自贸协定，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自贸区网络。<sup>④</sup>东亚国家在区域一体化建设方面落后于欧美，但近些年以东盟为中心的一体化进程加速，尤以2020年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最。中、日、韩各

---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6 декабря 2015 г. № 628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действ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зоне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Украины”.

② Порядка 50 стран выразили жела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с ЕврАзЭС// РИА Новости. 25 января 2017 г. <https://ria.ru/20170125/1486437550.html>

③ 数据来源：世贸组织官网，RTAs in force, including accessions to RTAs, by country/territory, <http://rtais.wto.org/UI/PublicSearchByMemberResult.aspx?membercode=643>

④ 数据来源：世贸组织官网，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http://rtais.wto.org/UI/charts.aspx>

自生效的自贸协定也分别达到了16、18、20个，高于俄罗斯的数量。

虽然俄罗斯达成的自贸协定数量略少，但其选择的自贸伙伴却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第一，从地理范围来看，俄罗斯生效和正在谈判的自贸伙伴几乎涵盖了除大洋洲之外的整个东半球。在近5年内，俄罗斯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依托，加强了其在每个重点区域的市场存在——东南亚的越南和新加坡、南亚的印度、中东的伊朗和以色列、非洲大陆的埃及以及欧洲的塞尔维亚，以点带面地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自由贸易网络的基本形态。

第二，从国家的发展程度来看，俄罗斯选择的自贸伙伴国（包括在谈的自贸伙伴）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新加坡是唯一的发达国家），并且这些国家在经济体量上普遍偏小，达成的自贸协定内容层次较低。其中最大的经济体是新加坡（已签署未生效），2020年的世界经济排名是第37位（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0.4%）；第二大伙伴越南排名第42位（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0.32%）；伊朗排名第51位（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0.23%）；塞尔维亚排名第86位（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0.06%）。<sup>①</sup>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其他几个成员的经济体量也较小，2020年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排名第53位（在世界经济中占比为0.2%），白俄罗斯排名第79位（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0.07%），亚美尼亚排名第135位（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0.015%），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152位（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0.009%）。2020年，欧亚经济联盟与四个自贸伙伴的贸易额约为133亿美元，占当年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总额的2%，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3%。<sup>②</sup>同时，俄罗斯正在执行的12个自贸协定中，只有欧亚经济联盟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同越南的自贸协定在货物贸易之外包含了服务贸易，其余的都是货物贸易协定，而且在货物贸易协定中还设置了3-10年不等的关税过渡期，<sup>③</sup>以保护本国工业不受自贸伙伴的冲击。

第三，目前签署和谈判的自贸伙伴经济后发潜力较大。欧亚经济联盟签

---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20&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start=2020&view=bar](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20&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start=2020&view=bar)

②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

③ 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伊朗、塞尔维亚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文件，参见<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trade/dotp/Pages/Торговые-соглашения-ЕАЭС.aspx>

署和在谈的自贸伙伴几乎都是当前世界上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越南、新加坡、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有着良好的增长潜力和经济发展表现。在过去十年中，越南和印度经济均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6%–7%），新加坡和以色列也平均保持 3%–4% 的经济增长率。<sup>①</sup>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本身已经嵌入到很多成熟的自由贸易网络当中：越南、新加坡是东盟一体化的积极参与者，还与中、日、韩、欧盟等国家和组织达成自贸协定；埃及加入了南方共同市场、东部和南部的非洲共同市场；印度是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目前还在与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显然，与这些伙伴的合作可为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带来长远的益处，即通过自贸伙伴来逐步融入现有的全球自贸网络，并向更深层次的合作过渡。

从俄罗斯已签署和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可以发现，俄罗斯的自贸伙伴选择标准及自贸网络构建的基本轮廓较为清晰，即首先排除与大型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以避免一体化可能给其国内产业带来的冲击；其次是选择文化和政治亲近（塞尔维亚），或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国家（越南、新加坡、伊朗）作为进入域外经济集团（亚太与东盟、欧盟、中东）的突破口，既有利于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也可避免被正在开展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排除在外；<sup>②</sup>最后，尽可能多地选择处于贸易轮轴位置的国家，<sup>③</sup>使俄罗斯得以快速融入现有的全球自贸网络。

#### 四、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动机 ——基于体系、国家和社会的分析

在有关自由贸易战略制定的既有文献中，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以下三种解释范式：体系、国家和社会。<sup>④</sup>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多用国际权力分配

---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20&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start=2020&view=bar](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20&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start=2020&view=bar)

② 曲文轶：“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虽限制重重，但中国该如何应对”。

③ 如果一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则该国即为轮轴国家。轮轴国因与多个辐条国之间签订了自贸协定，其产品可以自由地进入所有的辐条国。

④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世界政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1-14页。

来解释自由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强调自由贸易战略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影响；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更多关注内部各类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博弈对自由贸易战略的影响。本文以此为依据，对俄罗斯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选择逻辑进行系统分析。

### （一）国际权力维度

自由贸易战略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追逐权力和安全的一种战略选择，国家常常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开展选择性的经济交往。俄罗斯为追求世界多极化中“一极”的国际地位和争夺国际制度话语权，一方面整合独联体空间，构建欧亚经济联盟，巩固其战略优势，形成对外经济战略的基地；另一方面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主要抓手，采用与第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逐渐向域外扩展，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自贸区网络。

#### 1. 追求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地位

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各大国在区域层面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异常激烈。根据霸权稳定论的逻辑，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霸权国来维持，那么，在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霸权国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①</sup>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横跨欧亚两大洲，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塑造了它独具特色的世界观，成为世界体系中重要的“一极”是俄罗斯对外发展中一直追逐的目标。

冷战时期，为对抗美国，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组建了由其主导的政治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意在巩固二战后苏联对周边东欧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在经济上则提出“莫洛托夫计划”，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经济掌控，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方”政治经济体系，稳固了苏联阵营的基础。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国力大为衰落。在短暂经历倒向西方阵营无果之后，北约东扩的压力使得俄罗斯不得不加紧巩固周边地区，尤其是在后苏联空间的政治经济影响。这一时期，俄罗斯争取并尽可能多地与独联体成员国保持合作，并承担更大范围的义务。1995年，时任总统叶利钦批准了《俄

---

<sup>①</sup> 李巍：“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2-129页。

罗斯对独联体成员国的战略方针》，其中提到“维持原苏联地区这个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加强独联体一体化建设，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sup>①</sup> 向外界传递的明确信息是：俄罗斯要在后苏联空间担当主角，发挥组织领导者的作用，使俄罗斯在“近国外”（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拥有独特的权利和义务。之后，在政治上，俄罗斯寻求与独联体国家全方位、高层次的元首及部长级联系，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一致；在军事上，通过与独联体国家签订“集体安全条约”，打造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御空间，提高联合军事能力；在经济上推动多边经济合作，强化与独联体国家的全面经济联系。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精英们坚定地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应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俄罗斯注定要成为这些极点之一。<sup>②</sup>因此，争当“一极”的思想在之后俄罗斯发布的多份重要政策文件中都有体现。2000年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谈到俄罗斯的坚定意图是不仅要建立多极化，还要塑造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俄罗斯将努力形成真正体现当代世界多样性和利益多元化的多极国际关系体系。<sup>③</sup>2016年《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当代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其本质是形成多中心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新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中心正在出现。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战略重点是成为当代世界中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sup>④</sup>但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极”并非易事，俄罗斯清楚地认识到，仅凭借一己之力难以达成目标，必须整合后苏联空间，以此为依托壮大实力，再向域外扩展。在独联体范围之内，首先，俄罗斯将“集体安全条约”升级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并赋予其国际区域组织的地位，重新加强先前较为松散的独联体内部政治与军事合作，强化俄罗斯的主导地位，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军事政治威望。其次，构建以俄罗斯

---

①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Росси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1995 г.) 9 декабря 2005 г. [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V6BZ29/content/id/427752](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V6BZ29/content/id/427752)

② 李永全：“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页。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0. 01. 2000 г. №24 (О концеп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0 января 2000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14927>

④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 Путиным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1 декабря 2016 г. [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V6BZ29/content/id/2542248](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V6BZ29/content/id/2542248)

为中心的欧亚经济联盟，促进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合作，致力于发挥俄罗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影响力。再次，在文化上与独联体各国共同发表《独联体人文合作宣言》，推动独联体国家的人文交往，进而打造多极世界中以俄罗斯为“一极”的战略基地。在独联体的范围之外，俄罗斯试图采用欧亚经济联盟与第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逐渐向域外扩展，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外交权重”。在2021年5月21日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上，普京呼吁欧亚经济联盟应尽快扩大自贸伙伴的数量，<sup>①</sup>这也印证了他公开表达的观点：“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强大的超国家联盟模型，它能够成为当代世界的极点之一。”<sup>②</sup>而自由贸易协定就是那根将战略基地和战略支点有效连接的“血管”，通过这种方式不但明显体现了俄罗斯的主导作用，还将夯实其作为世界“一极”的地位。

## 2. 争夺更大的国际制度权力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国际经济制度为各国的合作提供了保障，但经济制度话语权之争越来越成为当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新焦点。根据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国际制度既可以为制度成员方提供普遍性的公共服务，又能被制度领导国“私有化”为特殊的权力工具。<sup>③</sup>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且体量有限，在大多数的国际经济组织中都是被动的参与者，特别是在贸易规则的制定上更是被西方国家忽略的小伙伴。近年来，美日欧谈判和签署的自贸协定不断突破传统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向着更多领域和更高标准发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是美欧建立贸易新规则并协调法规和标准体系的新尝试，谈判包括加快实施《服务贸易协定》、推动完成《信息技术协定》拓围谈判和启动《环境产品协定》。美国意图在跨境数据流动、国有企业非公平竞争等方面设立新规则，获取国际贸易新规则和新秩序建设的主导权。而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货物的国民待遇和

---

①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расшири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ЕАЭС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ям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ТАСС. 21 мая 2021 г.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ЭХО Москвы. 4 октября 2011 г.

③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8-57页。



市场准入、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发展中小企业、监管一致性和透明度以及反腐败方面确立了更高标准的新规则，旨在将CPTPP打造成引领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风向标的新组织。这对于局限在货物贸易等传统领域且实施较低程度对外开放的俄罗斯来说，形成重大挑战。但拥有大国抱负的俄罗斯并不甘心被西方排除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之外，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就是要塑造一体化机制，提升整体议价能力。该机制的主导者是俄罗斯，以独联体国家为主要力量，发展目标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抗衡，成为世界经济规则制定中具有重要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联盟组织。正如普京总统所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融入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之中，而是要参与决策进程和制定游戏规则。”<sup>①</sup>

自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以来，俄罗斯一方面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亚太经合组织、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加勒比共同体、非洲联盟等）和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贸发会等）开展多边合作，以期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为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争取权益，向世界发出更多的俄罗斯声音；另一方面督促欧亚经济联盟与第三国签署自贸协定，从机制的设置上为俄罗斯获取特殊的战略利益。贸易谈判过程涉及诸多关于市场准入条件、贸易规则以及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具有制度优势的主导国往往可以在谈判的规则安排上就其他方面的事宜与谈判对象国交换。同时，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具有排他性，这有助于谈判双方对第三国形成歧视性的待遇优势。故而，在自贸伙伴的选择上，俄罗斯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抓手，优选更符合俄罗斯战略利益的伙伴进行谈判。

## （二）国家战略维度

自由贸易协定早已成为各国开展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作为国家对外战略，它往往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因素，更多地承载着国家政治、安全方面的战略意图。因此，俄罗斯选择的自贸伙伴，不但是其对外经济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依托，同时也要契合俄罗斯国家发展对经济安全、能源技术、吸引

---

<sup>①</sup>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外资及商品出口等方面的战略需求。在这里主要用已经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贸协定的对象国为例，分析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逻辑。

**越南。**作为东盟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越南成为俄罗斯给欧亚经济联盟优选的首个自贸伙伴，其对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价值不言而喻。随着俄罗斯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东方”，东盟成为其理想的经济合作目标。2015年至2020年间，欧亚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欧亚经济联盟国际活动的主要方向》，均将与东盟国家建设自由贸易区列为优先。2019年，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东盟签署经济合作备忘录，并批准了《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东盟2020年合作纲要》；2020年，双方将合作计划延长至2025年，这被俄罗斯视为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迈出的重要一步。<sup>①</sup>

一方面，随着各大国将目光聚焦于东盟地区，俄罗斯正面临着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被边缘化的风险，俄罗斯需要加强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联系。因此，作为“老牌”盟友的越南成为俄罗斯进入东盟的支点，俄罗斯迅速与其签订自贸协定，试图采用累积扩大的方式激发东盟各国竞相对俄罗斯开放，实现与东盟的顺利对接，以期在“南北方向”上打通欧亚空间的区域联动。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俄罗斯国内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市场空间来带动增长。近年来，越南就其经济权重、增长动力和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而言，在某些方面领先于欧亚经济联盟，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发动机，甚至是投资者和技术领导者”<sup>②</sup>。特别是越南在制造业方面蓬勃发展，通过自贸协定可使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并使其外部市场多元化。甚至在自贸协定签署之前，俄罗斯商界就已纷纷呼吁“应尽快完成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sup>③</sup>。越南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首签伙伴，是开展FTA合作的“试验场”，<sup>④</sup>双方达成自贸协定的战略价值与示范意义更高。

---

① Евгения К.Б.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напомнил АСЕАН об идее Большо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5 ноября 2019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148496>

② Мазырин В. Вьетнам: зоны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6. №3. С.72-82.

③ Локшин Г.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Вьетнама//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2014. №.25. С.55-63.

④ Цветов А. Шесть вопросов о ЗСТ ЕАЭС-Вьетнам// РСМД. 29 июня 2015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shest-voprosov-o-zst-eaes-vietnam/>

自由贸易协定夯实了“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强化了越南在东南亚事务中的外交地位，与此同时，也有助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美国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俄罗斯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东盟及亚太地区的事务中，更有效地发展伙伴关系网络，参与一体化进程以及解决东亚共同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比直接以军事大国的“硬”身份介入东盟事务更容易让东盟国家接受，同时还能巩固俄罗斯在该地区已有的采矿、核能、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优势。

**新加坡。**作为“亚洲门户”和东盟经济的领先国家，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金融和物流中心之一。凭借其透明、有利于增长的政府监管政策、低税收、发达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银行系统和地理位置，新加坡被俄罗斯视为自贸伙伴的优选国。普京多次公开强调新加坡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重要且有前途的合作伙伴。<sup>①</sup>俄罗斯对新加坡的浓厚兴趣不仅因为其作为亚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金融桥梁，有着成熟的贸易网络平台，还缘于其在商业、技术创新和投资管理方面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其雄厚的投资资本更是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发展中相当紧缺的资源。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和北极航道的开发需要大量资本进入，新加坡是最佳的投资伙伴之一。另外，新加坡与 27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自贸协定，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和技巧，与这样的国家进行自贸协定的商谈，可为俄罗斯积累经验、培养谈判人才。总的来说，与新加坡不断深化合作，一方面是对越南自贸协定的补充，奠定俄罗斯与整个东盟合作的基础，契合“大欧亚”的空间理念；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将欧亚地区的一体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步。<sup>②</sup>

**塞尔维亚。**该国被俄罗斯称为最亲近的亲戚，<sup>③</sup>是俄罗斯自由贸易网络部署在欧洲的桥头堡，战略地位重要。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中部，是俄罗斯、里海和中亚能源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成为俄美欧争夺和博弈的对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制裁俄罗斯并在巴

---

① Путин: Сингапур-важный партнер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EADaily. 13 ноября 2018 г.

② Хейфец Б.А. Зона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ЕАЭС-Сингапур-новое п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для России//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20. №.2. С.80-93.

③ Петр Акопов. Россия дружкой не торгует// Взгляд. 16 октября 2014 г. <https://vz.ru/politics/2014/10/16/710930.html>

巴尔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形成新的挑战。美国提出“替代能源计划”，吸引巴尔干地区国家加入，欧盟则积极促进巴尔干地区加入欧洲一体化。2014年7月，欧盟轮值主席国意大利外长莫盖里尼强调：“塞尔维亚想继续得到欧盟的援助，就得在俄、乌政策上与欧盟保持一致。”<sup>①</sup>但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在经济、能源和军事等方面保持着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且在科索沃问题上得到了俄罗斯的大力支持。塞方明确表示“永远不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sup>②</sup>，坚持并扩大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

在与美欧的角逐中，俄罗斯也意识到不能一味在口头上遏制西方势力的扩张，而是要通过扩大在巴尔干地区的存在，增强自己同西方国家竞争的能力。<sup>③</sup>首先，俄方推行务实的经济外交，充分利用自身与巴尔干国家之间传统的民族、宗教纽带，以能源为工具，强化巴尔干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积极发展与能源过境国的关系，逐步恢复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塞尔维亚是俄罗斯“南溪管道”通往欧洲的重要过境国，俄罗斯通过大力投资塞尔维亚的油气设备，收购其大型国有企业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逐步成为其日益重要的投资来源方和贸易伙伴国。

另外，塞尔维亚与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欧自由贸易区（CEFTA）均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借助与塞尔维亚的协定关系，俄罗斯不但可以加强与整个巴尔干地区的贸易投资互动，同时还能采用迂回战术满足其对欧盟技术和资金的需求。这一举措为俄欧在该地区进行积极对话创造了先决条件，并削弱了那些质疑欧亚经济联盟在国际舞台有效性之政客的立场，加强了俄罗斯与欧洲在其他更广泛问题上的全面互动。同时，俄罗斯也有借助此自由贸易协定增进体制合作的考虑。俄罗斯与塞尔维亚同族同教，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相较欧洲的自由民主，出于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需要，塞尔维亚政治精英更偏好俄式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sup>④</sup>

---

① Gordana Filipovic, “Serbia should align foreign policy with EU more, Mogherini says”, *Bloomberg*, December 28, 2014.

② Михаил К. Посол Сербии ответил на призыв ЕС ввести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РБК. 4 мая 2021 г. <https://www.rbc.ru/society/04/05/2021/609097249a79474c51ac68b6>

③ 朱晓中：“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第5-12页。

④ 同上。

**伊朗。**地处欧亚大陆贸易要道交汇处的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选择的重要战略依托。单纯就经贸关系而言，俄罗斯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长期为其提供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与核设施。作为优选的自贸伙伴，打通伊朗市场相当于叩开了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市场的大门，能够促进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其他中东国家的经济互动。值得一提的是，伊朗通往波斯湾、印度洋的大通道将使得高加索地区、里海地区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各个国家形成互动，可实现欧亚大陆“南北方向”的联通，提高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商品的过境能力，增强俄罗斯在大中东和南亚的影响力。从战略角度看，伊朗也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临时性”盟友。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东乱局相互叠加，而美国在中东奉行整体超脱、局部收缩的战略，试图通过组建“中东战略联盟”、扩大军售，来提高盟友的防务能力，以背后掌舵的方式维持在中东的存在和影响。<sup>①</sup>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抓住机会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借此加强了双边经贸关系，而且也是重塑大国地位、突破西方制裁、拓展生存空间的战略布局。

尤其重要的是，里海能源一直是美欧觊觎的重要战略物资，为控制里海资源，他们分别从“东西”方向上修建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油气管线和“纳布科输油管线”<sup>②</sup>，绕开俄罗斯和伊朗，直接将石油、天然气送往欧盟和其他地区。美欧还加强与相关沿线国家的联系，在里海地区打造有利于西方的能源和地缘态势，平衡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区域的影响力。作为应对，俄罗斯着力采取在里海地区“北向”修建两条新输油管线与维护旧管道相结合的策略，以便继续掌握对里海能源的主动权，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弱化美欧“东西”能源运输。而伊朗为吸引投资、打破美国对其制裁，推出了“南向”方案，即穿越伊朗直通波斯湾的能源运输线路。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优选伊朗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协定伙伴，更多是为保证俄罗斯在里海及中东地区能源、地缘和政治利益的战略部署。

---

<sup>①</sup> 孙德刚、王亚庆：“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政策评估”，《当代世界》，2019年第9期，第37-43页。

<sup>②</sup> 该管线由于俄罗斯的极力反对而尚未成形。

综上所述，俄罗斯通过巧妙的布局，将自贸伙伴的选择与国家发展中的各项战略相契合，将政治诉求与经济利益相结合。一方面，在与西方对抗和反制裁常态化的情况下，为避免被世界主要经济集团孤立，突破封锁，采用“以点带面，以小博大”的方式，推动更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期为国内经济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自贸协定作为一种合作机制，将进一步加深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自贸伙伴之间的政治、安全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欧亚经济联盟选择的自贸伙伴经济体量较小，但与它们组建自贸区可以带给俄罗斯倍增的战略益处。

### （三）国内社会维度

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会对国内社会不同行为体造成影响。因此，国内社会行为体如何通过游说、拉拢等方式对贸易政策施加影响，也是自由贸易协定研究的重要内容。自由贸易战略的制定及伙伴选择主要由国家职能部门实施，在实际操作当中，职能部门需要选择对本国有利的自由贸易谈判对象，负责招商引资、对外援助、对外经济合作、协调与外国进行具体经济事务的对接等相关事宜。这些往往会直接触碰社会各方团体的利益，职能部门常常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游说。他们或进入国家机构体系，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或在国家机构中寻找代理人，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游说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政策。<sup>①</sup>最终，自贸伙伴的选择往往成为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

在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中，联邦政府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直接负责和参与自由贸易战略的制定及自贸伙伴的选择。其中，经济发展部是主要参与部门，它是俄罗斯政府宏观经济的主管部门，也拥有一定的对外职能。其主要负责制定俄罗斯对外经济战略和国家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确定政策的优先顺序，协调与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经贸合作、对外投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等事宜。<sup>②</sup>该部门在贸易政策上主张自由开放，但在自贸谈判中更倾向

---

① 冯玉军：“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与过程”，载冯绍雷、相蓝欣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7.08.2004 г. № 443 в ред. от 21.05.2007 г. № 306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я 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торговли». <http://docs.pravo.ru/document/view/4594/79794935/>

同经济体量小、易谈判且能带来更多实际利益的投资型国家进行接触，因为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国家出口是该部门的绩效标准之一。而具体的贸易谈判工作则是由其下设的贸易谈判司完成，该司经常受到支持自由贸易的利益集团游说。其中，俄罗斯钢铁制造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是经济发展部的座上客。俄罗斯最大的钢铁和矿业公司谢韦尔集团（Северсталь）总裁阿列克谢·莫尔达绍夫（Алексей Мордашов）与贸易谈判司前司长马克西姆·梅德韦科夫（Максим Медведков）同为俄罗斯贸易政策和WTO委员会负责人，他们都认为加强自贸区建设有助于俄罗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建设。早在2010年，莫尔达绍夫就指出，其公司不仅要在俄罗斯开展业务，更要将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作为重点拓展市场。<sup>①</sup>此外，俄罗斯外贸银行（ВТБ）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国有控股银行也积极游说经济发展部与越南、塞尔维亚达成自贸协定。<sup>②</sup>

与经济发展部联系最为紧密的部门之一是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该部门掌管着俄罗斯除能源之外的其他重要的工业资源，下设航空工业司、军工综合司、化工与生物综合司、汽车与铁道司等，在俄罗斯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代表俄罗斯国内制造业利益集团的声音，经常在俄罗斯国内开展贸易保护主义的游说。工贸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工业中长期发展目标，确定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编制产业发展规划以及监管俄罗斯国内的贸易活动，<sup>③</sup>因而，工贸部的政策偏好也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部对自贸伙伴的选择。另外，工贸部还肩负着对国内产业进行引导和扶持、寻找出口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准入等职能。与经济发展部选择偏好不同的是，该部门对贸易政策的态度较为保守，因为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合理，

---

① Глава “Северстали”: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бизнеса интересны Африка и Вьетнам// Вести. 3 декабря 2010 г. <https://www.vesti.ru/finance/article/2037063>

② 经济发展部前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Алексей Улюкаев）在任期间还担着俄罗斯外贸银行监事会主席一职。2014年，乌柳卡耶夫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区的建设，并提议在贸易中直接使用卢布-越南盾结算，这正与俄罗斯外贸银行在越南拓展的业务有关。除此之外，近些年来俄罗斯外贸银行大力开展塞尔维亚业务，为塞尔维亚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提供了7500万欧元的融资，还为塞尔维亚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提供银行担保。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5 июня 2008 г. № 438. <https://minpromtorg.gov.ru/>

大规模敞开市场将导致制造业在对外开放中受到严重冲击，而且制造业本身与俄罗斯军事部门、精密仪器部门、安全部门联系紧密，完全开放市场也将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隐患。农业机械制造集团（Росспецма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之一，总裁康斯坦丁·巴布金（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бкин）积极游说政府将自由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政策，扶持非资源部门的各项生产，政府应对此类行业进行补贴以确保与外国制造商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sup>①</sup>在自贸伙伴的选择上，巴布金支持俄罗斯与伊朗、塞尔维亚的合作，他指出伊朗和俄罗斯同为原材料国家，发展非资源加工领域的合作是利益互补的。<sup>②</sup>俄罗斯技术集团（Ростех）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军工制造商，通过各种方式游说工贸部对购买军工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伙伴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希望通过工贸部、外交部开辟新的市场。2015年工贸部部长丹尼斯·曼图罗夫（Денис Мантуров）<sup>③</sup>访问伊朗时，致力于在各个领域寻找双方的合作机会，<sup>④</sup>包括高科技产业、军事技术、工程技术、航天领域等方面。之后，2017年俄罗斯工贸部副部长格奥尔吉·卡拉马诺夫（Георгий Каламанов）与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莫吉塔巴·霍斯罗塔吉率先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缔结临时性自由贸易协定交换了意见。<sup>⑤</sup>

俄罗斯能源部主管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工程，肩负着国家能源战略的部署任务，对自由贸易政策持中立态度，因为能源产业作为基础部门，在世界各国通常享受零关税且无任何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因此，能源部对于贸易

---

① 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бкин: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нуждается в “трех с половиной поворотах”// Накануне.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https://www.nakanune.ru/articles/112383>

② 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бкин: Рынок Ирана может ст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ной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для РФ// Накануне. 18 мая 2016 г. <https://www.nakanune.ru/news/2016/05/18/22436399>

③ 工贸部部长丹尼斯·曼图罗夫是俄罗斯最大的军工制造公司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Сергей Чемезов）向普京推荐的人选，被认为是“切梅佐夫集团”最忠诚的朋友。俄罗斯技术集团的高管多次公开表示，新加坡、伊朗和印度是公司认为最有发展前景的市场，希望能加强与这些对象国家的合作。

④ Денис Мантуров подписал меморандум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инпромторга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удников и торговли Иран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декабря 2015 г.

⑤ Георгий Каламанов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Первым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Министр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удников и торговли Ирана Моджабой Хосровгадже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17 г.



自由化并不太热衷。当然，如果自贸伙伴能为部门带来切实的利益，能源部也会积极推动自贸协定的达成。俄罗斯能源部对选择伊朗作为自贸伙伴表现积极。2016年，能源部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ак）在参加“制裁后的生活——伊朗重返全球经济舞台”圆桌会议时指出，后制裁时期扩大俄伊两国合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制定规范性文件和消除行政壁垒，两国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若该协定能够达成，将为合作的发展注入新动力。<sup>①</sup>虽然美国对伊朗能源行业实行了制裁，但俄罗斯能源公司对与伊朗的合作兴趣不减。<sup>②</sup>俄罗斯专家认为，在制裁的背景下，自贸协定的达成将部分补偿俄罗斯在美国市场的损失。同时，由于美国的制裁，法国道达尔公司退出伊朗南帕尔斯气田第11期项目（South Pars-11），为俄罗斯能源公司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他们将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伊朗境内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sup>③</sup>

除此之外，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还涉及某些特定部门。俄罗斯农业部在农业政策上具有两面性，既希望推动本国农产品的出口，又希望获得更多的政府保护，所以农业部支持与俄罗斯农业资源互补且不形成竞争关系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俄罗斯外交部也积极参与自贸伙伴的选择，由于此事关乎国家经济、政治和安全，该部门更偏重于考虑自贸伙伴对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影响，其意见较少受行业因素影响，多得到最高决策者的认同。

由此可见，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内行政官僚机构与背后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博弈。在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上，相较于工商、服务业等社会群体，占据优势地位的制造业利益集团游说能力更强，他们积极推动政府与贸易小国达成自贸协定，避免对其利益造成巨大冲击，并争取向这些国家及其所在区域集团拓展自己的出口市场。简言之，从社会视角观察，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也是各种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之间争取权力和利益、相互较量与妥协的结果。

---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ак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Иран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6 июня 2016 г.

② Ес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импульсы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и Иран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июня 2019 г.

③ Екатерина П. ЗСТ между Тегераном и ЕАЭС заработает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в 2022 году// Известия. 27 августа 2018 г.

## 五、结语

一国的对外经贸政策既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对外战略和国家发展目标，同时也会受国内社会团体的影响。本文基于这一思路，从国际权力、国家战略和国内社会三个维度对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动机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首先是为了实现多极世界中“一极”的战略愿景和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决策的战略意图；其次，还要契合俄罗斯国家发展对于经济安全、能源技术、吸引外资以及商品出口等方面的战略需求；最后，也是俄罗斯国内行政机构与各类社会团体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包括军工部门在内的工业集团，它们在俄罗斯避免对大型和发达经济体开放、选择小型经济体和政治友好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这种相对保守的自贸战略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影响。归根结底，俄罗斯自贸网络的构建既是应对域外大国对其发展空间挤压的无奈之举，也是在逆全球化态势下的主动谋划。俄罗斯放弃了转型初期激进的、完全放开的自由模式，选择了一条保护与开放兼顾、循序渐进融入世界经济的路径，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俄式特色的自贸网络布局。

俄罗斯的自贸伙伴选择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分层地缘战略建构，即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核心内层形成世界体系中的完整一极，围绕“极点”逐步向中层的东盟（越南和新加坡）、中东（伊朗和以色列）以及欧洲（塞尔维亚）发展，再向外层的非洲（埃及）、南美洲（委内瑞拉和智利）延伸，从而形成由近及远的全球网络。

对于中俄迄今没有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缘由的追问，也可以从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维度来解释。首先，从国际权力视角来看，两国对自贸协定的定位不同。俄罗斯偏重于通过自贸协定建立政治经济网络，以对抗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则倾向于将自贸协定作为释放友好信号、维护周边和平、巩固伙伴关系的途径。其次，从国家战略来看，俄罗斯更多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待自贸协定，其经济开放的议程着眼于促进本国新工业的建设而非贸易发展。中国则是从经济和长期影响的角度来理解自贸协定，即自贸协定是为了确保对市场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从对国内的影响来看，俄罗斯忌惮中国经济体量过大，担心自由贸易

会使中国商品冲垮国内产业特别是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因而对与中国的自贸建设（包括在上合框架下的自贸协定）心存疑虑。综上，中俄两国未能在自贸协定方面有大的突破，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解释，但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不妨碍中俄国家层面上的战略互信与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展望未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议题，在目前双方经贸合作协定<sup>①</sup>的基础上，随着俄罗斯等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会逐步展开和加深。届时，中俄关系的战略内涵会更加充实和丰富。

---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anti-globalization, the recove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has been weak and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 mechanisms have been blocked. Countries have turned to bilateral or regional free trade. Positioning itself as a major country, Russia has also stepped up its efforts to build a free trade network dominated by itself.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ased on the Customs Union of Russia, Belarus and Kazakhstan, it has also promoted the latter's cooperation with the four countries namely Vietnam, Iran, Serbia and Singapore in reach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lthough Russia's chosen free trade partners are relatively small economies, they have a high degree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dopting the hierarchy analytic approach,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logic of Russia's choice of its free trade partners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 namely, international power, national strategy and domestic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Russia's choice of free trade partners needs to carry its strategic vision of building "one pole" in a multi-polar world and its strategic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world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the choice of free trade partners also

---

<sup>①</sup> “关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生效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9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10/25/content\\_5445095.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10/25/content_5445095.htm)

needs to meet the strategic needs of Russia's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reas such as economic security, energy technology,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orting commodities, making all endeavors to protect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society, the choice of free trade partners also conveys intention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within Russia.

**【Key Words】**Russia's Free Trade Agreement, Russia's Free Trade Partner,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2008 году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шло вяло, контр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усиливалась,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е торгов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ыли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ы, и страны перешли к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ил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Россия, позиционирующая себя как крупная держава, также активизировала свои усилия по созданию сети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под собственны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Помимо созда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базе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Беларус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на также подтолкнула последний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с четырьмя странами - Вьетнамом, Ираном, Сербией и Сингапуром. Выбранные Россией партнёры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ям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имеют больш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их небольш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азмер.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иерарх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логики выбора Россией партнёров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ям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на трё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мощ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мощи, выбор Россией партнёров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ям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основан на её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вид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одного полюса» в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м мире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намерении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о мировых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авил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выбор

партнёров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ям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также должен отвеча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обла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экспорта товаров, чтобы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страны. Наконец,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ыбор партнёров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ям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отражает интересы и намере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групп внутри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артнёры п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中亚治理的比较 ——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规范性改变\*

孙超\*\*

**【内容提要】**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上合组织在发挥功能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构建集体认同等方面表现出色。相比之下，欧盟在中亚推进的“规范性外交”却遭遇诸多瓶颈。因此，欧盟也在调整其中亚政策。2019年，欧盟启动全新的中亚战略，将“连通”作为核心理念，推动中亚扫清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障碍和制度障碍，“涓滴”欧洲化的治理模式。但这一新战略的推进存在较大的难度：一是缺失地区合作的双赢思维，导致有效多边主义难以实现；二是过分强调地区治理的条件性和规范性，束缚了合作的灵活性；三是集中关注民主和人权议题，引起中亚各国的普遍不安。在国际大变局下，欧盟的中亚治理需摒弃零和思维，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伙伴而非对手，才能推进中亚善治的目标。

**【关键词】**上海精神 上海合作组织 欧盟治理模式 欧盟中亚战略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140(2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后欧亚地区民族分离运动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9CGJ01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华胜教授、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王志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后崔珩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 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 一、导言

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这个成立于21世纪初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为文化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开创了平等互利合作的新模式。2001年的“9·11事件”后，欧盟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也逐年提升。2006年，作为首个连续访问中亚五国的欧盟国家外长，德国的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对媒体表示，欧盟在中亚有三大战略利益：一是中亚在地缘上邻近不稳定地带，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二是中亚位于抗击宗教激进主义的前沿阵地；三是该地区能源丰富。<sup>①</sup>在欧洲学者看来，上合捷足先登，成了机制化水平高、有影响力的地区组织，填补了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政治真空。<sup>②</sup>上合组织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源自其灵活性和适应力，不受官僚主义的影响。<sup>③</sup>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当前中亚安全合作和互联互通相当有益的管理手段与平台。<sup>④</sup>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获得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成为全球多边体系中的重要组织。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分别同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东盟秘书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获得了周边其他组织的承认和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秉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在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发挥了自身影响力，成为在中亚地区影响重大的国际组织。

与上合组织不同，作为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欧盟是践行地区间主义最成功的地区组织。欧盟期待通过与中亚各国的对话决定合作进程与方向。2007年，欧盟高级代表团访问中亚，宣告欧盟与中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sup>⑤</sup>。随后，欧盟出台了首份针对中亚的战略关系文件：《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重新评估中亚的战略地位，深化同中亚各国的全方

---

① Oksana Antonenko, “The EU should not ignor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olicy Brief*,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May 2007, p.1.

② Ibid, p.11.

③ Anna Matveeva, Antonio Giustozzi, “The SCO: A Reg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Making”, *Crisis Sta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2*, LSE, September 2008, p.5.

④ 冯绍雷：“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6期，第50-52页。

⑤ 李立凡：“欧盟：新的中亚‘战略玩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4期，第47页。

位合作。该文件没有提到已同中亚各国深入开展安全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亚作为欧盟东扩后的大周边，尽管其地位有所提升，但在欧盟的对外政策序列中仍次于其他周边国家，甚至弱于南高加索地区。中亚各国既无法成为欧盟潜力较深的合作伙伴，也不希望借助欧盟规范来指导本国的国家建构，欧盟对中亚政治变革的批评常引起中亚国家的不满。

虽然欧盟对中亚的新伙伴关系战略（2007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的难民危机等，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巨大的挑战。在各类危机的冲击下，欧盟见证了成员国互信降低、社会疏离感上升，民族主义情绪、历史仇恨复燃和相互指责增加，诸般问题浮出水面，严重妨碍着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欧盟的合作。<sup>①</sup>欧盟的对外政策相应地进行了务实调整，在继续推动有效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在意现实安全与经济利益，规范性力量和价值观外交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下降，对外政策越来越强调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经济收益。

欧盟很快调整了中亚政策，于2017年6月发布了《欧盟-中亚关系》，强调同中亚各国拓展区域安全对话，减少激进主义，增进同中亚地区的战略沟通，维护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大中亚周边的稳定。<sup>②</sup>

2019年，欧盟出台了针对中亚的新战略，重新对中亚进行定位，试图在规范性要求与现实利益之间进行平衡。<sup>③</sup>2019年新战略强调透明管理、可持续的互联互通，甚至期待能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加以制衡。<sup>④</sup>其关键的概念“连通”（Connectivity），主要是为了强调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别。

同期，上合组织完成了扩员。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接收印度和

---

① 金玲：《欧盟对外政策转型：务实应对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74-75页。

②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EU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June 19, 2017, pp.4-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3991/st10387en17-conclusions-on-the-eu-strategy-for-central-asia.pdf>

③ 鞠豪：“欧盟的中亚战略解析：规范与利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125-126页。

④ Martin Russell, “The EU’s new Central Asia strategy”,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019, pp.10-1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3162/EPRS\\_BRI\(2019\)633162\\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3162/EPRS_BRI(2019)633162_EN.pdf)



巴基斯坦为成员国，标志着上合组织在成立 16 年后初步完成了机构设置、制度化建设和多边合作框架搭建等初级阶段的任务，向成员扩充、议程扩展与合作深化的阶段迈进。<sup>①</sup>2018 年，上合组织在青岛召开扩员后的首次峰会，成员国精诚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使上合组织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提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示中国将与成员国一道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sup>②</sup>。2021 年，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 20 周年之际，启动了接收伊朗为成员国的程序，并且吸收沙特、埃及、卡塔尔为新的对话伙伴。<sup>③</sup>

欧盟与上合组织在中亚几乎同时起步，但采取不同的地区合作模式进行中亚治理。欧盟至今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仍处于第二梯队，远远弱于上海合作组织。欧盟对上合组织带有较为严重的偏见，对同上合组织在中亚的合作态度暧昧不明。上合组织被欧盟视为反西方的联盟，对美欧在中亚推进的民主改革制造障碍。欧盟为什么刻意忽视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治理中的巨大影响力？为什么欧盟对中亚的“规范性改变”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欧盟与上合中亚治理的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探索。

从本质上看，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欧盟的对外政策强调规范和制度影响，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注重地区合作的利益向度，欧洲地区合作的现实主义思路往往服务于欧盟的特定利益；二是追求地区治理的规范性，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高标准，要求地区合作按照欧洲化的模式进行；三是地区治理中对政治和人权议题的关注较为集中。

本文从 2019 年欧盟新中亚战略的地缘政治构想入手，梳理欧盟同中亚合作的机制路径，通过对欧盟中亚地区政策的分析，指出一些观念和政策偏见使其难以同上海合作组织深度合作，也影响其中亚治理的效果。就欧盟与

---

① 曾向红：《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81 页。

②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2018 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xinwen/2018-06/10/content\\_5297652.htm](http://www.gov.cn/xinwen/2018-06/10/content_5297652.htm)

③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2021 年 9 月 17 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http://www.cidca.gov.cn/2021-09/18/c\\_1211374916.htm](http://www.cidca.gov.cn/2021-09/18/c_1211374916.htm)

上合组织的关系而言，在当前国际大变局的背景下，双方在中亚地区存在合作的机遇与可能性。

## 二、欧盟新中亚战略的地缘政治构想

相比之前的中亚战略，2019年欧盟新版中亚战略的目标更为务实，在推动中亚地区交通、边境管理和商业发展之外，更为强调自身的利益。新战略的基石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在2018年9月提出的“连通战略”密切相关。这项有关欧洲和亚洲互联互通的战略，旨在构建全面可持续的伙伴关系，提升以规则为基础的欧亚互联互通。该方案分为三部分：一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和高效能网络建设，推动数字、能源与人员连通；二是推动与亚洲各国包括地区国际组织发展开放、可持续、包容性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伙伴关系；三是可持续的金融调动，解决重大投资缺口，为商业活动创造公平的条件。<sup>①</sup>尽管莫盖里尼强调这不是针对另一个倡议的反应，但这种地区合作的想象就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旨在强调更为广泛的连通性，即推动人员、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并清除监管障碍。客观而言，这一地区连通战略推动了欧盟同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协调，同时提升了自身在中亚的存在。

欧盟的中亚“连通战略”并不旨在推动中亚同欧盟直接互联互通。欧盟认为苏联时代的中亚尽管有统一的政治（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垂直官僚体系）、社会（普惠的教育医疗体系）与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但这种连通性只存在于后苏联空间地区，致使中亚与外界相对隔绝，甚至中亚各国之间的联系也并不紧密，还矛盾重重。<sup>②</sup>例如横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跨境冲突和恐怖主义频繁出现。欧盟距离中亚较远，无法直接向中亚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同中亚国家的机制性联系主要还是经济

---

① Enrico D'Ambrogio, "Prospects for EU-Asia connectivity: The 'European way to connectivity'", *Briefing*, October 2018, p.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28265/EPRS\\_BRI\(2018\)628265\\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28265/EPRS_BRI(2018)628265_EN.pdf)

② Sinikukka Saari, "Connecting the Dots: Challenges to EU Connectivity in Central Asia", *Brief*, June 2019, p.2,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Brief%206%20Central%20Asia\\_0.pdf](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Brief%206%20Central%20Asia_0.pdf)

方面的援助，提升能源、公民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治理，推动地区稳步合作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欧盟深切意识到在互联互通领域很难同俄罗斯和中国直接竞争。欧盟迫切期待通过新版中亚战略，推动中亚各国减少同莫斯科和北京的直接联系，用自身的一体化经验引导中亚各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欧盟的新战略从一种更为谨慎的国家建设逐渐转向支持中亚各国的公民社会、人权提升以及民主建设，希冀带来稳定、安全和繁荣。<sup>①</sup>

欧盟的这种努力在短期内很难有成效。欧盟在中亚地区一直支持制度、法律与行政体系改革，推动各国市场化和民主转型。中亚继承了苏联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遗产，对体制安全更为敏感。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依然是俄罗斯汇款的主要接收国；中亚对俄罗斯持续的劳务输出，解决了地区剩余劳动力的生计问题，并拉动着经济增长。<sup>②</sup>这种劳务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中亚多国不仅在改革上更为审慎，也在外交上形成了对俄罗斯的非对称依赖。相比之下，大多数中亚精英对欧盟持相同的看法，即有着复杂的官僚程序，却在中亚几无存在感，雄心远大于实际影响。<sup>③</sup>欧盟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就凸显了这一特性。欧盟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投资伙伴，贡献了40%的出口份额和外国直接投资的48%。截至2020年，哈萨克斯坦境内有4000多家欧盟国家投资企业和2000多家合资企业，欧盟在哈实施投资项目17个，总投资额6.41亿美元；在谈投资项目37个，总额88亿美元。<sup>④</sup>2020年3月，欧盟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扩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生效。但欧盟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地缘位置及能源合作带来的丰厚收益所导致的结果。这与俄哈经济一体化进程无法相比。尽管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存在不如西方，

---

① Nicklas Norling, Svante Cornell,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Democracy-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Strömsbor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16, p.11.

② 纪祥、郭晓琼：“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123-126页。

③ Murat Laumulin, "The EU's Incomplete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December 3, 2019,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80470>

④ “哈萨克斯坦-欧盟合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2020年9月28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9/20200903004770.shtml>

但毫无疑问，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最紧密的欧亚一体化合作伙伴，两国的经济互动也在密切加强。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推动哈萨克斯坦倾向于做出俄罗斯所希望的支持行动。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失去了乌克兰的支持，很快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也因本国形势有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这使得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愈加重要。俄哈合作也给哈萨克斯坦的平衡外交带来更多的筹码，有利于减轻哈战略和军事成本，缓解西方意识形态传导和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压力。<sup>①</sup>这些因素自然导致欧盟无法深入到中亚政治和安全领域，单凭经济支持的战略影响力有限。

因此，在新中亚战略的地缘政治想象中，欧盟期待通过不断“涓滴”中亚地区惠及中亚各国，再影响中亚整体的西方转向。这种思路在短期内成本较高，但从长期来看极具战略优势。欧盟的新中亚战略并没有否定之前的政策思路。欧盟对中亚的政策目标虽然在优先排序上存在差别，但基本集中在民主和人权，法制与善治，以及推动能源合作三个方面。<sup>②</sup>与美国关注大欧亚地区安全和外交不同，欧盟对中亚的新战略偏重于善治，旨在影响当地政府和社会。尽管欧盟缺乏合适的机制和外交杠杆推动善治与民主，但中亚各国并不反对同欧盟合作，甚至在政府改革上做出相应让步。<sup>③</sup>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默许欧盟在本国的地方治理，这也有助于巩固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中亚各国领袖也认识到了民主价值对于增强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性，愿意将“民主”视为本国国家建设工程的政治价值，推动“民主”政治与当地的政治规范相结合，成功缓解了西方民主化实践的“冲击力”，培育出新的治理文化。<sup>④</sup>欧盟也逐渐看到，仅靠传播民主价值观并不能推动中亚实现稳定，有可能还是一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

---

① 具体内容参见 Marlene Laruelle, Dylan Royce, Serik Beyssembayev, “Untangling the puzzle of ‘Russia’s influence’ in Kazakhsta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9, Vol.60, No.2, pp.1-30.

② 赵会荣：“欧盟的中亚政策”，《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6期，第59-67页；徐刚：“欧盟中亚政策的演变、特征与趋向”，《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2期，第17-28页；吴宏伟：“俄美欧中亚政策及其演变”，《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第45-51页。

③ Katharina Hoffmann, “The EU in Central Asia: successful good governance promo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0, Vol.31, No.1, pp.88-90.

④ 孙超：“国家构建、民主化回应与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3期，第45-49页。

“毒药”。吉尔吉斯斯坦迅速进行民主化并没有实现稳定和繁荣，反而带来更多的矛盾，加速政治精英的分裂，致使政局动荡不稳。<sup>①</sup>西方的“民主”可能带来坏名声，因此欧盟新中亚战略将“民主”解读为过上充满机遇的安定生活的先决条件，是提升当地法制和善治的过程。<sup>②</sup>欧盟帮助中亚各国的行政部门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管理效率，推动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借此在中亚地区治理上获取更大的话语权。<sup>③</sup>

此外，欧盟还发挥作为地区组织的政治优势，推动中亚同欧盟的互联互通，以改变中亚各国对欧盟治理仅靠“规范性要求和条件性约束”的刻板印象。2005年12月，欧盟发布《欧洲发展共识》，调整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利用一些优势议题介入中亚地区内部事务。<sup>④</sup>例如在水治理领域，欧盟掌握并利用水治理规则推动中亚合作，凭借“欧盟-中亚水环境”对话框架，在中亚地区的跨国界流域大力推动水一体化管理政策，一跃成为中亚地区水治理的核心倡导者。<sup>⑤</sup>2012年，欧盟《关于中亚的理事会议决》强调在水资源领域同中亚国家合作。欧洲投资银行同塔吉克斯坦签署协议，拨款6000万美元支持塔改建卡拉库姆水电站以及修建苏尔霍布河上的小型电站；哈萨克斯坦的水资源管理项目获得710万欧元资金的支持；乌兹别克斯坦获得1200万欧元用于改善水状况和提高水力资源管理效率。在环保领域，欧盟积极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环境治理，通过行政放权和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地区共同体、私人部门），增强对森林、牧场、空气和水体的保护。<sup>⑥</sup>此外，欧盟支持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中

---

① 孙超：“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2-137页。

② Jos Boonstra(ed.), “A New EU-Central Asia Strategy: Deepening relationships and generating long-lasting Impact”, EUCAM (the Europe-Central Asia Monitoring) Working Paper, 2018, No.20, p.11, <https://eucentralasia.eu/download/2880/>

③ Fabienne Bossuyt, “The EU’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wards Central Asia: low versus contested impact”,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9, No.5-6, pp.5-10.

④ 贾文华：“欧盟官方发展援助变革的实证考察”，《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第66页。

⑤ 参见李志斐：“欧盟对中亚地区水治理的介入性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3-124页。

⑥ 参见 Particip, “Evaluation of EU regional-level support to Central Asia (2007-2014)”, September 2016, Vol.2, Final Report.

亚各国贸易壁垒，推动各国跨境合作，在发展合作过程中渗透西方规范和价值观。

欧盟除了在中亚地区不断累积优势之外，还突出强调针对中亚的连通性战略。2019 年的新版战略要求以“可持续、综合性和规则为基础”的欧洲连通方式，推动欧盟同中亚关系的进一步深入。<sup>①</sup>配合中亚各国的需求，欧盟在“连通性”上狠下功夫。欧盟的连通目标以欧洲一体化为参照：一方面消除人员、货物和服务自由流通的障碍；另一方面，减少非物理（规范）障碍，在广泛领域推动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和单一市场。<sup>②</sup>2014 年到 2020 年，欧盟分配 11 亿欧元用于中亚发展合作项目，此外，还计划从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发展银行贷款 113 亿欧元用于中亚减贫、教育、能源建设和企业家培育，推动中亚高等教育和互联网建设，增加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提高边境管理的效率，推动各国减免关税等。<sup>③</sup>2020 年 7 月，欧盟启动了《中亚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CACCR）援助计划，预算资金为 300 万欧元，由世界卫生组织实施。该计划旨在为中亚提供急需的基本药物和设备，支持中亚各国的医院和实验室建设，使其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欧盟化学、生物、放射、核风险缓解卓越中心倡议（EU CBRN CoE）通过欧盟资助的项目（Project 53），加强中亚国家生物安全和相关方面的法律框架，拨款 200 多万欧元，用于建设中亚、东南亚和东欧抗击冠状病毒的能力。<sup>④</sup>在欧盟内部面临极大防控压力的情况下，由欧盟中亚特别代表组建的欧盟-中亚伙伴关系对话线上经济繁荣论坛于 2020 年年底召开，为 2021 年第一届“欧洲-中亚经济论坛”的召开做准备。在会上，欧委会副主席马洛什·谢夫卓维奇（Maroš Šefčovič）强调欧盟不会更改现有的战略，将继续加速绿色和数字化的双重转变，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同时欧盟表达了向中亚各国分享

---

① Nargis Kassenova, “Central Asia and the EU Connectivity Strategy: Rising to the Good Governance Challenge”, *Ponars Eurasia*, 2019, Policy Memo No.617, p.2.

② Martin Russell, “Connectivity in Central Asia: Reconnecting the Silk Road”,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019, p.1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7891/EPRS\\_BRI\(2019\)637891\\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7891/EPRS_BRI(2019)637891_EN.pdf)

③ Ibid, pp.11-12.

④ “Work of EU CBRN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Central Asia in the time of COVID-19”, July 10, 2020, pp.2-4, [https://europa.eu/cbrn-risk-mitigation/news-0/central-asia-regional-secretariat-activities-time-covid-19-2020-08-13\\_en](https://europa.eu/cbrn-risk-mitigation/news-0/central-asia-regional-secretariat-activities-time-covid-19-2020-08-13_en)

经验、新技术和解决方案的意愿。<sup>①</sup>

欧盟新中亚战略虽然没有明显提到“一带一路”倡议，但这一连通战略显然考虑到了中国在中亚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国已经在中亚投资了约 225 亿欧元，而欧盟的援助只有 10 亿欧元。<sup>②</sup>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六大投资来源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债权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对象，其中乌兹别克斯坦获得中国官方发展援助占中国对中亚全部援助的一半以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合计约占中国对中亚地区官方发展援助的 40%。<sup>③</sup>

欧盟虽出台中亚新战略推动同中亚的互联互通，但只强调在空中交通安全方面加强同中国的双边合作。<sup>④</sup>欧盟同中国在 2015 年就已联合研究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确认了优先发展领域和急需解决的瓶颈问题，但围绕中欧交通基础设施过境地区的联合研究没有大规模开展起来。<sup>⑤</sup>欧盟将连通作为其新战略的核心概念，可以看作是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的差异化竞争，目标在于获得中亚精英的关注并制衡中国在中亚不断提升的影响力。随着 2020 年底俄罗斯经由波罗的海向欧洲直接出口天然气的北溪-2 号管道铺设接近完成，连接中亚到欧洲的跨里海管道（Trans-Caspian Pipeliem, TCP）建设的迫切性下降。欧盟对中亚的支持更多地放在政府善治和公民社会层面，且对其长期在中亚地区经略的社会团体和商界合作颇为自信，欲通过新战略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展示其作为良好的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当前，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颓势和因防控薄弱造成的合法性流失，

---

① “Central Asia: Online Economic Forum ‘EU-Central Asia Dialogue on Partnership for Prosperity’”, December 7, 2020, Brussels,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

② Mridvika Sahajpal, Steven Blockmans, “The New EU Strategy on Central Asia: Collateral Benefit?” June 21, 2019, <https://www.ceps.eu/the-new-eu-strategy-on-central-asia/>

③ 冯玉军：“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现状与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6 期，第 150-151 页。

④ 王术森、曾向红：“大国中亚地区外交新常态”，《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0 期，第 50 页。

⑤ Nargis Kassenova, “Central Asia and the EU Connectivity Strategy: Rising to the Good Governance Challenge”, p.3.

中亚国家对欧盟连通战略的态度颇为矛盾。<sup>①</sup>一方面各国迫切希望得到欧盟的各项支持，但同时也担心欧盟在中亚地区的渗透会影响体制安全，追随欧盟的规范就意味着以更严格的标准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行政体系以及社会治理方式，这些方面一旦实施，无疑将主动权交给了欧盟。

### 三、欧盟与上合组织：中亚治理的合作困境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开放型地区合作组织，发挥着安全信任机制构建和经济合作的功能，不仅提升了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一体化方面的影响力，更是展示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以“上海精神”和“新安全观”为组织运行的指导理念和安全生产实践的思想基础，“亚洲安全观”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在“新安全观”基础之上提出的新的指导组织运行的理念。<sup>②</sup>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合作组织在成员国相互信任和包容互鉴基础之上实现互利互惠，并成功进行了组织扩员，提升了上合组织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力。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在不干涉内政基础之上推动组建超国家组织以增强地区经济能力的尝试，其最大的特征是否定政治和军事联盟，否定将西式民主强加于人。<sup>③</sup>欧盟与上合组织有较大的不同，其地缘政治零和博弈思维、一体化建设的优越感以及价值规范优先考量，诸如此类的理念，造成其难以同中亚国家密切协作，更难同上合组织达成合作共识。

#### （一）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阻碍了组织间的信任与合作

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地区组织存在的目标是为了制衡强大力量。上海合作组织从上海五国发展而来，其发展壮大有效地巩固了以中、俄地区大国为核心建构地区秩序的权威，对西方势力介入的合法性予以否定。在这

---

① Nargis Kassenova, “Central Asia and the EU Connectivity Strategy: Rising to the Good Governance Challenge”, p.5.

② 曾向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现状评估与努力方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33页。

③ Tatyana Kolpakoval, Tatiana Kuchinskaya, “China’s ‘New Regionalism’ as a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An Example of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15, No.5 (Special Issue), pp.109-110.



种背景下，上合组织很容易就会成为西方假想出来的“地区大国利用国际机制削弱霸权国介入地区秩序的有效工具”<sup>①</sup>。因此，西方对上合组织的判断难免会回到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这也影响到了欧盟对上合组织的认知。

“9·11事件”后，美国势力渗透到中亚地区，美国对中亚地区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盟对上合组织的判断，即，它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潜在威胁。美国学者大多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中俄在中亚地区制衡美国的力量。<sup>②</sup>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第五次元首峰会召开，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强调“和平与发展是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保证，反对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和以人权为由干涉他国内政。”<sup>③</sup>这个宣言“要求”美国在中亚的军事部署只是“临时性”的存在，美国迟早应从中亚地区撤军。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宣言的“厌弃”左右着欧盟对该组织的判断，其也开始强调上合组织离欧盟规范和传统相距甚远，“不干涉内政”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视”西方所重视的人权和民主价值。<sup>④</sup>正是2005年的这一宣言让美欧感受到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分量，并认为上合组织甚至可能成为西方在中亚战略存在的“威胁”。<sup>⑤</sup>

随着欧盟对中亚事务持续性地积极介入和中亚战略的调整，欧盟逐渐认识到上合组织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成员国互信与合作的重要作用。欧盟开始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中亚各国联合应对安全和经济挑战的地区国际组织。<sup>⑥</sup>2007年，欧盟发布针对中亚的战略文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地

---

① [加拿大]T.V. 保罗：《软制衡：从帝国到全球化时代》，刘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32页。

② Stephen Ari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ackling the Three Evils’, A Regional Response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or an anti-Western Bloc”,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3, p.458.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全文)》，2005年6月8日，<http://www.cctv.com/special/581/3/31296.html>

④ Alyson J.K. Bailes, Pál Dunay,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 a Reg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 in Alyson J.K. Bailes, Pál Dunay, Pan Guang and Mikhail Troitskiy (ed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ay 2007, Policy Paper No.17,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p.1-20.

⑤ Oksana Antonenko, “The EU should not ignor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olicy Brief*, p.6.

⑥ “Central Asia Strategy Paper 2002-2006 & Indicative Programme 2002-2004”, October 2002, pp.4, 55, [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entral\\_asia/rsp/02\\_06\\_en.pdf](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entral_asia/rsp/02_06_en.pdf)

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但在这一组织下依然有很多问题，“成员国之间缺乏协调”且各国之间存在大量的争议。<sup>①</sup>这一时期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对上合组织持有轻视、否定的态度，上合组织被污名化为反西方联盟，而且反对在中亚进行民主改革。<sup>②</sup>在这个所谓东方版“北约”中，成员国从联合军事演习发展成为成熟的安全组织，再通过军备控制和反恐日程影响全球更深远的安全议题。<sup>③</sup>

在 2019 年新版的欧盟中亚战略出台以后，欧盟更深地介入中亚事务之中，对上合组织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意识到接触上合组织的重要性。欧盟更关注的是阿富汗的安全，认为同上合组织直接联系既可以帮助阿富汗训练警察、实现法治，又能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区安全建设。<sup>④</sup>上合组织在打击跨境贩毒犯罪、打击非法交易、边境管理、反恐和防极端主义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sup>⑤</sup>中亚成员国同时也是独联体成员，在上合内的合作，也推动了欧亚地区一体化。在欧盟看来，这些因素都为双方组织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虽然欧盟强调不应该忽视上海合作组织，但在新版中亚战略文件中，欧盟并没有明确提到同上合组织进行合作。由于欧盟缺乏地区合作的双赢思维，导致欧盟尽管在地区治理层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阻碍着地区多边信任机制的构建。

## （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高标准束缚了地区合作的灵活性

2003 年，《欧盟安全战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首次提出有效多边主义（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概念，将建立在有效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明确为欧盟三项战略目标之一。<sup>⑥</sup>由于 21 世纪初欧洲一体化高歌猛进，欧盟结合自身实力特性，不仅倡导一体化建设的欧洲方式，而且推动国

---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0 February 2008 on an EU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07/2102(INI),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reference=P6-TA-2008-0059&type=TA&language=EN&redirect>

② 邵育群：“欧盟新中亚政策评述”，《欧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71 页。

③ Marcel de Haas, “Time for the EU and NATO to Engage with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Europe's world*, 2008, No.10, pp.43-44.

④ Ibid, p.45.

⑤ Pol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spects of EU-Central Asian Relations: Security challenges in Central Asia’”, Almaty, 2014, pp.10-11, [http://iep-berlin.de/wp-content/uploads/2014/10/Paper\\_Yakovleva.pdf](http://iep-berlin.de/wp-content/uploads/2014/10/Paper_Yakovleva.pdf)

⑥ 金玲：《欧盟对外政策转型：务实应对挑战》，第 94 页。

际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欧盟常鼓励各国合作，以制度和规范的方式推动地区治理的提升，并实现各国同欧盟价值观的趋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并没有立即获得欧洲的关注，反而被认为是口号性的官僚组织。上合组织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机制不同于欧盟的地区合作方式，甚至有西方学者质疑其生命力。<sup>①</sup>欧盟通过简单强调非西方组织的成员国不是符合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国家，就认定这些地区组织无法承担起地区治理和一体化的责任，只是“威权国家”模仿民主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优势的重要工具。<sup>②</sup>实际情况是，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非西方地区组织不仅巩固了经济合作纽带，甚至挑战了以WTO和IMF为主的国际组织对全球秩序的塑造，干预了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扩展。<sup>③</sup>自由规则被视为一种妨害，这些国际组织挑战全球秩序，并提供新的合法性，改变了贸易流向。上合组织不是欧盟推动的有效多边主义的结果，被西方的自由规则看成是“无效的”：一是上海合作组织不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合作组织，二是上合组织很难和平有效解决中亚各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sup>④</sup>甚至有学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规则和价值观与欧盟不相容，欧盟与上合组织一体化路径存在对立，这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非自由政体造成的。<sup>⑤</sup>而欧洲是一种“规范力量”，将同美国自由主义一道维持西方主导全球秩序的合法性，这将使得崛起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无所作为。<sup>⑥</sup>

这种错误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欧盟在中亚地区开展多边合作。不同

---

① Stephen Ari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ackling the Three Evils’, A Regional Response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or an anti-Western Bloc”, pp.458-459.

② Alexander Cooley,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Countering Democratic Norm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5, Vol.26, No.3, pp.49-63.

③ Alexander Libman, Anastassia Obydenkova, “Global governance and Eurasi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lessons learned and future agend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20, Vol.32, No.6, pp.1-2.

④ Thomas Renard, “Strategic Prudenc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Noreen Hameed (edited), *SCO's Role in Regional Stability: Prospects of its Expansion*, Islamaba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Islamabad, pp.46-47.

⑤ E.J. Kirchner, R. Dominguez (edited),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2011, Abingdon: Routledge, p.251.

⑥ [美]乔利恩·豪沃思：“作为全球行为体的欧盟：争取全球大协议的大战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24-25页。

的利益主体在国际制度中的获益是不对等的，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的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sup>①</sup>。欧盟在中亚推动地区治理并没有同当地最大的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其本质是自身一体化建设带来的优越感。欧盟精英们如此热衷于追求地区治理的欧洲规范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其目标在于推动中亚各国形成对欧盟的热盼，构建同质化的地区秩序。这种自信源于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主义者几乎彻底地控制了关于欧洲经济发展和安全的讨论，以至于欧盟和北约的扩张在西方几乎没有遭到现实主义者或任何人的反对，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也主导了欧洲在中亚的治理模式。<sup>②</sup>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全球介入能力下降，欧洲承担的地区安全责任却在增加，确保二战以来的自由国际秩序仍是欧洲的一项核心利益。<sup>③</sup>很快，欧盟安全研究所发布了新的理念，强调已经出现了“互赖多极世界”（Interpolar world）：以利益为基础，仰赖主要国际行为体利益趋同；问题驱动，针对需要合作的议题应对挑战；过程导向，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面对挑战，多边体系与相互依赖是可以调和的。<sup>④</sup>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欧盟在 2016 年 6 月出台全球战略，在有原则的务实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提出加强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强调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在相互依赖中共塑全球规则，强调利益导向，把利益和价值观的平衡作为界定对外战略优先的核心问题，不能空谈价值观的重要性，少提人权和善治是欧洲特有的价值观。<sup>⑤</sup>

在确定中亚为欧盟周边地区后，欧盟不再强调推动中亚各国的民主化议程，而是提升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动人权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同时发展灵活多样的伙伴关系。欧盟意识到，若要扩大影响力，需同“核心伙伴、志同

---

①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 年第 2 期，第 97-105 页。

②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40-241 页。

③ 陈志敏、吉磊：“欧洲的国际秩序观：‘有效的多边主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 年第 1 期，第 112 页。

④ 同上。

⑤ Richard Youngs, “Towards an EU Global Strategy-Consulting the Experts”, April 2016, EUISS, pp.12-14. 转引自杨海峰：“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欧洲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34 页。

道合的国家与地区集团合作”，并选择性地与那些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应对共同挑战的行为体开展合作。<sup>①</sup>尽管欧盟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中亚战略，但针对中亚的政策惯性以及对上海合作组织长期形成的错误认知一直束缚着欧盟同上合组织的合作。2019年，欧盟新版中亚战略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同上合组织的合作，但强调了这份战略主张“非排他性”的合作，针对的对象就是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 （三）西方规范推广渗透难以同上合组织产生交集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深刻演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但国际社会依然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问题。上合组织周边出现了国际冲突（如阿富汗政权更迭、乌克兰危机仍未解决、纳卡冲突等），甚至上合组织内部一些成员国之间也存在领土争端和政局不稳。总体来看，上合组织所涵盖区域可以被视为欧亚地区的“稳定之岛”。<sup>②</sup>但这种稳定局面的形成并不是西方集团推进民主的结果，而是中亚国家权力精英在国家建设方案上的共识，即政权稳定的“三元逻辑”：政治民族构建、军政权力集中以及选举型文化的塑造。<sup>③</sup>上合组织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坚定支持有关国家依法平稳推进国内政治议程，坚定支持各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sup>④</sup>上合组织充分尊重各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道路，支持不同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团结互信，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彼此间分歧，增进了各国互信互助，同时形成了新型区域合作的模式，推动构建安全共同体以应对各类风险和威胁。

与上合组织相比，欧盟对中亚政治事务的干预较为直接。欧盟对中亚各国的民主推进源自对后苏联新独立国家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迷思。根据瑞典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的总结，中亚国家若要建成民主政体，需要有效回应六大独特挑战：地区各国的经济体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不利于经济

---

① 杨海峰：“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第39页。

② 曾向红、陈亚洲：“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第104-105页。

③ 孙超：“国家构建、民主化回应与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第29页。

④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11月10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62935.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62935.htm)

改革和市场化；受苏联时代影响，公民社会极其脆弱；政党政治缺少制度化，政党精英对民主化不感兴趣；苏联政治文化根深蒂固，难以祛除；缺少积极支持民主化的宗教力量；民主建设面临威权主义势力的内外挑战。<sup>①</sup>欧洲委员会强调，只要中亚各国承诺进行改革，增进民主自由，法治、司法独立和推动经济现代化，双边关系就可以推进。<sup>②</sup>欧盟认可美国的看法，即支持民主被视为推动威权政体转型的唯一办法，通过引导中亚各国的民主建设以获得对该地区的介入。<sup>③</sup>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盟同哈、乌、吉、土谈判签署的双边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主要集中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对民主、人权和善治的关注较少。这一时期欧盟一直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9·11 事件”之后，欧盟逐渐将重点转向民主和人权，很快形成了《2002-2006 年中亚战略及 2002-2004 年中亚指导计划》，从塔西斯计划（TACIS）中抽取三年期共计 15 亿欧元实施该战略，旨在改善民主进程和尊重人权。<sup>④</sup>与此同时，西方非政府组织涌入中亚地区，到 2005 年 8 月，总共有 2914 家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注册，其中在哈萨克斯坦有 699 家，吉尔吉斯斯坦有 1010 家，塔吉克斯坦有 595 家，土库曼斯坦有 138 家，乌兹别克斯坦有 472 家。<sup>⑤</sup>欧盟将民主和人权建设看作“确保地区长期稳定的主要方式”，因而欧盟同中亚各国的合作旨在形成民主和人权原则。随着后苏联空间地区“颜色革命”的出现以及欧盟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的恶化，欧盟迫切需要增加在中亚的战略存在。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欧盟要求成立独立的国际调查小组并制裁乌兹别克斯坦，但很快因为能源供应危机又彻底解除了对乌的所有

---

① Nicklas Norling, Svante Cornell,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Democracy-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16, pp.8-9.

②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EU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p.2.

③ Mariya Y. Omelicheva, *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 p.37.

④ 塔西斯计划（TACIS）指的是 1991 年欧盟针对后苏联空间 12 国（波罗的海三国除外）的技术援助计划，以此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政治经济转型。至 2001 年，TACIS 对中亚援助 36.63 亿欧元；2007 年后，欧盟使用地域性的发展援助工具（DCI）取而代之。

⑤ 闫文虎：“对冷战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苏联东欧地区活动的历史考察——从非政府组织角度兼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原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74 页。

制裁，并于 2011 年在塔什干设立了代表团。<sup>①</sup>

欧盟在价值方面的妥协，遭到欧盟民主人士的广泛批评。欧盟的这种妥协也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能源供应方面欧盟依然面临多个障碍，致使其政策再度回调。“安集延事件”后，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阿斯塔纳举行。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重要文件，强调“在矛盾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非对抗思维和不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在中亚地区“营造持久友好、相互理解、协作和建设性的氛围”。<sup>②</sup>在敏感时期，上合组织的发声不仅赢得了中亚成员国的好感，也进一步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为推动中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欧盟的经济制裁不仅没有提升自身对乌兹别克斯坦人权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反而收获了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系改善的意外后果。<sup>③</sup>欧盟 2007 版的中亚战略把 2007-2013 年度财政预算增加了 75 亿欧元。该战略将善治作为优先领域，并将民主建设、人权保护和自由作为推动中亚威权体制转型为自由民主制的主要手段。<sup>④</sup>欧盟同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立基于三个支柱：政治对话、贸易与经济关系以及细分领域的合作，这些支柱建立在“尊重人权、民主、法治，各国调整法律框架以契合欧盟要求”的基础之上。<sup>⑤</sup>欧盟发现，针对中亚的渐进援助和规范传播并不能提升自身影响力，因而迫切期待利用欧盟规范和制度塑造加速对中亚的政治渗透。欧盟对中亚地区的活动更加积极。欧洲民主和人权倡议（1994-2006 年）很快被欧洲民主和人权项目（EIDHR）和非国家行为体与地方政府发展项目（NSA/LA）取代。这些项目年度预算 14 亿欧元，旨在关注公民社会组织，尤其是支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而乌兹别克斯坦公民

---

① Andrea Schmitz, “Whose Conditionality? The Failure of EU Sanctions on Uzbekistan”, November 2009,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1944-analytical-articles-caci-analyst-2009-11-11-art-11944.html>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全文）》，2005 年 7 月 5 日，阿斯塔纳，[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4324.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4324.htm)

③ Andrea Schmitz, “Whose Conditionality? The Failure of EU Sanctions on Uzbekistan”.

④ European Community, *Regional Strategy Paper for Assistance to Central Asia for the period 2007-2013*,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p.8.

⑤ Ibid, p.3.

社会持续受益于机构建设伙伴计划（IBPP）。<sup>①</sup>这些项目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善治，推动中亚各国政治经济转型，提供人员培训和制度建设支持。<sup>②</sup>欧盟相信，非政府组织不仅能够实现同政府合作无法完成的目标，还能够获得更多更详尽的信息（情报）。这些非政府组织依照西方价值改变中亚社会，培育公民社会和各方面关系，积极赢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些欧盟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已经介入到敏感项目当中，如反对毒品、技术培训、难民安置等。

表 1 欧盟在中亚的民主支持行动（2008–2011 年，欧元）

	EIDHR（欧洲民主和人权项目）	NSL/LA（非国家行为体与地方政府发展项目）	IBPP（机构建设伙伴计划）
哈萨克斯坦	240 万	230 万	不积极
吉尔吉斯斯坦	270 万	195 万	不积极
塔吉克斯坦	180 万	185 万	不积极
土库曼斯坦	不积极	不积极	不积极
乌兹别克斯坦	不积极	不积极	220 万

资料来源：Vera Axyonova, “EU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sation Assistance to Central Asia: In Need of Further Reform”, p.2.

欧盟在完整版中亚战略出台后，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作为工具，推动对中亚的援助从单一性、应急性的援助，发展成为复合型长期援助，并渗透到中亚各国的地区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很难同上海组织就中亚地区问题进行合作治理。欧盟对自身权力投射颇为自信，将“民主建设和人权改善”作为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2007–2013 年，欧盟对中亚分配了 6.75 亿欧元；2014–2020 年，欧盟批准通过地域性的发展援助工具，拟拨付 10 亿欧元用于中亚国家加强安全、发展民主和法治。<sup>③</sup>哈萨克斯坦因为已成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不再享有双边基金，只能获得地区或专项基金，而土库曼斯坦也可能因同样原因不再享受双边基金。<sup>④</sup>

① Vera Axyonova, “EU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sation Assistance to Central Asia: In Need of Further Reform”, *EUCAM*, January 2012, p.1.

② 李立凡：“‘颜色革命’后西方非政府组织在独联体国家的发展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58 页。

③ “2014–2020 期间欧盟将拨付 10 亿欧元用于中亚国家发展”，驻哈萨克斯坦经商参处，2013 年 11 月 25 日，<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1/20131100401839.shtml>

④ 徐刚：“欧盟中亚政策的演变、特征与趋向”，第 20–22 页。



尽管援助在不断增长，但中亚国家更愿意同欧洲各国而非欧盟建立起官方联系。各国对欧盟公共外交和援助的意见并不统一，尤其反感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规范的传播。哈萨克斯坦与欧盟关系较为紧密，2015 年还签署了《扩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欧盟一直将哈视为最有潜力的“学生”，是“地区稳定之锚”。<sup>①</sup>但正如纳扎尔巴耶夫对英国记者所说，“我们很感谢你的建议，但没有人有权指导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sup>②</sup>。纳扎尔巴耶夫努力维持国家稳定，强调欧盟虽然是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但是哈萨克斯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吉尔吉斯斯坦对欧盟也有期待，但“颜色革命”造成的政局不稳使其对欧盟的期待更多集中于外交层面。土库曼斯坦尤其不喜欢欧盟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乌兹别克斯坦由于“安集延事件”对欧盟甚是怀疑。塔吉克斯坦对欧盟也存在“抵触”情绪。中亚民众对欧盟的亲近感并不深，加上“颜色革命”造成的乱局，致使中亚权力精英对欧盟的“民主建设和人权”颇不支持。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西方规范，不仅遭到中亚各国的反感，也不符合其战略利益。<sup>③</sup>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竞相向中亚提供支持和援助，中亚在选择合作对象与合作模式上有更大的自由度，欧盟若要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需要加大投入并更为务实。从欧盟的总体战略来看，由于欧洲一体化面临挑战，加上新冠疫情的到来，欧盟很难加大投入。相比之下，上合组织更契合中亚各国对安全 and 发展的需求，也更有利于中亚各国的体制安全和经济繁荣。上合组织以开放的地区多边主义思路，从“上海精神”出发，使中亚各国无须在经济合作中担忧政治安全问题，从而推动中亚各国更愿意同成员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安全、经济双轮驱动带动各个领域的合作深入开展。自 2001 年创建以来，上合组织发展迅速，赢得了中亚各国的信任，在共同体构建上卓有成效，这是附加政治条件的西方势力难以达到的效果。

---

① Andrew Kuchins, Jeffrey Mankoff, Aitolkyn Kourmanova and Oliver Backes, “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Kazakhstan’s evolving foreig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2015, Washington: CSIS, p.21.

② Igor Savchenko, “Kazakhstan Rejects Statements of the UN, EU and OSCE on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Open Dialog Foundation, November 30, 2015.

③ 潘兴明：“价值观外交与利益外交的叠加——欧盟中亚战略评析”，《欧洲研究》，2013 年第 5 期，第 92 页。

#### 四、走向共识的未来：上合组织与欧盟的合作前景

欧盟 2019 年版的中亚战略罕见地强调了上合组织。在肯定欧盟同中亚在安全领域是长期合作伙伴的同时，新战略强调欧盟的利益在于持续“监督”地区安全结构——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发展。<sup>①</sup>这种错误认知一直影响欧盟同上合组织在各方面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上合组织成立 20 年的历程中，西方世界形成了“污名化”上合组织的思维定式，尤其是美国，一直将上合组织看作其介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障碍，甚至认为是“威权国家”抱团取暖的亚洲版华约。<sup>②</sup>新版欧盟中亚战略以促进中亚政权的韧性（resilience）和繁荣作为战略支撑，通过推动在各领域的交流来提升区域合作水平。<sup>③</sup>欧盟开始认识到“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不能直接向中亚各国推销，通过市民社会的塑造和非政府组织的引领也会带来问题。

与欧盟不同，上海合作组织突破了地区合作的现有模式。上合组织的工作方式既不同于美国倡导的“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也不同于法德主导的欧洲一体化版本，更不是东盟地区小国协商一致推动组织制度化进程的范式。<sup>④</sup>上海合作组织强调求同存异，强调理念先行和务实合作。通过明确上合组织在组织发展模式、具体领域的合作水平以及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培育等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体认同，塑造紧密的共同体意识，逐渐推动地区合作良性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宣称不与任何国际组织和国家为敌。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要共同维护国家体制安全，共同抵御“颜色革命”的侵袭。<sup>⑤</sup>上合组织将维护地区稳定视为最重要的功能，对地区动

---

①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and Central Asia: New Opportunities for a stronger Partnership”, Brussels, May 15, 2019, p.6.

② Graeme P. Herd, “The Future of the SCO: An Axis of Inconvenience?” 2014, pp.3-5, <http://www.risingpowersglobalresponses.com/wp-content/uploads/2014/02/HerdPaper.pdf>

③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and Central Asia: New Opportunities for a stronger Partnership”.

④ 曾向红、陈亚洲：“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第 108 页。

⑤ T. Ambrosio, “Catching the Shanghai Spirit: how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motes Authoritarian Norms in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8, pp. 1321-1344.

荡的处理不是干涉成员国的内政，而是在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前提之下的建设性介入。<sup>①</sup>除在安全上有突出特色外，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也在逐渐加强。经济合作掺杂了复杂的国际因素和地缘经济政治因素，有一段时间变得较为困难。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两个重要倡议的提出，上海合作组织面临新的机遇。两者的开展和对接最终落实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另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得上海合作组织发生新的变化，上合组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积极吸纳观察员国的加入可使成员国的集体身份得以重塑。<sup>②</sup>

上海合作组织不断进行自我革新，拥有相当多的资源，成员国之间具有合作潜力。这些合作潜力在新冠疫情到来时得到了有效发挥。2020年3月20日，中国首批捐赠哈萨克斯坦的医疗物资完成移交，包括20万双医用手套、15934只医用口罩和425个护目镜，价值52.5万人民币。<sup>③</sup>2020年7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上表示，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新一批抗疫物资援助，包括300台呼吸机、200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50万只KN95口罩以及一批试剂和防护服等，中方计划为中亚国家培训一批医疗卫生专家，拓展跨境电子商务规模，加强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卫星导航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sup>④</sup>同时中方还努力保障“一带一路”各项工程顺利推进，主要是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中欧班列等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前还应中亚四国请求派出抗疫经验丰富的医疗队。中国向中亚各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为中亚地区抗疫提供了实质性支持。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上海

---

①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40页。

②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9-80页。

③ “中国首批捐赠哈萨克斯坦的医疗物资完成移交”，2020年3月21日，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321/c1002-31642538.html>

④ “携手应对挑战 共谋发展繁荣——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2007/20200702983790.shtml>

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通过抗疫合作，维护安全稳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实践探索。<sup>①</sup>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五点建议：共走团结合作之路、安危共担之路、开放融通之路、互学互鉴之路和公平正义之路，在“上合组织大家庭”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②</sup>

从发展趋势来看，两大组织在中亚地区治理上的交集会越来越多。事实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推动着两个组织的战略接近。特朗普上任以后，其激进的执政理念和对外政策令欧洲对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感到忧虑。作为美国重要的盟友，欧洲陷入了“顺从美国减损利益”和“对美施压减损西方优势”的矛盾之中，两者关系不断出现一些紧张。<sup>③</sup>欧盟对加入美国对华遏制的“印太战略”颇为犹豫，但同时也担心中国“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种矛盾困境导致欧盟新中亚战略举棋不定。一方面，欧盟希望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探索新的互联互通方案，从而推动欧盟和亚洲的对接。另一方面，又担心与上海合作组织接触会减损美国在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引起美国的怀疑和不安。欧盟国家更加信任多边主义，强调通过规范传播和制度推进，以及全球治理的方式，实现各方面的合作共赢。<sup>④</sup>

21 世纪初，欧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扩展，几次东扩推动了欧洲作为和平、安全与价值共同体的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推进，极大提升了欧盟的信心。但欧债危机、难民潮流、英国脱欧等冲击波，使欧洲一体化陷入困境。2020 年 12 月底，英国正式达成脱欧协议，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巨大挑战。但同时，英国的正式脱欧，也使欧盟各国在对外战略的灵活度上得以

---

①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②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③ 张一飞：“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与评估”，《国际展望》，2020 年第 2 期，第 103 页。

④ 周琪：“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欧洲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88 页。

增强。欧盟迫切需要在各个方面做出成绩，稳定欧洲一体化的大局。由此，推动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稳固欧盟的对外政策成果显得非常必要。中欧达成了投资协定就是欧盟在新困境下的突破。可以预见，中欧双方改善关系的意愿和实际需求，在新的背景下日益上升，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冠病毒加速传播的大趋势下通力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在增加。欧盟在同中国接触中也逐渐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全球和地区治理，增进中亚各国政治稳定、实现善治，推动中亚各国政治韧性以及民生改善上的巨大成绩。这也可能改变欧盟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摆脱长期以来受西方偏见和污名化影响造成的同上合组织合作议程的缺失，积极同上海合作组织接近，从而实现双赢。

---

**【Abstract】** 2021 marks the 2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Guided by “the Shanghai Spirit”, the SCO has performed outstandingly in terms of function cooperation, enhancing people-to-people bonds, building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etc. In contrast, the EU’s “normative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has encountered many bottlenecks. Therefore, the EU is also adjusting its Central Asia policy. In 2019, the European Union launched a brand-new Central Asia strategy, with “connectivity” as its core concept, promoting Central Asia to sweep away connectivity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gains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rickling-down” the Europeanized governance model. However,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advancing this new strategy. First, the lack of a win-win thinking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Second, it restricts the flexibility of cooperation to put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conditional and normative nature of regional governance. Third, it has caused widespread anxiety amo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o focus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face of major international changes, the EU needs to abandon the zero-sum thinking concerning its governance in Central Asia and trea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 its partner rather than its opponent so as to advance its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in Central Asia.

**【 Key Words 】** “The Shanghai Spiri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Governance Model, the European Union Central Asia Strateg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2021 году исполнилось 20 лет со дня со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Под девизом «Шанхайского духа» ШОС преуспела в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контактов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этого, «норматив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ЕС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о мног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В 2019 году ЕС запустил нов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сновной концепцией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сть», призванная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устранению барьеров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сти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барьеров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просачива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модел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днако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этой нов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опряжено с определёнными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во-первых, в ней отсутствует взаимовыигрышный подход к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что затрудняет эффективную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ь; во-вторых, в ней чрезмерно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ся условный и норматив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то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гибк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третьих, в ней делается акцент на вопросах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что вызывает широкое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сред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ерьёз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управление ЕС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олжно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мышления «нулевой суммы»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ШОС как партнёра, а не противника, чтобы продвинуть цель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Шанхайский дух,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ЕС, стратегия ЕС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责任编辑 王海燕)

## 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纳扎尔拜·叶尔肯\*\*

**【内容提要】**自1917年阿拉什奥尔达政府通过民族党纲提出“民族国家”原则，至2014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日庆典讲话中提出“永恒国家”精神，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与“国族”概念、以及民族精神内涵和民族国家观，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转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其目的均在于：在多元文化与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维护和促进族际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构建以哈萨克斯坦利益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加强公民的“哈萨克斯坦人”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结构、经济实力、政治意愿、发展战略、联盟选择、国家认同与核心利益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哈萨克精英 哈萨克国族建构 哈萨克国家认同 欧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6-0165(32)

### 一、导言

在政治学中，英文“state”常被翻译为“国家”，而国家的概念经常被定义为一个机构、领土单位、历史实体或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因此“国家”一词也频繁与“政府”混淆，但准确地讲，“政府”是“国家”的一部分。对于国家职能有诸多讨论，从狭义角度来看，国家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机构，也可被视为广义上的政府机关，属于公共事务区块，其组成部分包含政府机

\*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 纳扎尔拜·叶尔肯 (Nazarbay Yerkin)，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孔子新汉学计划）哈萨克斯坦籍博士研究生。

构、官僚体系、法庭、军队与警察等。不仅如此，国家也有地理上的限制，约束其权威的范围——领土。由此可见，国家不仅是一个连续性的共同体，也是法治核心之所在。相比较而言，政府则可能是临时性的、更换频繁的，其体制是可以改变的。<sup>①</sup>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享有特定的国际权利与义务，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当代国际体系的概念，即每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和内部事务拥有主权，排除所有外部势力的侵扰，不干涉别国内政，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法中均为平等。而1933年由美洲19国签署的《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将人民、土地、政府及外交能力定为国家所应具备的四个条件或是承认所需的四项标准。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以国家建构为题，聚焦国家体制，探讨如何稳固或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体制。福山所采用的“国家建构”是源自美国的一种自外而造的制度形式，与欧洲的“国家建构”形成对比，后者（欧洲）强调国家是由共同文化与历史凝聚起来的政治实体，<sup>②</sup>旨在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宗教和社会差异的共同体。<sup>③</sup>

福山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典范，其国家职权受到宪法的规范，即有限政府，美国政府在宪法规范下具有足够的执行能力，进而实践国家的目标。<sup>④</sup>国家公正执行法律的能力等同于国家职能强度，又可称之为国家能力或国家效能。福山强调，要考虑的核心是，制定并实行政策与法律，透过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反贪污与反贿赂，来确保政府体制透明化。<sup>⑤</sup>

冷战结束后，受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影响，多数国家迈向了转型道路。

---

① 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75-78.

② 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the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99.

③ Rene Grotenhuis, *Nation-Building as Necessary Effort in Fragile Stat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3.

④ Francis Fukuyama, “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4, Vol.15, No.2, p.21.

⑤ 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the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pp.7-11.



但在民主化转型进程中，部分国家却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制。当国家在其管辖领土内无法有效统治时，陷入内部混乱的局面就难以避免，“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一词因此问世。失败国家是指无力控制其领土与人民，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交往，在其领土范围内不具备垄断合法暴力的权力，以及不能为人民提供适当生活物资的国家。<sup>①</sup>由于失败国家缺乏治理能力，使得国家更加容易成为跨国恐怖主义进攻的对象和目标，也更容易成为滋养、助长跨国恐怖主义的温床。<sup>②</sup>

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6年）中，首次将失败国家列为国家威胁。失败国家具备以下标准：爆发内战且仍处于战争状态、公共债务比例恶化至临界点、恶性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长期暴力及种族清洗、执法机关无力履行职责、高幅度的新生儿及儿童死亡率、贪污腐败、国界不明、抗议示威频繁、政权频繁更替及动荡、缺乏军控能力、国民生产基础薄弱等。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区域各民族国家建设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国家主权遭受冲击，传统民族主义同一体化发生碰撞。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宽广的进程，它受政治与经济的联合推动，除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外，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为持续保持其影响力，需要与全球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即非政府组织、区域和国际组织或协会，加强联系。

从克涅萨勒（Kenesary Khan）大起义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至今，哈萨克斯坦经历了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百年巨变。百余年间，草原民族辉煌顿失，黯然于世界舞台。而在经历了这一过程后，草原民族又如凤凰涅槃，华丽重塑，成功实现了现代民族的自我建构，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根据福山所言的强国论，另一方面则通过吸取国际上失败国家的惨痛教训，将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首先是制定强国战略目标，并且致力于提前完成此项任务。其次是在政经与社会领域克服发展过程当中的挑战和不平衡，完

---

① Rosa Brooks, “Failed States, or the State as Fail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5, Vol.72, No.4, pp.1160-1164.

② James Piazza, “Incubators of Terror: Do Failed and Failing States Promote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8, Vol.52, No.3, p.483.

成社会平稳过渡与转型。<sup>①</sup>

由于现代“民族”观念奠基于启蒙时期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所以“民族”概念自提出伊始就具有全民性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背景，凸显了民众对于归属感、整体性、生活理想和所属共同体的追求。因此，本文以意识形态为切入点，提出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首先，从历史视角分析欧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所产生的双重影响，并从宪政入手剖析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的内涵演变及其所属地理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次，梳理归纳国家在民族建构过程中所奉行的战略和政策，阐述迁都作为战略之核心在民族内部整合与国家制度转型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再次，着重分析新民族国家制度框架下重构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其联盟动机与盟友选择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区域意识形态的结合、分化现状，尤其是各类意识形态对新欧亚主义的影响，为当代中亚研究及区域政经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目前，在中国，有关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及其意识形态转型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学者大多从俄罗斯视角出发，以欧亚经济联盟为研究主轴，主要关注地缘政治博弈，重点分析包括欧亚主义在内的地区主要意识形态在区域一体化进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发展历程。张娜对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在探索与建设新型国家意识形态进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做了初步探讨，其研究以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为核心，初步分析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欧亚主义、语言、民族及宗教政策。其中，有关欧亚主义的探讨基本是围绕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所提出的“欧亚一体化”思想展开的。<sup>②</sup>陈树林的欧亚主义分析凸显了俄罗斯的文化特性，为深入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异质性民族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这一问题，从文化哲学层面对欧亚主义框架下的俄罗斯文化模式进行了研究。<sup>③</sup>张建华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以欧亚主义的萨维茨基派学说为核心，

---

① Қасымбеков М.Б. Қазақстан-2050: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лық анықтамалық. Астана: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Мәдениет министрлігі Тіл комитеті, 2014. Б.50-51.

② 张娜：“哈萨克斯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62页。

③ 陈树林：“欧亚主义历史文化特殊性理论及其价值”，《哲学动态》，2014年第11期，第69页。

探讨了当今欧亚经济联盟和“光明之路”的文化迁移与发展空间的演变，重点是欧亚主义中的图兰特征及区域地缘政治想象的实践。<sup>①</sup>李自国认为，俄罗斯“大欧洲”构想的失败、欧亚主义的确立，是大欧亚伙伴关系产生的思想基础，而欧亚经济联盟则是其物质基础。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在提出“欧亚经济一体化”时，考虑以区域经济集团为依托，在“再全球化”中占据主动地位。<sup>②</sup>封帅指出，欧亚本身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无论是其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还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都没有定论。这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虽起源很早，但作为对空间的指涉意义，却是在冷战后才流行起来的。当学者们在谈论欧亚空间或欧亚秩序的时候，往往需要在空间外延方面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以便使讨论能够顺利进行。但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客观上也削弱了论证的严密性。这种矛盾关系的存在，使很多研究者有意回避了对这一主题的论述。<sup>③</sup>

不难看出，中国的欧亚主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具有明显地缘政治或经济特征的欧亚经济联盟或相关地缘战略，而非单一政治实体本身。其研究视角更多以俄罗斯为主，因此普遍忽视了独立 30 年来“欧亚主义”的区域本土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 30 年间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欧亚主义”的内涵与范围，根据中亚各国所属的地缘政治空间，已呈现出国家化趋势，并且与各国政府所倡导的其他区域意识形态相融合，进而演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不同于他国的新形态。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入“民族国家”的概念，以哈萨克斯坦为单一研究对象，以本土为主、以区域为辅的视角，分析不同时期的“国家”与“民族”双层关系的构建对接及其差别，并梳理“欧亚主义”作为国家核心意识形态之一，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被赋予的使命和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欧亚主义”与其他重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结合与再分化。

---

① 张建华：“从‘图兰东方’到‘欧亚经济联盟-光明之路’——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及其在当代哈萨克斯坦国家进程中的战略意义”，《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48页。

② 李自国：“大欧亚伙伴关系：重塑欧亚新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74页。

③ 封帅：“世界历史中的欧亚空间——源起、建构与衰朽”，《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5期，第28页。

## 二、欧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欧亚主义 (Eurasianism) 是由十月革命后流亡于境外的俄国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政治思想及文化社会运动, 其原则上虽承认俄国革命为必然, 但始终拒绝接受源自西方的外来文化, 坚持奉行俄罗斯所独有的历史发展道路, 以此取代布尔什维主义 (Bolshevism)。欧亚主义思想浪潮在 20 世纪 30 年代蓬勃发展, 可却又因俄国各地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开始衰弱, 成员相继选择退出, 导致思想运动丧失原有的完整性, 而所遗留的概念, 日后则成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根据, 即古典欧亚主义 (Classical Eurasianism)。<sup>①</sup>

沙俄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 (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 在与辛比尔斯克省省长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 (Михаил Магницкий) 辩论鞑靼统治的意义时, 其内容涉及了欧亚主义的起源。马格尼茨基认为, 俄罗斯被鞑靼统治, 不但具有拯救欧洲的意义, 而且也发挥了维护基督信仰之纯洁的作用, 因此欧亚主义是直接起源于斯拉夫主义 (Pan-Slavism) 的。欧亚主义者在强调斯拉夫民族属性中所独有的价值的同时, 斯拉夫主义者则往往忽视自身的“亚洲”因素。斯拉夫主义社会学家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Данилевский) 和外交官康斯坦丁·列昂捷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Леонтьев) 注重东正教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及国家制度之间的关联,<sup>②</sup>达尼列夫斯基反对欧洲文明的“单一中心论” (Monocentrism), 提出“多中心论” (Polycentrism)。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基础自此得以奠定。<sup>③</sup>

根据欧亚主义所独有的“发展空间” (Developmental space) 概念, 俄国社会是时空的连续体 (continuum), 是其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受气候、水文、土壤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所带来的结果, 其中包括森林和草原所发挥的作用, 以及居民对此自然条件的依赖。与此同时, “发展空间” 也同样影响民众的生活方式、心理、社会组织及国家制度, 构建中立环境, 接纳所有神祇,

---

① Жарников А.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Истоки, доктри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сква, 1993. С.4-9.

② Урханова Р.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как идей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теч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1992. С.4.

③ Нартов Н.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а: Юнити, 2000. С.94-95.

容纳各类文化，进而维护俄国宗教社会的完整与稳定。<sup>①</sup>俄罗斯在地理上之所以被称为“欧亚”（Eurasia），是因为其介于欧洲与亚洲以及东方和西方之间，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俄罗斯一方面深受欧洲文明影响，另一方面则同样受亚洲文明熏陶，最终汇聚形成俄罗斯特色的“欧亚文化”（Eurasian culture）。从民族视角出发，俄罗斯民族既不是典型的“欧洲人”（European），也不是“亚洲人”（Asian），而是相对中性的“欧亚人”（Eurasian）。<sup>②</sup>

不仅如此，史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特别强调俄罗斯文化中的突厥成分，并指出“突厥的成分已融入俄罗斯人的精神当中，<sup>③</sup>我们不是斯拉夫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特殊的人种类型”<sup>④</sup>。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俄罗斯与突厥的融合等同于欧亚人。<sup>⑤</sup>欧亚主义者一致认为，假如没有“鞑靼统治”（Tatarshina）就不会有俄罗斯，鞑靼统治是古代俄罗斯与团结于鞑靼蒙古帝国架构之下的“伟大草原”（Great steppe）之军事政治联盟。此联盟对俄罗斯而言不仅在财政和军事方面极为有利，而且在地缘政治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up>⑥</sup>在文化方面，斯拉夫原则与突厥原则二者之间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关键在于双方可实现互补，<sup>⑦</sup>进而维持一个中性的关系，特别是对各方宗教信仰的容忍，这是源自蒙古统治时期的一大遗产。

20世纪60年代末，因受地缘政治局势所迫沉寂已久的欧亚主义运动在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的引领下再次活跃起来，其基础为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所创的欧亚论。古米廖夫在其著作《古代俄罗斯大草原》《欧亚节奏》和《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中阐述道：欧亚大陆是俄罗斯民族之独有精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在此广阔草原长久共生的结果，其独有性创造出特有的欧亚文化与精神认同。古米廖夫

---

① Горяев А.Т. Россия, «рус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концепции евразийцев. Москва, 1992. С.108-109.

② Пашенко В.Я. Иде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Москва: МГУ, 2000. С.13-14.

③ Хоружий С. Судьба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кой идеи в двадцатом веке. Москва, 1994. С.18.

④ Нартов Н.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С.96.

⑤ Кожин В.В. О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пути. Москва, 1997. С.278.

⑥ Нартов Н.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С.103.

⑦ Горяев А.Т. Россия, «рус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концепции евразийцев. С.109.

的核心思想是激情 (passionarity) 与人种节奏 (ethnic rhythms), 并认为: “某一民族或人民常被团结于一个完整的超种族的宽广架构之下, 其行为之激情的推演大致在同一地区或地点兴起, 进而构成一个超种族且包含各类典型文化的政治结构。生活在此框架下的人民虽未必相同, 但在精神、行为举止模式和历史命运方面却极为接近, 俄罗斯历史沿此之道与周边民族一同构成了欧亚之大部。”<sup>①</sup>

苏联解体后, 新欧亚主义思想呈现出多种派别, 彼此分歧较大, 尚未形成统一整体:

(1) 以彼得·萨维茨基 (Петр Савицкий)、格奥尔吉·韦尔纳茨基 (Георгий Вернадский) 和特鲁别茨科伊理念基础为代表的大陆帝国民族思想, 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指出俄罗斯是广大地理空间的轴心, 建立欧亚社会主义帝国是其使命与任务, 并认为俄罗斯改革派所主张的自由经济是大西洋主义的产物。

(2) 与伊朗结盟建立大陆国家的思想, 其代表成员认为突厥语民族和俄罗斯人以及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拥有睦邻友好的合作基础, 经济和政治利益一致, 因此该地区人民和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反对西方的功利主义政策。

(3) 经济欧亚主义, 即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 所主张的加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的经济合作。

“欧亚经济联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概念最早由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1994 年 3 月 28 日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时提出, 他提议将独联体既有合作机制提升至新的高度。时隔一年,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签署条约建立关税同盟,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紧随其后加入。在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 (Astana) 前夕, 首任总统在 1996 年 5 月 23 日决定将位于阿克莫拉 (Aqmola) 市的原切利诺格勒土木工程学院与师范学院合并重组为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新大学的宗旨为创新且贯彻以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欧亚思想与区域一体化。2011 年 11 月 18 日,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签署协议, 计划在 2015 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

---

<sup>①</sup> Нысанбаев Ә.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ІІІ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1. Б.86-87.

新欧亚统一经济空间的建立被视为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全面突破了原苏联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2014年5月29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约，正式成立欧亚经济联盟。<sup>①</sup>

哈萨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中央核心地段，是欧洲基督教拉丁-西里尔文化圈、中东伊斯兰教阿拉伯-波斯文化圈与东亚中原-汉字文化圈的交汇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哈萨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汗国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继承者，其领土由东钦察草原（East Kipchaks Steppe）、七河（Jetisu）及河中（Transoxiana）地区组成。从现在的地理角度出发，该王朝北起托博尔河（Tobol），南至锡尔河（Syr Darya），西起阿特劳（Atyrau），东至阿勒泰（Altai）。其中钦察草原西起多瑙河（Danube），东至阿勒泰，北起托博尔河，南至咸海（Aral Sea）与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今哈萨克草原（Qazaq Steppe）与南俄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公元11-12世纪中叶，该地区是钦察汗国故地，因此而得名。<sup>②</sup>不仅如此，钦察草原还是金帐汗国的核心所在，而哈萨克汗国则是由统治金帐汗国的成吉思汗家族术赤系后裔所统领。对术赤系后裔而言，先祖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草原帝国是突厥帝国的延续，不仅世代沿袭可汗（Kagan）尊位与其制度，还以回鹘文为基础创立国文，并定都哈拉和林（Karakorum），即原回鹘汗国国都窝鲁朵八里（Ordu-Baliq）遗址处以东。<sup>③</sup>

### 三、哈萨克“国家”与“国族”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现代哈萨克“国家”（State）与“国族”（Nation）概念，起源于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时期由哈萨克近代政治精英所构建的“民族国家”（Nation

---

①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и научно-популярных статей. Астана: Фолиант, 2012. С.189-193.

② Берденовой К.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Экономика, 1997. С.6-7.

③ Еуразияшылдық идеясы контексіндегі Қазақстан түріктануы: мәселелері мен болашағы (халықаралық ғылыми-теориялық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ының ғылыми теориялық мақалалар жинағы). Астана: «ІС-Сервис» ЖШС, 2009. Б.116-120.

state), 即阿拉什奥达 (Alash Orda)。而哈萨克民族主义则形成于 19 世纪末反殖民运动时期的民主革命, 成型于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 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象征意义。<sup>①</sup>回溯历史源头, 分析概念本质, 能够从根本上发现哈萨克“国家”与“国族”概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

### (一) 哈萨克“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

19 世纪下半叶以失败告终的克涅萨勒复辟运动, 彻底改变了哈萨克政治精英的对外态度与观念。前朝遗老和政治新贵明确意识到殖民趋势不可逆转, 并深知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与思想的严重落后, 唯独教育与文化改革才能使哈萨克社会步入现代化, 进而扭转劣势。在民族文化精髓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 成为哈萨克各派政治精英的共识, 扎吉德 (Jadid) 运动由此开始兴起。<sup>②</sup>

哈萨克民族复兴运动以新式教育为切入点, 主张政教分离与教育普及, 推动社会现代化和启蒙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民族精神, 凝聚各族人心, 形成利益共同体。19 世纪的哈萨克乌勒套 (Ulytau) 三杰乔罕·瓦里汗诺夫 (Shoqan Walikhanov)、易卜拉欣·阿尔丁萨林 (Ybyrai Altynsarin) 和阿拜·库南巴耶夫 (Abai Qunanbaiuly), 以人文主义为核心, 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 反对暴力与歧视, 主张自由平等, 奠定了哈萨克书面文学的基础。不仅如此, 他们还通过将基于伊斯兰的自由主义与俄罗斯、西欧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复兴哈萨克文化, 史无前例地将科学精神提高至振兴民族的高度, 被后人视为哈萨克民族复兴精神的先驱与领袖。哈萨克民族精神导师阿拜在其所撰写的著作中频繁使用“我的哈萨克” (My Qazaq), 其含义等同于“我的民族” (My nationality)。<sup>③</sup>

在迈入 20 世纪之际, 随着启蒙教育的不断深入, 各地初级教育机构稳步增加, 内部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哈萨克社会融入沙俄政治经济体制的步伐加快, 追求平等的呼声和参与国家建设的能力逐渐增强, 进而导致哈萨克精英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日益扩大。此时, 被亚历山大·普

---

① Тілешов Е, Қамзабекұлы Д, Нұрахмет И. “Алаш” қозғалысы. Алматы: «Сардар» баспа үйі, 2008. Б.3-5.

② Нысанбаев Ә.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II том. Б.613-614.

③ Нұрғалиев Р.Н. Аба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Алматы: Атамұра баспасы, 1995. Б.572-576.



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用诗歌称为开向西方的窗户、让俄罗斯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帝都圣彼得堡，成了哈萨克新一代政治精英的摇篮。<sup>①</sup>

沙俄兵败对日战争后，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活跃于帝都圣彼得堡的哈萨克大学生组建各自的精英社团，相继提出了“积极向东学习日本，学取欧洲之精髓，拒绝向西学习土耳其，划清与布哈拉（Bukhara）等东方国家的界限，为创建新文化教育事业而奋斗”的主张。并且要求沙俄政府给予哈萨克文化政治之平等权益与自治，疏远东方、向西靠拢。此次革命在唤醒哈萨克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时，还将哈萨克精英各派观点立场汇聚于一体，与乌勒套三杰精神相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什思想（Alash idea）。<sup>②</sup>

十月革命爆发前夕，面对土崩瓦解的沙俄政权，哈萨克七州一区 20 多名代表齐聚奥伦堡，召开了史上第一届全哈萨克大会。会上哈萨克政治精英提议建立“阿拉什党”（Alash party），并且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阿拉什党党纲》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政体的、民主的、联邦制的法治国家，联邦共和国政府元首通过立宪会议和全国杜马定期选举产生。”而第二章第一条则规定：“哈萨克人（Qazaq）居住生存的所有州区作为整体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之一，享有地方自治权利。哈萨克自治国有权与邻国自由合并或撤出，并承认地方自治局。”党纲对国家体制与组织结构做出的阐释是：“阿拉什奥尔达是哈萨克人的民族国家政府，而哈萨克族作为国族具有高度自治权。”<sup>③</sup>

## （二）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民族”概念的提出

宪法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并且是国家认同构建过程当中的一大重要制度资源和载体。“社会主义民族”作为法律概念体现在 1937 年颁布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苏维埃宪法》）之中，其不仅为苏维埃国家建构及身份认同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且还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苏维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该时期以社会主义制

---

① Әбдіуақап Қара. Мұстафа Шоқай. Астана: Педагогика-Пресс Баспа үйі, 2012. Б. 22-23.

② Тілешов Е, Қамзабекұлы Д. Алаш қозғалысы.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лық анықтамалық. Алматы: Сардар баспа үйі, 2014. Б.15-17.

③ Тілешов Е, Қамзабекұлы Д, Нұрахмет И. “Алаш” қозғалысы. Б.298-300.

度认同为核心价值观、以苏联为总体认同对象、以“苏联公民”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身份认同，在现代政治框架内打造出“苏维埃式宪法爱国主义”。研究分析《苏维埃宪法》各条文中的“社会主义民族”相关概念的含义及其中包含的国家意识，有助于理解苏维埃时期“民族国家”构建的依据。

自 1920 年赢得俄国内战之后，苏联中央政府对哈萨克斯坦地区原有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体制改革、民族国家划界、迁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并且确立苏维埃哈萨克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意识形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和国。因此，《苏维埃宪法》第一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苏维埃宪法》第二条则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由于推翻地主、资本家、巴依（Bai）和平定民族主义之反革命，以及解放深受俄罗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压迫的哈萨克人民的政权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独特之处在于，这是宪法中唯一单独提及“哈萨克人”的条文，且具有地理、历史、文化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可是，条文中明确写出的是“哈萨克人民”（Qazaq people）而不是“哈萨克民族”（Qazaq nation）。所以，国家的政治基础是由“解放哈萨克人民的无产阶级群众”，即“社会主义民族”所构成。

最初由列宁提出、后来经斯大林继承和莫斯科中央主导的、长达 12 年的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工作最终以崭新的地缘政治版图告一段落，其影响波及至今。《苏维埃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由阿克纠宾斯克州、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州、西哈萨克斯坦州、卡拉干达州、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组成。”“哈萨克斯坦”（Qazaqstan）作为共和国东南西北四州之共同州名不仅明确了哈萨克斯坦的疆域，还间接取代了原先的“哈萨克草原”（Qazaq Steppe）和“阿拉什奥尔达”等具有明显民族政治色彩的历史地理名词，进而淡化了哈萨克北方民族主义与南方泛民族主义倾向。

在构建身份认同方面，苏联中央决定以“国民认同”代替“国族认同”。《苏维埃宪法》第十八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都是

苏联公民。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公民均享有与其同等的权利。”尽管苏联境内各民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不尽相同，但苏维埃政府以新制度为核心团结各方各界，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苏联公民”（Soviet people）。《苏维埃宪法》第一百〇一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这是确定不移的法律。因种族或者民族的关系而对公民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间接限制，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公民特权以及凡宣传种族或者民族特殊化或者仇恨和歧视等行为，都受法律制裁。”苏联政府严禁境内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或沙文主义，通过保留、扩大地方民族在文化与法律领域的影响换取其忠诚和认同，以国体与政体为主的制度性创新解决民族矛盾与潜在的分离主义。保持地方民族身份的独立意识与全国公民身份的共同意识间的平衡，是长期构建“苏联公民”自我认同的关键所在。<sup>①</sup>

### （三）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概念的重构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不得不应对各种挑战。存在近 70 年之久的苏联政治体系突然崩溃，导致长期并存的信仰大厦一同坍塌，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民族大熔炉”很可能成为危险的“火药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哈萨克斯坦选择宪政主义，开启了现代化与转型之路，多方面重建并凝聚社会，克服历史性挑战与不平衡，进而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通过全民公投产生的 1995 年版《哈萨克斯坦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在其开篇中宣称：“我们——由共同历史命运凝聚在一起的哈萨克斯坦人民（Qazaqstani Nation），在世代居住的哈萨克（Qazaq）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忠于自由、平等与和睦的理想，以热爱和平的公民社会自居，同时以在国际社会获得一席之地为愿望，肩负起我们在下一代和未来子孙面前应尽的责任，并以我们的主权之名通过此宪法。”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取代了苏维埃时期的“苏联公民”，在原苏联“制度认同”的基础之上建立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同体，其核心纽带是各族裔间共同的历史、所属空间、利益与责任。而哈萨克族作为该国境内毋庸置疑的原住民之历史、

---

<sup>①</sup>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Казах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Алма-Ата: Книжно-журналь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НКМП, 1937. С.5-29.

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主导地位通过法律得以明确和巩固，具有宪法地位，为构建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宪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等同于哈萨克斯坦。”“等同”是该条款的要义，即将具有政治实体及民族国家概念的新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历史地缘政治色彩浓厚的“哈萨克斯坦”等同、合并，彰显哈萨克斯坦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身份认同与政治遗产。《哈萨克词典》对“哈萨克斯坦”的解释为：（1）哈萨克共和国（Qazaq Republic）、哈萨克故土（The land of Qazaq）与哈萨克国（Qazaq country）；（2）位于欧亚大陆中央，自西向东绵延约 3000 公里，南北长约 1700 公里，地处温带中部至南部之间纬度区域的国家。而“哈萨克斯坦人”（Qazaqstani）则被解释为“哈萨克斯坦居民与哈萨克斯坦公民”。<sup>①</sup>

相比独立后的《宪法》，《苏维埃宪法》不仅没有规定哈萨克语为国语，而且还将其功能模糊地限制在司法和文化领域，导致哈萨克语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以本族为主的县村地区，造成其发展水平停留在农业阶段。因此，《宪法》第七条规定：（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语为哈萨克语；（2）在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中，俄语与哈萨克语同等正式使用；（3）国家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创造必要条件。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与城镇居民已高度俄罗斯化，俄语作为官方用语与族际交流语在政经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被视为哈萨克斯坦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而其他各族裔语言也同样被政府重视与保护，但与俄语的不同之处在于，族裔语言是维护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的“防水舱”。

《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世俗的、法制的和谐社会国家，其最高价值为人、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自由。”这表明，对哈萨克斯坦而言，最为宝贵且重要的是人，人类价值处于优先地位。《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共和国活动的基本原则为：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造福全民的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国家大事，其中包括全民公投或议会投票。”为在转型时期建设健全的哈萨克

---

<sup>①</sup> Уәли Н, Құрманбайұлы Ш, Малбақов М, Шойбеков Р. Қазақ сөздігі (Қазақ тілінің біртөмдік үлкен түсіндірме сөздігі). Алматы: «Дәуір» баспасы, 2013. Б.727.

斯坦，政府坚持奉行“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方针，首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突破，其次为社会型国家奠定基础，重筑公共意识，建立且加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基础内涵。为凸显民族的特殊属性，“民族”一词升格且取代了原先的“国立”和“中央”，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愿望紧密相连。“民族”概念的内涵虽等同于“国家”，但其政治地位却高于“国家”。<sup>①</sup>

在经济制度方面，哈萨克斯坦实现了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型，《宪法》第六条第一款明确为其提供了保障：“哈萨克斯坦承认并平等保护国家和私人财产。”在政体方面，《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总统制。”总统身为国家元首，是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在国际上代表哈萨克斯坦的最高国家官员，是人民和国家统一、宪法不可动摇、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象征和保证。<sup>②</sup>

1997年10月20日，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总统令，宣布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迁至阿克莫拉市。1998年5月6日，根据总统令，阿克莫拉市更名为阿斯塔纳市。《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是阿斯塔纳。”自此，努尔苏丹（Nur-Sultan）<sup>③</sup>成为哈萨克斯坦独立自主的象征、民族辉煌的写照，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篇章。<sup>④</sup>

#### 四、哈萨克斯坦国族建构之发展战略

独立伊始，哈萨克斯坦作为年轻的主权国家，为维护行政区域的统一与政府架构中的民族特征，选择实行强有力的共和国总统制。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著作《哈萨克斯坦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战略》中指出：“民族

---

① 例如，苏联央行（Central Bank）改名为哈萨克斯坦民族银行（National Bank），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for State Security）改名为哈萨克斯坦民族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基洛夫哈萨克国立大学（Kirov Kazakh State University）改名为阿里-法拉比哈萨克民族大学（Al-Farabi Kazakh National University）。

②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ның Конституциясы 1995 жылғы 30 тамыз (2011.02.02, берілген өзгерістер мен толықтыруларымен). Алмат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LEM, 2014. Б.3-12.

③ 2019年3月20日，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为了纪念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将首都阿斯塔纳更名为努尔苏丹。

④ Айтбаева Ғ, Әбдірахманов С, Әлібеков О. Астан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Алматы: Атамұра, 2008. Б.1-10.

不能没有国家，无国之族必将灭亡。而丧失民族性的国家将会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严格运用辩证思维看待该问题，不难发现其结果是残酷无情的。哈萨克族身为本国土著民族，通过法律平等原则将所有族裔的权益视为自身利益。此举不仅可振兴民族文化与语言，也可恢复世界哈萨克族间的精神文化联系，为其回归祖国创造先决条件。”

横跨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自古就是连接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舞台。因此，苏联时期属于中亚，当下位于欧亚两大洲之间的哈萨克斯坦作为连接东亚、太平洋与南亚次大陆的枢纽，将发挥自身特殊的战略作用。为重建哈萨克斯坦，首先要建立能够深化民主进程、凝聚多族裔社会及培养新一代政治人才和领袖的多党体制。与此同时，采取一切所需措施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其次是要建立能够维护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与主权的多边及其他形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进而确立其地缘政治地位。之后依据民主自由及人权保护原则，提高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声望，在全球政治体系中实现自我定位。最后是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同时，有效发挥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优势。<sup>①</sup>

### （一）《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

面对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新生的哈萨克斯坦选择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在经历了短暂的激进休克疗法之后，最终决定效仿东南亚地区民族与宗教关系极为复杂、但经济一枝独秀的新加坡，“李光耀模式”自此落户哈萨克斯坦。伴随“灭火时期”的告终，呈现在哈萨克斯坦面前的是未来30年的民族国家何去何从。之所以是30年，主要是考虑到两大因素。首先，30年是一代人的关键成长期。其次，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备评估与发展替代能源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30年得以成型。1997年10月1日正式通过的《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规划分为四个阶段：1997年至2000年的准备阶段；2000年至2010年的第一阶段；2010年至2020年的第二阶段；2020年至2030年的第三阶段。战略优先为根据瓶颈原则逐一筛选、保留下来的七个方向。<sup>②</sup>

<sup>①</sup> Назарбаев Н. Қазақстан егеменді мемлекет ретінде қалыптасуы мен дамуының стратегиясы. Алма-Ата: РГЖИ «Дәуір», 1992. Б.5-6.

<sup>②</sup> Назарбаев Н. Қазақстан жолы. Астана: Н. Назарбаев, 2007. Б.28-30.

《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的发展规划包括七个主要方向：第一是民族安全，全面维护领土统一，为独立自主的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是内部政治的稳定及长治久安，维持且加强国家内政稳定与民族团结，为哈萨克斯坦在此后 10 年之内完成民族战略铺平道路；第三是通过吸引外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经济稳定且可持续快速发展；第四是提高全民素质及生活水平，提高全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生活、健康、教育及获取相关领域机会的水平，改善生态环境；第五是能源开采及利用，通过合理开发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推动石油与天然气的出口，以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六是发展基础设施，为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助一臂之力；第七是创建职业技术学校，组建符合当代标准且公平公正、一心为民的哈萨克斯坦公务员团体。<sup>①</sup>

毋庸置疑，民族安全是哈萨克斯坦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样也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威胁哈萨克斯坦民族及国家安全的是激进主义、毒品走私、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俄国白银时代著名理论家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Велимир Хлебников）曾描述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里海为“基督、伊斯兰和佛之三角地带”，而当下这个被世界视为“金宝箱”的地带成了“角力中心”，进而演变为美国、俄罗斯、欧盟、土耳其、伊朗及海湾国家的利益争夺点。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的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地缘政治之交通要道（包括铁路、公路、航空及能源管道）将自身转变为“开放”地区。为实现该目标，对外，哈萨克斯坦一方面以双边合作为主与邻国划定边界，进而巩固疆土；另一方面，则以多边形式加入区域军事、政治与经济合作组织，加强自身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地位，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内，则以反渗透和反分裂为核心成立“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国语地位及教育水平，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及民族建构步伐。<sup>②</sup>

---

① Назарбаев Н. Қазақстан-2030. Ел Президентінің Қазақстан халқына Жолдауы. Алматы: «Білім» баспасы, 1998. Б.12-92.

② Назарбаев Н. Сындарлы он жыл. Алматы: Атамұра, 2003. Б.32-151.

## （二）《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

2012年12月14日，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21周年国庆大会上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已提前完成《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目标。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界，完成了国内经济空间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快速的宪法及政治改革建立了三权分立式的现代化国家管理体制，并且建成了新都阿斯塔纳，借此向世界展现了国力。在国族建构方面，哈萨克族人民的文化、语言及历史得以公正复原。公民和平与民族和谐已成为多元化哈萨克斯坦社会的主要价值，“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已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对话的独特模式，而哈萨克斯坦则正在演变为全球宗教信仰的对话中心。

虽然如此，首任总统强调面对新一轮的全球挑战，《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已无法全面涵盖和应对，并且列出地区面临的10项主要挑战：（1）时代步伐加速；（2）全球人口失衡；（3）全球粮食安全危机；（4）水资源极端匮乏；（5）全球能源安全；（6）自然资源的枯竭；（7）第三次工业革命；（8）社会的不稳定；（9）文明及文化价值观危机；（10）新一轮国际动荡。与之前的《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相比，《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宣布地点不是议会，而是努尔苏丹歌剧院，听众也不再仅限于政府官员和议员，而是扩大至社会组织代表及主要宗教派别领袖。

《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发展规划包括七个主要方向：第一是经济务实主义，从经济合理性及长期利益出发，确立新的市场定位，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与有效的私营经济，刺激和鼓励出口；第二是支持推动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及企业，大力开发本国过境潜力，为民族国家安全与未来建造油气资源储备，实现大规模农业现代化，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领袖；第三是社会政策新原则，根据经济和预算增长情况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第四是知识与专业技能，为现代化教育和工作创造条件，力争成为高竞争力国家，培养高素质国民；第五是巩固国家体制并进一步发展民主，确立新的国家管理模式，完善国家规划和预测体系，强化国家机构研究制定各项规划的责任；第六是连贯和可预测的对外政策，推进国家利益，巩固地区和全球安全，平等参与各项国际进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七是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



义，维护和巩固社会和谐，构建平等的公民责任共同体。

《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长期目标是进入世界前 30 发达国家行列，核心是构建“永恒之国”（Mangilik El），即延续阙特勤（Kul Tigin）精神，遵循噶欲谷（Tonyukuk）之道，实现民族振兴，光复草原辉煌。<sup>①</sup>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是一种凝聚万众的社会精神，所有哈萨克斯坦公民不分民族均拥有平等权利，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在反分裂与反渗透的同时进一步完成哈萨克族的自我整合与完善，继续巩固国语的地位，视其为国家精神核心，实现哈萨克文字拉丁化，普及三语教学（哈、俄、英），传承特色传统文化，注重知识分子阶层，实现民族精神复兴。<sup>②</sup>

## 五、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之迁都历程

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中，唯独哈萨克斯坦具有迁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地缘政治影响深远。第一次迁都始于 1920 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际，哈萨克革命委员会宣布“解散阿拉什奥尔达西部政府法令”之后。得到特赦的前阿拉什奥尔达政府精英层均从东部塞米巴拉金斯克（Semey）市迁至贯通哈萨克斯坦南北的外咸海铁路（Trans-Aral Railway）北端起点奥伦堡市，并且召开政府例行会议，讨论保留奥伦堡之吉尔吉斯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地位及奥伦堡与图尔盖两州合并的问题。目的是通过合并，将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奥伦堡州哈萨克化，进而维护东西部统一。

第二次迁都始于 1925 年的苏联中亚社会主义民族及苏维埃国家划分工作，哈萨克新政府精英决定将国都由明显带有帝国色彩的奥伦堡迁至外咸海南端锡尔河（Syr Darya）下游中段的阿克梅切特（Aq-Mesit）市，将其改名为克孜勒奥尔达（Qyzyl Orda），即“红色奥尔达”。目的是统一新并入哈萨

---

① Сыздықов С, Қанаев С, Жәніс Ж. «Мәңгілік Ел» идеясы: қалыптасуы, үш негізі, тарихи сабақтастық. Астана: «Фолиант» баспасы, 2013. Б.3-6.

② Қасымбеков М.Б. Қазақстан-2050: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лық анықтамалық. Астана: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Мәдениет министрлігі Тіл комитеті, 2014. Б.46-49.

克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南部各州，淡化地方传统民族主义及泛民族主义思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地区人口及产业结构。<sup>①</sup>

第三次迁都始于 1927 年的图尔克斯坦-西伯利亚大铁路（Turkestan-Siberian Railway）建设如火如荼之际，第六届全哈萨克苏维埃大会批准了将国都从锡尔河流域的克孜勒奥尔达迁至七河流域土西铁路南端的阿拉木图，与吉尔吉斯自治州首府伏龙芝（Frunze）仅一山之隔，其政治象征大于实际意义，是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sup>②</sup>

20 世纪 20 年代七年三轮的“C”字形迁都历程，导致哈萨克斯坦先后失去了西北的奥伦堡州和西南的卡拉卡尔帕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中断了与伏尔加河流域巴什基尔-鞑靼斯坦之间的联系，以及对阿姆河下游与咸海地区的控制权。政治中心的南迁还为北方大规模开荒创造了条件，进而导致大量东欧斯拉夫人及日耳曼族裔迁入北哈萨克斯坦地区，改变了当地原来的社会人口结构。1979 年 6 月 16 日，移民至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伏尔加德意志人后裔因要求建立自治州而引发政治风波，史称切利诺格勒事件。时任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出面与克里姆林宫协调，才将此事平息。<sup>③</sup>

苏维埃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国都位于北纬 45 度线及 50 度线的周边四角，而且均紧靠边界。再加上，阿拉木图代表殖民时代且三面环山，位于地震带，不利于城市扩建。为避免重演丧失国土之厄运及分离主义的突起，重塑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史，实现哈萨克民族现代化及城市化，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1997 年决定迁都至北纬 50 度线哈萨克草原正中央的阿克莫拉市，并改名为阿斯塔纳（现名努尔苏丹），以根除隐患。开国元勋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著作《在欧亚大陆的心脏》中指出：“努尔苏丹是哈萨克斯坦复兴的象征，同样也见证了多元文化的创造力，即同心筑梦创辉煌，而这就是一个独立民族对未来的信心。”<sup>④</sup>

---

① Ерлан Жалмағанбетов. Қазақстан астанасын Қызылордаға көшіру// Қазақ тарихы ғылыми-әдістемелік журнал. 2013. №.1(118). Б.18-20.

② Қаратаев М.Қ. Қазақ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 VIII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72. Б.281-285.

③ Нысанбаев Ә.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98. Б.486-490.

④ Назарбаев Н. Еуразия жүрегінде. Алматы: «Жібек жолы» баспа үйі, 2020. Б.22-23.

## 六、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之玉兹整合

《哈萨克斯坦民族百科全书》指出：“玉兹（Juz）作为哈萨克汗国的行政区划是由 15-16 世纪期间形成的部落氏族联合体所组成，即世居于七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及伊犁河流域的大玉兹十一部，横跨阿勒泰山与乌勒套山之间的哈萨克丘陵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中玉兹六部和叶德尔河、扎伊克河、额尔格斯河、图尔盖河、托博尔河流域的小玉兹三部。三大玉兹二十部是哈萨克汗国境内构建凝聚塞、匈奴、乌孙、康居、突厥、乃蛮、克烈、钦察、金帐、蓝帐及莫卧儿汗国的主体部落，拥有共同历史、语言、文化、信仰及血缘关系。”<sup>①</sup>

哈萨克人代代相传：“给予大玉兹马鞭，让其放牧；给予中玉兹纸笔，让其辩论；给予小玉兹长矛，让其抗敌。”<sup>②</sup>研读古老的传统分工不难看出，小玉兹负责军事，中玉兹负责政治，大玉兹负责经济。另一方面，这又代表着小玉兹敢于冲锋陷阵，中玉兹忠于文化遗产，大玉兹善于精打细算。近代以来，哈萨克社会的重大变革均由中玉兹精英发起、组织和完成的。中玉兹精英提倡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另起炉灶”的发展原则，强调在不侵蚀哈萨克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由于以哈萨克中玉兹为主、小玉兹为辅的阿拉什党政治精英在俄国内战时曾长期与布尔什维克为敌，因此在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中被彻底根除。1964 年勃列日涅夫推行干部民族化与本土化之后，出生于阿拉木图大

---

① 三大玉兹的势力范围以两线为界，大玉兹占据北纬 50 度线以南、东经 65 度线以东四州一市，由杜拉特、札刺亦儿、阿勒班、素宛、康里、厄斯特、恰甫拉西提、乌沙克烈、锡尔克勒、撒里乌孙等部组成，其中杜拉特部人口规模最大，占大玉兹总人口的 38.41%（大玉兹总人口为 361 万人）。中玉兹占据北纬 50 度线以北、东经 65 度线以东六州一市，由阿尔根、乃蛮、钦察、弘吉拉、克烈、汪古等部组成，其中阿尔根部人口规模最大，占中玉兹总人口的 42.99%（中玉兹有 486 万人）。小玉兹占据东经 65 度线以西四州，由埃里木乌勒、巴伊乌勒和杰特鲁三部组成，其中巴伊乌勒部人口规模最大，占小玉兹总人口的 44.41%（小玉兹有 252 万人）。三大玉兹的交汇点是位于咸海东部的克孜勒奥尔达州。Нысанбаев Ә.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V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2. Б.86-87.

② Юдин В.П. Орды: Белая, Синяя, Серая, Золотая...В кн. Утемиш-Хаджи. Чингиз-наме. Алма-Ата: «Гылым», 1992. С.46.

玉兹厄斯特的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成功运用哈萨克玉兹部落纽带关系，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地方民族官僚体系，割据一方，为哈萨克基层精英踊跃参与苏维埃政治创造了条件，奠定了以大玉兹为核心的哈萨克地方行政体制，初步确立了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及经济精英的雏形。<sup>①</sup>

大玉兹恰甫拉西提部出生的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国家稳定的核心是族裔团结，哈萨克内部团结是重中之重，并且提出 12 条相关必要前提：（1）基因关系与共同祖先；（2）共同语言；（3）共同遗存价值观；（4）共同文化；（5）共同历史；（6）共同人种特征；（7）共同信仰；（8）共同统一领土；（9）共同统一国家；（10）共同经历；（11）共同空间；（12）共同领袖。《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延续民族精英化进程，培养新一代“黄金青年”是现阶段哈萨克三大玉兹的共识。

迁都阿斯塔纳可谓哈萨克政治精英之政治结构及权力平衡的重组，即大玉兹-中玉兹联盟。处于政权核心的大玉兹通过将国都迁至中玉兹腹地，一方面实现了资源的再分配，复兴了这片曾经被高度殖民化的地区，让中玉兹在可控范围内获利壮大，重归历史之地位。另一方面，中玉兹以此支持承认大玉兹在哈萨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全力配合，进而成为哈萨克官僚体系与教育领域的中枢支柱。

非主体族裔的大规模外迁、海外哈萨克人的回归以及本土哈萨克人口的自然增长等因素，使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流域两州和西部四州，率先完成了民族结构单一化和地方精英本土化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之“欧洲西部-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及中欧铁路线均横跨以上地区，最终进入欧洲。<sup>②</sup>

## 七、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之联盟选择

独立至今，中亚政治版图呈现出的是包括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

① Қозыбаев М.Қ. Қазақ ССР: IV томдық қысқаш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84. Б.98.

② Қасымбеков М.Б. Қазақстан-2050: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лық анықтамалық. Астана: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Мәдениет министрлігі Тіл комитеті, 2014. Б.93-264.

为成员国的欧亚经济联盟、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的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左右摇摆不定的塔吉克斯坦。此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中亚各国内部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同的战略选择、各国之间和与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在战略制定、建立联盟与盟友选择方面，国家及其国族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1年12月8日，由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不仅使苏联的三大创始国脱离了苏联，还共同解散了苏联，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解散苏联则是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政治势力为了完全掌握国家权力所能采取的唯一解决方案。叶利钦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维持俄罗斯经两个世纪才建立起来，却即将要失去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sup>①</sup>苏联此时已名存实亡，即将取代它的是由俄、乌、白共同建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而该联合体从建立之日起就宣布承认各国的独立与边界，并且将成员资格向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成协议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开放，而潜在成员国将拥有宣布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权利。

新联合体刚刚成立之时，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并不欢迎由三个斯拉夫国家所建立的这个国际组织。就像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对联盟理论中的常规困境所做的分析一样，若一方组成联合体，必然会引起另一个对抗联盟的形成。<sup>②</sup>的确，面对三个斯拉夫国家建立的新联合体，时任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曾向其他中亚国家领导人提议，建立一个由中亚五国组成的联合体。<sup>③</sup>但最终五国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完全支持组建一个包括本国在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而没有建立中亚国家联盟，原因是

---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СФСР Б.Н. Ельцина.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3 декабря 1991 г. <https://yeltsin.ru/day-by-day/1991/12/13/8809/>

② William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74.

③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М.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Москва, 2007. С.486-487.

此时中亚各国的权力基础均处于弱势。

哈萨克斯坦加入独联体，不仅可以充当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与纽带，转型升级为欧亚大陆交通的核心枢纽，而且还可发挥区域安全的缓冲作用，遏制中东的宗教激进主义北上。所以对俄罗斯而言，中亚地区是本国所独有的地缘政治空间，直接影响其南部高加索与伏尔加地区的安全。保持对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与特殊地位，将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持续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是俄国中亚战略的重点。<sup>①</sup>美国则出于实现区域无核化与打压宗教激进主义的考虑，愿意让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扩充至中亚。与俄美两国不同，哈萨克斯坦加入独联体的动机要复杂得多，但其地缘战略与对外关系的核心议题与优先考虑始终是俄罗斯。独立之前，阿拉木图对莫斯科是从属和依附。独立之后，阿克奥尔达（Aq Orda）以及中亚国家虽极其渴望结束此种中心-边缘关系，但各国的现实国力表明，在短期内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可能，正所谓有心无力。

对于新生的哈萨克斯坦而言，其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与捍卫主权，在此过程中稳定与发展是关键，获得国际承认与继承苏联遗产是基础。选择加入由俄乌白倡导成立的、涵盖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区域性政治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借风使船。

独立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分界线变成了国界，新的国界因错综复杂且犬牙交错而纠纷不断，此前由莫斯科中央分配的自然资源变为各国不可或缺的争夺对象与增强国力的政治工具。和睦的民族关系，因信仰大厦的崩溃与新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一度紧张，坚不可摧的大后方一夜间变成了地缘政治的角斗前线，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纷纷抬头。随着原有分工体系的瓦解和出口市场的丧失，之前的相互供应变为彼此竞争，经济陷入瘫痪边缘，社会根基开始动摇，地区状况雪上加霜。

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分裂、极端势力、资源争夺、领土与边界纠纷，是中亚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20世纪9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状态。面对挑战，阿克奥尔达迫切需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军

---

<sup>①</sup>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и Казахстан. Труды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рума: “Гумил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Астана: Изд-во ЕНУ. Т-2, 2003. С.48-53.

队，加强新生政权的有效控制力，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保护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军事威胁。但在着手组建本国军队之前，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是收编境内的原苏联部队。当时，共和国境内的原苏联部队依旧效忠于莫斯科中央，如同烫手的山芋。原苏联部队能否和平地被当地新政权收编？部队是否会忠诚于新独立的共和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莫斯科的态度及其与阿克奥尔达之间的关系。

民族关系方面，自苏联统治中亚开始，因历史、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别，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族裔之间一直存在一定的鸿沟，苏联政府长期以来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拉平政策与政治上的干部本土化缓和民族关系。但无形的公民阶级感让民族关系变得微妙复杂，从俄罗斯腹地移民而来、并且居住在城市里的外来新移民，因语言和教育上的优势，不仅在物质方面保持着优越的地位，而且“新移民”的特殊身份让他们能比其他人更早更快地分享从上而下的政治资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中于农村地带的主体民族，他们难以获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资源。“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给苏联政府长期提倡且努力塑造的“苏联公民”身份认同制造出难以化解的矛盾。由于新身份是在俄语和“新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从上而下的方式传播，因此在干部本土化告一段落后，“苏联公民”身份认同与新建立的地方民族身份认同就发生了碰撞，结果是地方主体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得以强化。<sup>①</sup>在苏联末期，因政治局撤换时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造成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异常紧张。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和各国独立倾向的明朗化，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崛起，进而导致新的民族关系与利益复杂化。<sup>②</sup>

宗教方面，哈萨克斯坦地处各文明的交汇点，长期以来各种文化与宗教并存，但从公元10世纪起伊斯兰教开始主宰中亚，直至苏联进行全面“文化统治”为止。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均信奉伊斯兰教，并且长期处于伊斯兰文化圈内，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南部四国。苏联的解体也意味着信仰大厦的

---

①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и Казахстан. Труды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рума: “Гумил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Астана: Изд-во ЕНУ, Т-1, 2003. С.231-234.

② Тойбаева Ж.Н. Қазақ көтерілістері: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 2015. Б.223.

崩塌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为了凝聚社会，旧有信仰此时得以光复，开始发挥作用，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继承着原有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但与此同时，境外宗教激进主义开始输入和渗透，导致极端主义的滋长与蔓延，严重威胁世俗社会的稳定，而由此出现的政教合一思想直接挑战世俗政权的合法性与国家领土完整。

领土划分与资源争夺方面，众所周知，中亚各共和国的划界是莫斯科中央通过行政方式人为制造的。在划界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各地区民族的准确分布，反而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出发“任意改造”，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人居多的地区划分给了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人居住区分给了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居住区分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人为的边境划界因苏联解体而演变为争端，并与水资源分配问题一同升格为区域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中亚境内最主要的两条河流——锡尔河与阿姆河分别发源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流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最终注入咸海。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为上游国家，水资源丰富，因绝大部分领土为山地，所以耕作土地有限。而下游三国对水资源需求量大，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与农业大国，对水资源尤为依赖。独立前，中亚地区水资源的分配是按照优势互补的模式来设计的，即上游国家的水利设施夏季开闸放水，保障下游国家的农业灌溉用水，作为回报，下游国家在冬季为上游国家提供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以满足其能源需求。

经济方面，在苏联的分工体系下，哈萨克斯坦被定位于原材料、能源产地和消费市场，而且当时的分工是在各共和国间、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的，因此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性超强，一旦失去俄罗斯市场或者不与之合作，国家经济将会在数周内全面崩溃。苏联还给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遗留了一份独特遗产——基础设施，如何有效加以利用是各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中亚地区基础设施是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下以俄罗斯为中心、统一布局而建，并没有考虑到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区划问题。中亚各国一旦各自为政，曾经紧密的经济联系就会瓦解，而所有基础设施因大量跨境问题将产生极大费用，进而成为各国经济的沉重负担。因此，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联系是必要的选择，这是保证经济稳定的基石。否则，经济一旦持续下



滑，会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为获取资源，各国间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各民族关系因此会进一步恶化，并且导致冲突升级。<sup>①</sup>

哈萨克斯坦通过加入以俄罗斯联邦为主体的独联体、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以增强本国的硬实力来应对所面临的内外威胁。毫无疑问，军事力量、安全利益和外部威胁，是哈萨克斯坦最终选择加入各类欧亚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决定性因素。<sup>②</sup>客观而言，独联体、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发挥着增强成员国安全和推进它们在外部世界利益的功能，在中亚地区内部可以起到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和权力均衡的作用。<sup>③</sup>

## 八、意识形态多元化与权力结构再平衡

综上所述，哈萨克斯坦因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长期以来作为区域核心走廊，是西方技术思想东输及东方权力理念西传的必经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各路政治力量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汇聚于此，时而和睦相处，时而相互对立。这一方面导致贯穿东亚与东欧的区域权力平衡不断遭受外部冲击与内部挑战，使哈萨克斯坦难以苟安于一隅。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根据区域政局形势，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及经济格局。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的终结，维持区域地缘空间统一的原信仰大厦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国工业体系之间相互“脱钩”与“断链”，引发地缘经济动荡，致使民心开始涣散、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持续枯竭激化了族际矛盾，导致社会根基日益脆弱。欧亚主义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被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政治精英所动用。该思想意识除了能最大限度地弥补突如其来的意识形态真空、安抚民心外，还可以延续、巩固原有的经济空间与生产体系。

---

① Еркін Назарбай. Орталық Азиядағы Аймақтық Экономикалық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агистрлік диссертация. Әл-Фараби атындағы Қазақ Ұлттық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2017.

②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в XXI век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Алматы, 2009. С.314-315.

③ Еркін Назарбай. Орталық Азияның транспорттық геосаяси маңыздылығы, мақала “Экономиканың бәсекеге қабілеттілігі: қиындықтар мен тенденциялар” тақырыбындағы халықаралық ғылыми-тәжірибелік конференцияда баяндалған, ұйымдастырған Экономика және бизнес жоғары мектебінің экономика кафедрасы. Әл-Фараби атындағы Қазақ Ұлттық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Алматы, 10 желтоқсан, 2020.

欧亚主义能够迅速取代此前的意识形态并被各国精英和民众一致接受的关键，是其与生俱来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前者的优势特征在于先欧后亚，即源于欧洲但并非欧洲的思想逻辑。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欧亚”概念对应的是“单一且统一的欧洲”，是带有东方色彩的“东欧”遭“西欧”拒之门外后的产物，其目的并非自立门户或分庭抗礼，而是证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融入欧洲。因此，对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各国精英而言，跻身“欧洲强国”是凝聚国族归属感与保持文化自觉的关键步伐。转型后的俄联邦重举沙俄时期以双头鹰为图案的三色旗，高调纪念彼得大帝的军功伟业和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其重返欧陆实现大国崛起的意图明显。同样，哈萨克斯坦在高举蓝天金日雄鹰旗的同时，宣称作为突厥第二帝国的缔造者，不仅遵循着噶欲谷之道，而且还继承了以此为基础的金帐汗国、白帐汗国与哈萨克汗国在东钦察草原地区的政治遗产，强调其国语在帝国成立伊始就是草原地区的族际语言，也是东地中海与黑海地区的主要商贸语言之一。与此同时，象征哈萨克斯坦独立强盛的“金人”，一方面寓意哈萨克斯坦作为雅利安发源地，其现居国族属直系后裔，而非异域移入之民；另一方面则寓意哈萨克斯坦文脉与西亚两河流域之美索不达米亚相连，可谓同源异流。需要明确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是构建两希文明的源头之一。由此可见，相较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自我欧洲认同是建立在以里海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及地缘文化历史观与考古研究基础之上的，并非只限于所属地理位置、现有地缘经济与人种意义上的欧洲。

后者的优势在于其自身的“非欧非亚”与“既欧既亚”的模糊性质，即无明确排他的理论框架与固定绝对的理论源头。其特征是，在为其他意识形态提供或保留发展土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谓求同存异。这对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精英与民众而言至关重要。首先，强调欧亚内陆地缘空间高度统一的“新欧亚联盟观”潜移默化地取代了具有基本一致地理空间的“原苏维埃联盟观”，填补了长期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熏陶但又因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心灵空虚，避免了整个官僚体系陷入无政府的瘫痪状态。其次，以古米廖夫学说为核心的哈萨克斯坦新欧亚主义，通过强化体制认同，为非主体民族提供了宪政与信仰自由的保障，进而塑造出有利于经济体系长

期稳定发展的安全环境和必要条件，避免了人口大量流失和经济急剧衰退。最后，欧亚主义的多变特征为哈萨克斯坦新政治精英推动国家转型及相关改革大业提供了足够的拓展空间，使新型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可以完全根据本国政治精英的意愿，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逐步推进。独立伊始，欧亚主义作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政治精英们的共识，通过与其境内所属“丁”字形铁路交通网相结合，产生了地缘政治及经济效益，而该效益就是在原苏联地理空间内重构包括独联体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内的区域利益共同体的根基。对俄罗斯而言，此地缘效益是展开大国博弈的基本盘。而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该地缘效益则是升格自身政治地位、开展国家体制转型与重构区域政治格局的力量源泉。

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在“丁”字形的欧亚主义思想基础上，将其延伸成多元化。以南北走向的哈萨克民族主义为中轴，并入了自西向东横跨里海的泛突厥主义与贯穿中亚河中地区的图兰主义，已构建出“王”字形的多元意识形态体系，其核心功能是既可相互联合，又可相互制衡，更关键的是可根据人口结构与国家利益的变化进行管控调整。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意识形态体系的目标，是构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需要确切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核心是以阿拉什主义为主轴的民族主义，而构成阿拉什主义的两大支柱，分别是代表乌勒套精神的人文主义阿拜思想（Abay's ideology）和民主资本主义的阿里汗（Alikhan Bukeikhanov）学说。前者强调族际和谐、文化和睦、求同存异与相互学习，后者坚持北方哈萨克-鞑靼-巴什基尔联盟。除此之外，阿拉什主义分支的思想流派也具有同样的建构影响力，发挥着意识形态对接的作用，如强调坚持南方哈萨克-鞑靼-乌兹别克联盟的右派泛突厥主义绍凯（Mustafa Shokay）学说以及秉持图兰主义的马格江（Magzhan Zhumabayev）学说。其中，马格江学说作为哈萨克斯坦南部图兰主义是以本土突厥主义的形式得以呈现，与泛突厥主义不同，其着重点是中亚两河流域间的一体化。哈萨克斯坦各派意识形态在快速发展之际，欧亚主义作为持续维系区域世俗化的保护伞，自始至终都发挥着压制泛伊斯兰主义与极端泛突厥主义膨胀的作用，是哈萨克斯坦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减压器”，其作用不可忽视。

## 九、结语

以宪法为基础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是防止国内分裂与国外渗透，哈萨克精英继承阿拉什奥尔达时期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融入欧洲的欧亚思想与北方联盟选择。通过分析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以来的联盟选择可以发现，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除了有助于增强本国应对冲突与侵略的能力之外，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参与独联体可以获得国际承认，进而巩固政权或使政权合法化。阿克奥尔达决策层权衡利弊得失，所做出的决定是建立在本国综合实力与所得超过所失的利益衡量基础之上的。

近来，哈萨克斯坦朝着深化区域内部合作的方向努力，首先是因为经过30年的独立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由此可以将战略眼光放得更远。其次是维护中亚区域战略均势与平衡，通过内部协商解决争端，对外保持一致，避免大国干预，此举也可以理解为“中亚是中亚国家的中亚”。最后是中亚各国决策者的观念变化，各国领导人意识到，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五国共同合作方能化解危机。需要指出的是，中亚各国所有的政策制定或调整，都是为了维护独立与主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希望摆脱依赖，实现全面自主，联盟选择不过是为了实现该目的所采取的策略。现阶段，身份认同在联合中亚各国上的影响不大，但在凝聚国内力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来的一系列重大政经变革，将进一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国家建构。

首先，实施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指出，要在2025年之前全面完成哈萨克文拉丁化的推广工作，实现拉丁化哈萨克文在各个领域的覆盖和使用。虽然这是在不动摇俄语法律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但对以俄语为母语的主体民族而言依旧是个打击。改革导致政府机关、国有企业、服务及金融机构对国语的要求提升，其所属工作人员必须同时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字。这自然削弱了单一俄语族群的竞争能力，迫使其选择移民他国，而俄罗斯联邦正在推行的“同胞”移民计划则会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文字改革将长期有效地推动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的单一化。

其次，升格奇姆肯特（Shymkent）市为国家直辖市及提升图尔克斯坦市的国际地位。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18年6月19日批准国家行政区划改革方案，将南哈萨克斯坦州更名为图尔克斯坦州（Turkistan），并将其州级政府机关由奇姆肯特迁移至图尔克斯坦市，而奇姆肯特则升格为共和国第三大百万人口的直辖市。突厥语国家在2021年3月31日召开的合作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图尔克斯坦联合宣言”，授予哈萨克斯坦图尔克斯坦市“突厥世界精神首都”的地位。自此，图尔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精神复兴的象征，成为新一轮中亚区域一体化的源泉与文艺复兴重镇。奇姆肯特市则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借此提升哈萨克语的国际地位与南部的城市化水平，增强区域竞争能力。

第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坐落于七河阿拉套山（Jetisy Alatau）南北两侧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不仅在文化上同属草原文明体系，而且两国政治及经济利益长期以来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可谓血浓于水的兄弟国家。对哈方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高于经济因素，即七河地区的地缘完整性。七河地区作为“中亚的心脏”，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交通枢纽，自古延续着“得七河者得河中，得河中者得中亚”的发展规律。2021年1月28日，吉尔吉斯斯坦当选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正式宣誓之际，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特使兼民族和睦大会副主席詹塞伊特·图伊梅巴耶夫（Janseiit Tuimebaev）在其就职典礼上表示，哈、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显然，这些示好不仅是在言语层面，其影响也不限于两国范围，至少，哈、吉同盟的深化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以铁路为核心的中亚区域交通一体化。

---

**【Abstract】** In 1917, the Alash Orda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Nation State” through its party’s outline. In 2014, when Nursultan Nazarbayev, the first President of Kazakhstan, put forward the spirit of “an eternal state” during his address on the Independence Day, Kazakhstan’s concepts of “state” and “nation”, connotation of its national spirit and national outlook have undergone obvious changes with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t aims first to realize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goal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national equality,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Second it attempt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with the interest of Kazakhstan as the core, strengthening the identity of “Kazakhstan citizens”, and then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configur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land area, population structure, economic strength, political will, development strategy, alliance choi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re interest of a country have played key roles.

**【Key Words】** Kazakh Elit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Kazakhs, Kazakh National Identity, Eurasian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От первого внедрения принцип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Алаш-Орды в 1917 году через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до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и «Вечная страна» в 2014 году перв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урсултаном Назарбаевым, поня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нац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претерпе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яд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 обществе. Основная цель эт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и реформ -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ов мультикультурализма и межэтническ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одной нации - одной страны - од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е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его влияния через н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В данном процессе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играют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ощ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тенденция к союзу,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азахская элита, казах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азах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евразийство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1年第6期(总第232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公开发行

ISSN 1009-721X



定价：30.00 元